



引用格式:郑忆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的尽致展现[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1-8.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01-08

#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的尽致展现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isplay of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arxist philosophy*

郑忆石

ZHENG Yishi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共产党宣言》从实践批判、理论批判、自我批判三个层面充分展示了这一特色。其一,《宣言》的实践批判表现为运用矛盾分析法对资产阶级予以批判,既肯定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又揭示其存在和发展的局限性与暂时性,表明了批判的现实性。其二,《宣言》的理论批判表现为运用唯物史观辨析既往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既充分肯定思想史长河中每一理论都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都有自己独有的时代特点,又深刻指出只有鉴别不同阶级在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才能识别其理论本性,彰显了批判的学理性。其三,《宣言》的自我批判表现为秉持自我解剖精神,既在直面时代中审视反思和修正扬弃既有理论,又在推动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中实现理论自我超越,表明了批判的开放性。这三个批判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横向上,实践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现实性品格,理论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革命性品格,自我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发展性品格。纵向上,离开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抽象的批判;离开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盲目肤浅的批判;离开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因僵化停滞而变为教条)的批判。只有实现这三者的统一,才是科学的批判。17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痼疾的治疗仍然需要批判精神,这正是《宣言》的理论特色在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共产党宣言;

实践批判;

理论批判;

自我批判

收稿日期:2018-02-26

作者简介:郑忆石(1954—),女,浙江省温岭市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

170年前,一本不足1.5万字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面世,它昭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理论地平线的诞生,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批判特色。这里的“批判”,指《宣言》通过系统分析和理性反思,对现代资产阶级、既往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本质的揭示。

## 一、实践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的双重性

《宣言》的实践批判表明了批判的现实性,它立足于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对资产阶级予以批判,肯定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揭示其存在和发展的局限性与暂时性。

《宣言》的实践批判首先体现在,它对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能动创造性的充分肯定。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彰显了民主战胜专制、法权战胜特权、平等战胜等级、统一战胜分散的胜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sup>[1]33</sup>。它建立了民族国家,实现了社会形态由旧向新的转变,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着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sup>[1]36</sup>,于是,先前各自孤立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法律、阶级利益、关税的民族国家。它为个人潜力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解放,有利于个体的发展。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sup>[1]33-34</sup>,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赞许

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sup>[1]34</sup>,从而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读了”<sup>[1]34-35</sup>。

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显示了自由战胜依附、竞争战胜怠惰、积累战胜挥霍、贪财欲战胜享受欲的胜利:“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sup>[1]34</sup>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魔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sup>[1]36</sup>;它不满足于历史既有,而“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不囿于地域限制,而“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sup>[1]34</sup>,“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sup>[1]35</sup>,从而使得世界的角角落落都随之灵动起来。

在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文学\*,显示了进取战胜保守、理性战胜盲从、科学战胜愚昧、文明战胜野蛮的胜利。它打破了在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基础上形成的墨守成规、恐惧变革的消极思维方式,代之以竞争、进取的积极思维方式;它打破了盲从、等级、特权的观念,代之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观念。各地区、民族、国家的精神产品进而相互融合,形成了世界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

\* 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同样,自然科学上的每一个成果,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独立的发明创造,也不再专属于某一个国家。

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1]35</sup>

在国际关系上,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取得了联系战胜孤立、交往战胜隔绝、开放战胜封闭的胜利:“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sup>[1]35</sup>它打破了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封建壁垒,开创了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时代,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sup>[2]</sup>的新格局。廉价商品成为征服一切落后甚至最野蛮民族“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sup>[1]35</sup>,迫使落后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将他们卷入世界交往的狂潮,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1]35</sup>。最终,世界形成了以西方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有机体;国际分工使原来一国范围内的城市和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变为世界性的城市与乡村、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分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1]36</sup>。

《宣言》的实践批判主要体现在,它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的揭示。

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没能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sup>[1]37</sup>。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与其迅猛发展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愈益凶猛地、周期性地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愈益证明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已经增长到与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不能相容的地步,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开始突破这种障碍时,“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sup>[1]37</sup>。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剥削,

而不过是以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无耻的剥削形式代替了由宗法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形式,由此形成的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使它难以摆脱以往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的命运。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由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消除剥削,因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消除压迫,不过是以资本的阶级压迫代替了封建的专制压迫而已。“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sup>[1]38</sup>。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资产阶级在发财致富的同时,生产出一个与这个社会秩序、这个阶级利益相对立的群体,即一个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便一无所有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生产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必然形成尖锐的阶级矛盾,由此形成两大阶级之间激烈的政治冲突,使资产阶级难以摆脱以往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的命运。

在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以金钱崇拜取代一切,造成了新的道德退步。人与人的关系变为单纯的交换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sup>[1]34</sup>;人的情感变成纯粹的唯我所需,将“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sup>[1]34</sup>;以金钱衡量人的价值和尊严,“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神圣光环”,“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募的雇拥劳动者”<sup>[1]34</sup>,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sup>[1]34</sup>。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没有消除剥削意识,不过是以物欲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剥削意识代替了守旧的、腐朽的剥削意识,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隔膜,因而终将阻碍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国际关系上,资产阶级没有消除隔绝与分裂。它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建立在对他和民族剥削与奴役基础上的世界历史,必然是贫国与富国、弱国与强国的隔绝,进而导致人类社会新的混乱和战争。

尽管较之《宣言》所处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早已今非昔比;尽管《宣言》中的一些结论如其创立者所言已经过时了,但这并不能湮灭其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批判的价值:只有避免线型分析方法或单向思维方式,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认识其本质。

## 二、理论批判:揭示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

《宣言》的理论批判彰显了批判的学理性,即运用唯物史观,辨析既往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既充分肯定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每个阶级都是一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物,因而其理论都带有自己独享的时代特征;又深刻指出只有鉴别不同阶级在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才能识别其理论的本质。

《宣言》的理论批判对象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反动的社会主义。所谓“反动的社会主义”,是指逆资本主义发展潮流而动的社会主义。这类社会主义在衡量和批判资产阶级时,或囿于形而上学视角(静止停滞的思维方式),或陷入唯心主义窠臼(以纯粹的人性、人的本质为标准),总是企图开历史倒车。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封建社会主义站在王公贵族的立场,疯狂咒骂和恶毒攻击资产阶级。可怜的贵族老爷们,因沦为暴发户的手下败将,无力于政治斗争的他们,唯一的抗衡工具便只剩“文字斗争”了。于是,说些不祥预言恐吓新主宰,唱曲咒歌影射当权者,写点辛辣文字讥讽有产者,或者发点谩骂文章声讨资产阶级,便成为他们追忆流年的最后绝唱。这些“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

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sup>[1]54</sup>的东西,虽然偶尔也会让资产阶级如鲠在喉而极不痛快,但是,东流之水毕竟遮掩不住。因此,完全枉顾历史进程,一厢情愿地倒转历史车轮的封建社会主义,只能被人嗤之以鼻。为了赢得民心,封建贵族们会装模作样地关心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挥舞,以吸引和召唤人们跟进。然而,每当人们紧随其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sup>[1]55</sup>。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深入揭露和无情批判资产阶级,它“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sup>[1]56-57</sup>,揭示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sup>[1]57</sup>,等等。不可否认,它确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文明国家中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在逐渐丧失独立社会地位的同时,不得不“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sup>[1]56</sup>。它虽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其脆弱的经济地位又无力抵御随大工业而来的阶级分化,其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sup>[1]56</sup>。因此,它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无非是以过时的眼光和落伍的尺度,即便“按其积极的内容”,实质也不过是恢复“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sup>[1]57</sup>。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的现实下,它无异于走向倒退、陷入空想。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结局便是“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sup>[1]57</sup>。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站在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以德国人勇言怯行的方式,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它虽然也批判资产阶级,却是“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

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sup>[1]59</sup>，不仅如此，它还向民众大肆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非但一无所有，反而会失去一切”<sup>[1]59</sup>。因此，它成为德国专制政府及其随从们“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sup>[1]59</sup>。而它自诩“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的说教，则在显示其超阶级性中，表明它“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sup>[1]58</sup>。它将社会主义要求与政治运动相对立，将共产主义变成一种实现人性的思辨幻想，希望用“爱的说教”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结果反倒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sup>[1]59</sup>。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仅因其开历史倒车而注定是空想，且对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具有欺骗性。

二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谓“保守的社会主义”，是指以改良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人员构成复杂且人数众多，既有经济学家、伦理道德者，也有从事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人，还有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些“社会主义者”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sup>[1]61</sup>。它相信资产阶级鼓吹的“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致力于将资产阶级“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sup>[1]61</sup>。它希望巩固这个社会制度，保全这个社会的生存条件，但不要为保全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要求用改良的手段根治社会痼疾。它力图使工人满足于资本主义的现状，希望通过改善工人的某些物质生存条件，换取工人放弃政治革命。由于它对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它不但根本不可能触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反而是完全替统治者帮忙的。其理论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sup>[1]61</sup>。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的实际价

值，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的“演说辞令”<sup>[1]61</sup>。

三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谓“批判的社会主义”，是指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持坚决否定态度，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sup>[1]63</sup>的英国法国社会主义，它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主张的社会主义为杰出代表。

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于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发展的初期，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序幕中曾为直接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做过尝试。但是，因实现解放的物质条件不具备和理论的不成熟，它“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sup>[1]62</sup>，导致它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败。然而，由于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其批判无论对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性，还是对于无产阶级认识自身的地位处境、促使社会走出资本主义的沼泽地，都曾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仍然囿于“平等、博爱、自由”等人性范畴来论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它虽然看到了这个制度、这个阶级的弊端和局限，却既不能说明其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又无法揭示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以及为新制度、新阶级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它虽然看到了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却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它虽然试图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找不到实现这一目的道路。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只好建立一些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为了建造和维持这些空中楼阁，又不得不求助于资本家的善心和钱袋。由于脱离现实条件和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只能停留于空想，而不能引导工人进行真正的斗争。阶级斗争越发展，它就愈加失去了实践意义和理论依据，因而其价值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sup>[2]64</sup>。

《宣言》对上述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表明，对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社会

主义学说,既要看到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又要看到它们的共同要害,即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脱离时代发展、社会现实的静观视角。它启示我们:理论批判的参照系要有现实性,即依据体现着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实践确定批判的价值,否则就是无的放矢;理论批判的出发点要具有前提性,即要从理论背景与现实环境两个维度展开,使理论本质得以彻底释放;理论批判的立足点要有群众性,即批判的结果最终要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并以此作为检验批判的真理性尺度;理论批判的归宿要有建构性,即在批判旧理论中创立新理论,使理论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 三、自我批判:立足现实的不断反思

《宣言》的自我批判表明了批判的开放性,即基于理论发展的逻辑和矛盾,以自我解剖精神,审视考量自身的既往理论,在直面时代中扬弃错误、弥补不足,在推动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中实现理论自我超越。

《宣言》的自我批判更多地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问世后,在数次再版序言中,依据时代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现实工人运动的实际,不断反思、修正、补充既有理论,甚至不惜推翻既有结论。

首先,这种自我批判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看法和判断。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了新变化,表现为: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尽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频发,然而,周期性的危机虽然使资本主义始终处于动荡中,但又通过消灭中小资本、建立垄断资本的方式,促使资本组织形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其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陷于沉寂。尽管自《宣言》问世后,西欧先后爆发过1848年的德法革命和1871年的巴

黎公社革命,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这两场革命中受损,反而获得了新发展,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预料的那样不间断地爆发,反而停顿下来了。就工人运动看,虽然西欧多个国家先后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开展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但在现实中,但在工人运动内部它始终受程度不同的宗派性、独断性、密谋性等干扰,并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内部分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着自下而上的改良主义情绪,它的盛行使其最终主导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第一国际的分裂和中途解散,第二国际的走入歧途,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走入困境的证明。总之,19世纪下半叶的西欧资本主义,不仅在欧洲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表明,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阶段。这时,实践就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这样一个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否会很快灭亡?现实在挑战《宣言》相关理论的同时,也促使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思考其既有理论并对此作出回应。

于是,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尽管近25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党也跟着发展起来,工人阶级获得了1848年、1871年两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但“《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即唯物史观,作者注)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sup>[15]</sup>;同时,又坦承“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宣言》中“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sup>[15]</sup>,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sup>[16]</sup>。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便基于自我批判的视角,反思了其实践批判。

其次,这种自我批判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后来流行于西欧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反思。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西欧工人运动的开展,先后出现或盛行的英国工联主义、法国可能派、德国拉萨尔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影响甚广。众所周知,近代西欧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是以扬弃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其不一而足的形式又表明了各自不同的阶级属性和理论本质。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需要新的思想武器的客观要求,而对先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批判性辨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满足于这一批判。

于是,同样是在该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简要回顾了《宣言》对既往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认为它在时间上只是止于1847年,因此它“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sup>[1]6</sup>。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理论批判必须随着时代发展、新思潮的出现及时跟进,如此才能有的放矢,更具现实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从自我批判的视角反思了其理论批判。

最后,这种自我批判,还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认识中。

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殖民者的隆隆炮声和资本主义的廉价商品将东方各国强行纳入资本的世界体系,印度、中国等十几个东方国家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在这一过程中,俄国似乎是个例外。尽管较之其他东方国家,历史上的俄国相当落后,但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俄国为了增强国力便向外扩张,在沙皇彼得一世的主持下推行欧洲化,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使其开始走向世界。1863—1874年,沙皇政府通过在政治、法律、教育、财政、军事等方面实行一系列具有资

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古代向近代的现代化之路。尽管如此,此时俄国仍然不具备彻底革命的社会条件。经济上,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十分不彻底,以致在改革后的几十年内,农民遭受了空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奴制残余仍然大量存在,农村的土地大部分仍然掌握在地主手里,农民除继续遭受地主的盘剥外又平添了资本剥削。政治上,仍然保留的沙皇专制本身就是容克地主、资本家、封建僧侣继续对民众实行阶级压迫的政治靠山。

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其关注目光越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范围而投向了东方社会。通过研究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理论,马克思完成了其思想历程的重大转折,结出了新的理论探索之果。<sup>\*</sup>其中,他对俄国社会尤为关注。通过对俄国的社会特性和社会结构的分析,马克思认识到,俄国虽然遭到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但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其传统社会结构尽管在资本主义侵袭下趋于瓦解,但残存的专制主义、宗法关系、种族关系、血亲关系,仍然对它构建新的社会形成巨大威胁。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尤其是农村公社中公有和私有双重要素的并存,意味着其发展方向不一定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化,而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如何从东方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全面认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急切而又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于是,在《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sup>[1]8</sup>;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辨析俄国社会的特殊性,“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

\* 马克思在1873年海牙大会后至1883年逝世前,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著作,写下4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即《人类学笔记》及相关书信。



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sup>[1]8</sup>。既然如此,“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sup>[1]8</sup>尽管苏联解体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只能是“地域社会主义”,它必将导致专制主义和家长制盛行的恶果,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已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作了反思,即不再将其绝对化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发展公式,而是既强调由于世界性交往,每个民族和国家与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具有深深的依存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在总体上呈现出依次演进的趋向;又强调在运用世界历史方法研究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时,不应排斥各个民族和国家可能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各自的具体性、特殊性乃至跳跃性。基于俄国社会已经卷入世界交往、正在发生革命的变化,东方可能先于西方发生革命并形成东西方革命互补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1]8</sup>。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同样是对1848年《宣言》中将东方社会排斥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外的一种反思和纠正。

《宣言》的自我批判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未视其理论为永恒真理,而始终视其为求诸现实真知之径。它启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要坚持真理的过程性,认识到它是时代的产物,其理论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不断超越既定现实的、发展着的理论,其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是与与时俱进;要坚持

真理的具体性,认识到只有切实地将其与各种变化了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功能,才能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要坚持真理的全面性,认识到要发展其当代形态,要高度重视整个世界和当代人的精神成果,不断拓宽其理论来源,补充其思想活水。

#### 四、结语

《宣言》全面而又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重批判维度:(1)具体的实践批判,结合现实阐述理论,以满足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2)清醒的理论批判,对各种错误理论展开批判,避免工人运动迷路甚至误入歧途;(3)彻底的自我批判,基于理论的相对性和真理的过程性,强调只有开放的理论才能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这三个批判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横向上,实践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现实性品格,理论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革命性品格,自我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发展性品格。纵向上,离开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抽象的批判;离开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盲目肤浅的批判;离开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因僵化停滞而变为教条)的批判。只有实现这三者的统一,才是科学的批判。

17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态势已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书写《宣言》的年代,但不能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由于积累而日趋严重,而治疗痼疾首先要做的仍然是批判,就此而言,《宣言》展示的理论特色,仍然有其当代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





引用格式:刘顺,朱冬香.“红色”《共产党宣言》中的“绿色”伟力——兼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9-18.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09-10

# “红色”《共产党宣言》中的“绿色”伟力

——兼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lso talk abou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刘顺<sup>1</sup>, 朱冬香<sup>2</sup>

LIU Shun, ZHU Dongxiang

1. 上海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306;

2. 北京化工大学 学工部思政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红色”《共产党宣言》,在肯定资本的正面作用的同时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在追求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互动耦合中建构了未来社会美好图景,其中还蕴含着深邃的“绿色”生态洞见。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内蕴的生态文明思想,正是“红色”《共产党宣言》的“绿色”续篇,不仅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新生产力论,还把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统筹起来,嵌入到从新时代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社会正义;

生态正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收稿日期:2018-05-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7YJC710051);北京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KDC026);北京化工大学课题(G-SZ-YB-201705)

作者简介:刘顺(1988—),男,河南省鹿邑县人,上海海事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朱冬香(1979—),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客观理性地肯定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正面作用,写下了诸如“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sup>[1]36</sup>这样的醒目金句。正是断章取义地抓住了这一点,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英国马克思主义左翼批评者特德·本顿、法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迈克尔·洛维等就“证据确凿”地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唯生产力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尽管马克思很伟大,但因其始终高扬生产力大旗,强调利用人的力量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以期释放人的主体性,既缺乏对蕴含着强大生产力属性的资本逻辑的深刻生态批判,又没有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所以马克思阙如生态思考,甚至成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果真如此吗?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红色”《宣言》,难道真是马克思本人讴歌生产力力量而贬低自然界的“宣言书”了吗?事实上,“《宣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从未进行过系统论述的问题”<sup>[2]</sup>。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宣言》中的深邃生态洞见,为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作合理辩护,并希冀从经典作家那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找寻科学智慧和真理力量。

## 一、《宣言》在肯定资本正面作用的同时,深刻揭示出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

资本和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的“敌人”,资本批判是其本人终其一生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同时,马克思是一位坚持科学精神和真理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简单笼统地从感情上把资本和资产阶级“一棍子打死”,而是从历史演进的宏大视野上理性看待资本逻辑

的二重性,并在客观肯定资本正面作用的同时,深刻揭露了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态负效应。

### 1. 资本的正面作用:“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其一,资本为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宣言》第一部分毫不避讳地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sup>[1]36</sup>在这段话中,资本主义的正面作用已跃然纸上。不难看出,尽管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十分憎恨给工人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全局,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sup>[3]</sup>。事实上,马克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资本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正可谓“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sup>[4]288</sup>。可以说,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无论是微观的电报使用、铁路轮船、化工在农业中的应用,还是宏观意义上的自然力的征服、人口的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资本物化的生产力属性得以空前释放的结果,“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sup>[1]35</sup>。这是资本正面作用的集中体现,它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生产力。

其二,资本为新社会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相较于过去腐朽无能的封建阶级,《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sup>[1]33</sup>,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

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sup>[1]35</sup>,民族史将逐步嬗变为世界史。这种嬗变是以资本的文明作用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sup>[5]90</sup>不难理解,“资本的文明作用”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生产力发展所起到的正面引领作用而作出的深刻判断。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正是承载在“全面祛魅自然界”和“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释放”这两个层面之上的。此时,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物化作用。相较于以往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4]927</sup>。后来,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前的其他社会形态相比,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明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的一面。这与《宣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能量效应的客观肯定是一致的。

另外,《宣言》还从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正面作用:“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sup>[1]36</sup>这种有助于促进人的解放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摆脱,依靠的正是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城乡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关系”<sup>[5]70</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天然的优势。这种生产是以社会化、标准化和批量化的机器大工业为主轴的规模生产,可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哪

一种力量能比它更加有利于激发和调动生产的活力。因此,《宣言》客观肯定了资本在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包括改变农村愚昧状态的祛魅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宣言》虽肯定了资本的正面作用,但并不是要把资本当作目的,而仅仅是把其当作手段。“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sup>[1]43</sup>马克思认为,正像取代以前的社会形态一样,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也仅仅是历史的,因为其生产条件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子,其迟早要遭到扬弃,“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sup>[5]110</sup>。这一点也是资本正面作用的根本所在,为未来新社会迎来曙光和提供准备,“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sup>[5]69</sup>。

## 2. 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凭借“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1]35-36</sup>这意味着,资本家遵循自己的利益诉求来主导世界,把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布局到全球。由此就透射出资本逻辑固有的“任性”:罔顾自然界的内在律令,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来型塑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而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正在于此。

首先,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导致不良的生态后果。《宣言》明晰地指出,资产阶级从不会“安分守己”,不但要对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进行重塑,而且要“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sup>[1]34</sup>。生产革命的不间断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

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sup>[1]34</sup>当然,资产阶级推动生产变革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只是在客观上助推了生产力发展,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甚至制造和操纵了“虚假需求”),其真实目的在于利用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任何妨碍该目的实现的东西,就是资本和资本家的敌人,所以它们要摧毁一切妨碍生产力增长的“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sup>[5]91</sup>。显然,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公地悲剧”中的生态环境,它根本抵挡不住资本物化一切的摧毁力量。“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工业资本主义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资本主义往往企图毁坏它自身从中获得原材料的土地。这种毁坏会一直循环下去,除非已经不存在土地(包括水和空气)支撑它盘剥。”<sup>[6]</sup>显然,由此必然导致严峻的生态后果。

其次,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遮蔽了人类的生态理性。《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sup>[1]43</sup>,并把诸如“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sup>[1]34</sup>。“利润之神”成了高悬在资本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其他包括工人和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存在物都只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除了追求发财致富而别无他图,“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sup>[7]228</sup>。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家倾向于用最小的成本置换出最大的收益,而这正是通过剥削工人和掠夺自然来实现的。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有着血淋淋的控诉:“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sup>[1]46</sup>,他们无法企及任何

尊严,却“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sup>[8]205</sup>。在掠夺自然界方面,资本家一方面罔顾自然界内在平衡规律而疯狂地掠夺开发,另一方面又大肆排放污染,千方百计地把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来担负。结果,自然界的先在地位和内在价值被瓦解得荡然无存。这种金钱主宰下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先在性地位的无情贬低<sup>[9]52</sup>。可以说,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不但“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sup>[1]34</sup>,而且对自然界与人的共生关系予以解构和颠覆。在这种意义上,《宣言》深刻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已经僭越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态理性,生态危机的形成与出现势在必行。

最后,资本逻辑的空间化导致生态破坏的全球化。针对资本逻辑的横向空间扩展,《宣言》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sup>[1]35</sup>,最终“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1]36</sup>。资本增殖具有时空的双重性:在时间上贯穿资本运动全过程,正可谓“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sup>[7]214</sup>;在空间上表现为“世界的资本”而非“地域的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5]169</sup>。资本空间化不仅是资本增殖逻辑在经济层面的横向布展,而且是资本社会权力的空间化。帝国政治和殖民主义正是资本社会权力空间化的典型样态,资本不但试图控制被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还大肆掠夺其廉价的生态资源。“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sup>[1]36</sup>,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本国之外寻找廉价的原料产地和能获取高昂利润的商品销售地。这不但造成被马克思批判的伦敦泰晤士河的严重粪便污染,而且把污染带到了全世界,造成地力损耗、森林消失,导致包括生态平衡在内的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sup>[135]</sup>;来自西班牙的大农场主为了扩增种植面积,而不计对当地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果断焚烧植被,留下了一片又一片的裸露岩石<sup>[10]</sup>。这些便是资本空间化带来严峻生态问题的真实写照,其既带来生产力飞跃又对自然产生巨大破坏的“矛盾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地理学景观之中”<sup>[11]</sup>,生态问题就必然会伴随着资本的空间拓展由一国蔓延到全球。

总之,《宣言》在客观肯定资本的正面作用的同时犀利地揭露了导致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事实上,尽管生态问题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并非突出的议题,但资本主义社会始终都隐忍着双重矛盾即经济矛盾和生态矛盾<sup>[12]</sup>,只不过历史阶段不同,矛盾的侧重点会发生相应转移。“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sup>[137]</sup>《宣言》无疑是深刻的,源于私有制根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愈发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被掘墓的中坚力量”,否则,就不会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耗费全人类的精力去缔结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议定书》(1997)到《巴黎协定》(2016)等一系列世界性气候约定书<sup>[13]</sup>

## 二、《宣言》在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互动耦合中建构未来社会

事实上,早在《宣言》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基于社会和生态两个维度谋划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他富有激情地写道:“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那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矛盾将迎来双重和解,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冲突也将得到全面消解,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sup>[9]185-186</sup>。“这种解答”最终有赖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革除资本权力对人类和自然界的统治和奴役。就像《宣言》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sup>[1]52</sup>未来的理想社会正是在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互动耦合中建构起来的。

### 1. “红色”的社会正义:消灭私有制

在《宣言》写作和发表之前,马克思就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犀利深刻的批判:“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sup>[9]158</sup>而造成工人如此凄惨生产生活场景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宰社会关系的历史时代,社会正义的物质基座已不复存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sup>[14]</sup>为了从根源上消除剥削进而实现彻底的正义,《宣言》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sup>[1]45</sup>,而旨在追求社会正义的共产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图景由此被勾勒了出来。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想主要是通过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惨绝人寰的严苛剥削而渐次展开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英国伦敦《评论家季刊》里面转引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一文中的语段来描述资本的贪婪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sup>[8]871</sup>,从谋求百分之十的利润到谋求百分

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所使用的手段也更加残酷和卑劣,无所不用其极。比马克思晚些时日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早期资本家阶层受王公贵族奢靡风气影响的罪恶现象,并指出他们所享受的宫廷糜烂生活足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历史原貌<sup>[15]</sup>。与资本家贪婪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工人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最基本的生存要素诸如光和空气等,乃至连普通动物都较容易享受到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可以讲,不但是光和空气,就连工人的吃和住这两个最基本的生存要素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吃的是已经传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住的是臭气熏天、污染弥漫、声音嘈杂的“小爱尔兰”<sup>[9]225</sup>,他们蜗居在城市最糟糕的区域,“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sup>[9]411</sup>。根本而言,资产阶级“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sup>[1]38</sup>,社会正义的愿景在资本统治的社会那里无迹可寻。

至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为什么要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条件了。他们认为,为了消灭剥削和阶级对立,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sup>[1]45</sup>,进而才可能“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sup>[1]46</sup>。只有消灭私有制,工人的生产生活境遇才能真正从根源上得以重塑,社会正义才能落地生根。

## 2. “绿色”的生态正义: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

《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

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sup>[1]37</sup>这里的“魔鬼”不但包括工人阶级的持续抗争、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包括后来逐步袭击全球的生态危机。资本家“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sup>[1]46</sup>。资本的抽象权力满足了资本家阶层的贪婪,却造成了工人生产环境的急剧恶化。这不但影响了劳动力的可持续性供给,而且也蚕食着自然生态的承载力。可以说,正是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贪婪制造了人与自然之间“文明的阴沟”<sup>[9]225</sup>。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与共生,必须解构并终结资本对工人和自然界的双重剥削。

立足于根深蒂固的资本权力,资产阶级索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sup>[2]34</sup>。自资本诞生以来,它“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8]871</sup>。马克思对资本作出这种最直白但充满着原则高度的批判,直斥资本已把剥削内化到自己骨髓之中的本性。资本为了增殖,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其惯用途径,而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就会变得越贫困,就越会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进而沦为资本家私人财富的工具性存在,身陷于“抽象统治”而不能自拔。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工人自身的劳动成果却成了他们正常生存发展的最大桎梏。劳动的异化又带来了自然的异化。作为人类基础实践活动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进而实现新陈代谢的媒介。但资本家正是利用工人异化了的劳动,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中掠夺资源,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界排放污染。可以说,工人从自然界中开发的资源越多,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就会跃升越快,但相反工人就会越没有力量。

因此,只要不彻底变革资本统治的社会关

系和瓦解资本通约的价值规则,生态正义就难以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挑战将是肇始于资本增殖的人类自我异化(劳动异化)和世界异化(自然异化),不解决这种源自私有制的“二重异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幻想<sup>[16]</sup>。根本而言,《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进而构建未来社会的设想,正是对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与自然矛盾和解”思想的深度阐发。

### 3. “红绿”耦合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

《宣言》前瞻性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5]</sup>“红绿”耦合的未来社会,就是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在这种联合体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sup>[4]928</sup>。马克思在此处强调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合理新陈代谢,既避免自然界成为主宰人的“最高之神”,又防止人类自私无度地蹂躏自然界,答案就是“平等占有”“联合生产”“最小消耗”和“共同控制”,这既契合自由人的本性需求又不违背自然界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的红色思想又是与绿色观点结合在一起的。”<sup>[17]</sup>“红绿”耦合的社会愿景由此得以成为可能。

要建成这种“红绿”耦合的自由人联合体,首先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然的社会化,也就是要使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同频共振、交融一体。多位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反复援引《宣言》中响彻云霄的金典名句“消灭私有制”,来展露其对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生态批判和人类深陷生态灾难泥淖后的未来出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站在更高的社会形态上观之,某个人之于土地的私有权,与一个人要自私地控制另外某个人即占有对他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sup>[4]878</sup>。自然界的私有化,意味着把自然界的所有权和开发权完全转给了内嵌着增殖和效用双重原则的资本。资本家为了在既定预期内收获最大利润,必然倾向于采取最娴熟的手段来掠夺自然界和剥削工人,根本不会去考虑所谓的生态平衡和工人福祉,因为任何可能抬升资本成本的行为都会被规避。《宣言》发表之后的100多年里尤其是迈入新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遍地开花的环保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以致无疾而终。这表明,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的“风暴苗头”虽已显现但尚未形成气候。单维度的“绿色”生态运动或“红色”劳工运动都难以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普遍抗争。

《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42</sup>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态问题愈发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关涉全球人类的议题,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高层级的“政治问题”<sup>[13]38</sup>,一个关系到绝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生存或毁灭的元问题。“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sup>[1]37</sup>当下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的环保运动与传统意义上延绵不绝的以“劳资对抗”为主题的社会运动,若归一合流、共同发力,一起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就能不断超越资本的限度、摆脱资本的宰制而走向普遍自由。只有一



方面消解人类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消除世界异化,才能爆发出时代最强音。这样,既能解决关乎人类存亡的环境危机,又能消弥造成人与人之间深层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实现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到那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sup>[1]50</sup>,自由人联合体必定不再是愿景而是确证的现实。

### 三、“红色”《宣言》的21世纪“绿色”续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sup>[18]</sup>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言》穿越时空的科学伟力、时代价值和战略意蕴的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sup>[18]</sup>,作为21世纪卓越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典范的习近平,其生态文明思想正是“红色”《宣言》的“绿色”续篇。

#### 1. 新生产力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共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总纲,其重大历史意义毋庸置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sup>[19]544</sup>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都高屋建瓴地反复要求:务必稳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二者是今后工作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它们要相互促进、同频共振,决不能顾此失彼。他还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sup>[20]209</sup>,“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sup>[19]210</sup>。不难看出,新时代生态文明追求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协同进步,而非偏废其一的生态至上或生产力至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实质上反映出我们党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应该维持怎样的合理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忽视环境保护而过度去搞生产力发展就是毁灭式的“竭泽而渔”,但同时不抓生产力发展、妄谈生态保护,也必定是空洞无物的“缘木求鱼”。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经验,有必要对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作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仍是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和关键难题的头把钥匙,仍需积极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当代发展又必须是具有充分“含金量”的绿色发展,尤其要把生产力的创新形态和绿色内涵贯穿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中,积极发展自然资本,即“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sup>[19]210</sup>。《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充分认识到“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sup>[21]</sup>。这说明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需要基于发展大局而不断创新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政治宣言和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把改善生态环境升华到等同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高度,正是与时俱进地传承了马克思“自然生产力也是生产力”的生态

洞见和思想智慧。有学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sup>[22]</sup>,是崭新的具有时代感的“保护生产力新理念”<sup>[23]</sup>。总之,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既契合社会发展阶段所需又注重生态平衡所求的“协调统筹论”。在“从求温饱到盼环保”已成为显性的普遍人民诉求的新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新生产力论巧妙解决了这样一个世界难题,为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之间如何实现“非零和共存”与“友好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

## 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有机统一的生动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sup>[24]</sup><sup>52</sup>,这种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型文明道路的呈现,“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sup>[24]</sup><sup>50</sup>。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美好生活”到“生态产品”“优美生态”这些关键词,便可管窥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既观照物质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兼顾宜居宜业维度上的优美环境诉求,换言之,就是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把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和谐互动、共融共生、协同推进,“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sup>[20]</sup><sup>95</sup>。

尽管历史自会开创新的道路,但最关键的几步又总在意料之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瞻远瞩、锐意破局,无论是在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还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把社会公

平正义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就社会正义而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出卷人、答卷人和阅卷人”来明确执政逻辑、以“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来重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以铁腕反腐、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为社会正义托底保障。就生态正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秉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鲜明理念,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将生态环境视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sup>[25]</sup>,将生态环境质量视为小康全面不全面的关键<sup>[26]</sup>。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中,二者同频共振、交互一体,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统筹考量,嵌入到新时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刘仁胜,李晶,董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93.
-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3.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FOSTER J B, CLARK B, YORK R.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 [11]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3.
- [12]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M]. 唐正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3-259.
- [13] 刘顺.“杰文斯悖论”:资本逻辑宰制下技术的生态幻象[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9):33.
- [1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 [15] 维尔纳·桑巴特. 奢侈与资本主义[M]. 王燕平,侯小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5-160.
- [16] FOSTER J B.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9:271.
- [17] 方世南. 把握马克思“红绿交融”的思想光辉 [EB/OL]. (2018-05-11) [2018-05-20]. [http://www.gmw.cn/xueshu/2018-05/11/content\\_28748996.htm](http://www.gmw.cn/xueshu/2018-05/11/content_28748996.htm).
- [1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18-04-25(01).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N]. 人民日报,2015-09-22(14).
- [22] 龚万达,刘祖云.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学习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J]. 教学与研究,2015(3):35.
- [23] 顾海良. 让世界分享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N]. 光明日报,2015-10-08(16).
-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5]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 人民日报,2018-05-20(01).
- [26] 习近平谈生态文明[EB/OL]. (2014-08-29) [2018-05-20].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29/c164113-25567379-4.html>.



引用格式:马灿林,蓝江.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19-25.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19-07

# 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

## A Marxist critique of Foucault's biopolitics

马灿林, 蓝江

MA Canlin, LAN Jiang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生命政治思想是福柯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这一思想,发现它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异。其一,福柯在讨论(工厂里的)规训权力时虽曾大段引用马克思的分析,却实则不解其意。在马克思看来,规训权力不过是资本统治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具有独立地位。其二,在讨论人口治理问题时,福柯剥离了人口的阶级性这一社会属性,将人口还原为一个生物学事实。与之截然相反,马克思则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认为人口的治理乃是阶级的统治。不过,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也有其价值所在,它为我们从生命政治维度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蕴含着一个生命政治维度,而且使生命政治问题得以澄明:生命政治绝非福柯所以为的权力之自我重组和优化配置及其策略方针,这种耽于抽象的思辨理解根本没有切中生命政治的本质;生命政治不过是深受资本钳制的人们对自身生命价值和政治权益的渴求,唯有破除资本逻辑的主宰,人们才能够获得解放和自由,才能赢获其生命政治权利。

**关键词:**

福柯;  
马克思;  
生命政治;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收稿日期:2017-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6BZX016)

作者简介:马灿林(1992—),男,湖北省黄石市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

晚近以来,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愈发热烈,尤其在奈格里、阿甘本、埃西波斯托等人的推动下,似有成为显学之势。但是,若对这一概念进行谱系学考察,很自然地就追溯到福柯那里。显然,正是在福柯那里,这一概念的现代含义——生物性生命进入政治领域——才第一次被确定下来,并被概括在“生命政治”这一范畴中。

福柯(1926—1984)是20世纪对西方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他的被称作“微观物理学”的“权力形而上学”,赋予传统的西方权力理论以不少新内容,讨论生命政治问题,福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有足够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

本文拟简要阐述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分析这一思想对马克思的借鉴之限度与价值,进而从生命政治这一维度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一、福柯政治研究: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

生命政治\*问题并非一开始就为福柯所关注。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必须保卫社会》和同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求真意志》中,福柯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在这两个文本中,对生命政治的探讨均只是寥寥几笔,而并非福柯原本的计划。\*\* 尽管如此,生命政治的面貌已被大致勾勒出来: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一方面,权力致力于通过规范化、监视、检查等手段创造出一个既驯服又有用的肉体,它以个体化为目标;另一方面,权力则把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公共卫生和疾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纳入自己的操控范围,试

图在总体层面创造出优质而健康的人口。福柯认为,“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sup>[1]</sup>。在这里,我们发现,福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对自己先前的研究作了深化。也就是说,原先针对肉体的规训权力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权力技术、机制,相反,它现在被统一于一个新的范式即生命权力之下。

何谓生命权力?简言之,即权力的技术化。这种技术化的权力不仅瞄准作为个体的身体,而且瞄准作为整体的人口,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人的生命本身。这种技术化的权力管辖着与生命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的生产、调整、管理、维护、增强和控制等。福柯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现象:从17和18世纪开始,生命就已经成为权力之新的对象和目标。福柯强调,这里的“生命”并非某种政治存在或政治生命,而是属于生物学层面的生命存在。用阿甘本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与其形式相脱离的赤裸生命<sup>[2]3-4</sup>。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作为一个生物性存在的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现在,政治权力围绕生物性来运转,并且通过它来实现自身的繁衍、增殖和播散,从而进一步扩大权力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得以重新配置,并且获得换代升级。基于此,福柯认为,“一个‘生命权力’的时代开始了”<sup>[2]90</sup>,政治也由此而转变为生命政治。

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福柯补充道,这种生命权力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即死亡权力。这一点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既然权力并非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那么它如何可能从呵护、关爱生命转变为杀死生命呢?然而,福柯认为这并不矛盾。如前所述,生命权力的基础是我们的生物性存在。这就使

\* 笔者认为,将“biopolitics”一词翻译成“生命政治”不如“生物政治”更为贴切。因为前者虽然表达了生命成为治理的对象这一含义,但未能指出现代政治将人还原为一个生物学事实这一更为重要的意思。

\*\* 前者试图以战争为分析工具,发展出一套迥异于主权利力的权力范式;后者则主要讨论了性话语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

得国家有可能通过引入种族主义,在它的居民身上实现某种生物学上的切割、区分,从而将一部分人划分为优秀的血统,而将另一部分人视为劣等种族,甚或被看作前者的威胁因素。于是,生命的逻辑便转化为死亡的逻辑:消灭后者,恰恰是为了维持前者。“如果你想活,你就必须使人死,你就必须可以杀人。”<sup>[3]194</sup>而且,后者死得愈多,前者的生存就愈加巩固。福柯认为,这一生与死的辩证法正是生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福柯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逻辑转换。在此之前,权力被看作是无主体、非中心的,它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充斥于医院、学校、兵营、监狱、工厂等社会机构之中,并且威胁着统一的法律权力,似有取而代之、将法律社会变为规训社会之趋向。然而,随着人口问题的出现,这种微观的权力分析模式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的国家问题。于是,福柯就启用了“生命权力”这一新的范式,开始将原先不愿讨论的国家权力重新纳入到他的分析视野之内。对于福柯来说,在生命政治这一新的基础上,微观的身体规训和宏观的人口调节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是,二者究竟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毕竟,按照福柯的看法,它们并非产生于同一源头。如果只是说在某些方面<sup>[3]191-193</sup>,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可以相互配合、相互铰接,共同建构起一个规范化的社会,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在其他方面,它们同样可能因为相异的逻辑而互相排斥。换言之,生命这一对象和目标本身并不构成两种权力机制统一起来的真实基础。相反,这一基础只有在两种权力机制的共同特征和规律上去寻找。对此,在后文中,我们将首先说明,在生命政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福柯进行了批判,而且对福柯遭遇的这一困难作了解释。

## 二、福柯对马克思的借鉴:限度与价值

关于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福柯<sup>[4]14</sup>本人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经常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但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在页脚注明出处并附上毫不相干的评论……我引用马克思,但我不说明,不加引号,并且因为别人无法辨别是否是马克思的文章,因此我被认为是不引用马克思的人。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感到有必要引用牛顿或爱因斯坦吗?”

这一点很有趣。因为福柯一直以来或多或少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但从福柯的这一自白出发,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两人间的复杂关系。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曾以工厂为例来讨论规训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我们发现,福柯在这里多次引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马克思关于协作、管理等问题的分析。首先,协作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生产力。这表现在:(1)通过把劳动者聚集在一起,它可以形成一种平均的社会劳动力,从而避免单个劳动力的局限与风险;(2)通过在劳动者之间形成一种内部的分工和配合,它可以创造出一种集体的生产力;(3)由于众多劳动者组织在一起,这将在他们的心理层面引起一种变化,即“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sup>[5]379</sup>。显然,在福柯看来,这种对空间的编排和力量的组合正是规训权力的体现,其直接结果就是一具生产性的肉体的诞生。由此,在工厂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被镇压、被强制的工人形象,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竞争精神的工人形象。但是,不得不

说,福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源的提取是误导性的,因为福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协作的分析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题目下加以探讨的。在马克思看来,协作本身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生产方式,对其决不能仅仅从生产力这一方面来认识。相反,这种生产技术的变革恰恰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因为单个的工人本身不会发生协作关系,只有当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的时候,生产过程的这种社会化合作才得以展开。因此,这种生产力恰恰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其根本上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性的规训权力正是资本的特殊权力。同样,为了说明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功能,福柯把工厂里的管理、监督等职能抽象出来,将它们绝对化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福柯没有注意到,这种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是为了保障生产过程的效率,另一方面它又服务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并且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管理权力并不先于资本,相反,它是资本的一个产物。“资本家的管理权力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sup>[5]384</sup>正是对这一点的忽视,导致福柯撇开社会生产关系本身而从纯粹的权力技术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然而,福柯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忽略权力技术背后的剥削性质,更在于把权力技术的特征放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准则,由此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一个“惩罚性社会”或“规训社会”。比如,在学校教育问题上,福柯考察了权力是如何人为地制造差异、区分等级,并把规范化到学生意识之中的过程。然而,无论这种分析多么精彩,它始终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的要害在于:这

种规范为什么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一个驯服的学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或者说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著名论文中,阿尔都塞从再生产的角度出发指出,为了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一个劳动者技能合格,它还要求一个劳动者在意识层面完全服从规范。因而,学校等教育机构绝非没有立场的中性的场所,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通过把其中的个体训练成驯服的主体,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他们,使之对现存秩序加以认同,从而实现统治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说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多样性的功能恰恰在于它们惟一的——因为是共同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sup>[6]</sup>然而,到了福柯那里,这种生产关系的维度却被忽略了,学校成了一个单纯的权力技术的部署空间。对权力技术的背景或环境因素不加考虑,这正是福柯的致命缺陷,也是导致他把工厂、学校、兵营、医院、监狱等所有这些社会机构同一化并称为“监狱群岛”的原因。对此,勒格郎在《被福柯忽略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监督与惩罚并没有构成一种抽象的形式、一幅‘权力图’或是一种‘总体方法’,它们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和生存环境的联系中获得意义”<sup>[4]31</sup>。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因此,在生命政治的微观个人层面,福柯忽视了权力背后资本关系的本体地位;而在生命政治的另一维度即与人口有关的治理问题上,福柯亦走入了误区。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是18世纪伴随政治经济学一起出现的一个范畴。这个时候,人口不再被看作是众多法律主体的集合,被当作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源泉。相反,一种生物自然性被赋予人口概念,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人口不是某种给



定的存在,而是一个受到诸多变量制约的要素,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之中,国家通过控制其他事物可以对人口施加影响;(2)欲望和利益被看作是人口的自然特点,因而国家不是要压抑这些欲望,而是要激发和鼓励它们,为它们提供一个形式框架,放任自流,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将会自动导致整体利益的实现;(3)人口现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通过观察可以识别出来,这就为人口统计学等知识工具的出现打开了方便之门。<sup>[7]</sup>福柯认为,正是在“生物现代性”这一意义上,权力才有可能渗透其中,并围绕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出现重新进行配置,改善权力的组织方式,发展出一整套新的治理技术。由此,福柯将自己对生命政治的探讨重新置于“治理技艺”这一框架之下。然而,如此一来,福柯显然就走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马尔萨斯的道路上。在马克思看来,人口问题绝不应作为一个生物学问题来考虑,而应作为一个阶级—政治问题来考虑。换言之,福柯的人口概念是抽象的,他没有考虑到人口背后的阶级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sup>[8]</sup>中,马克思曾写道: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

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一样,同样也不存在抽象的人口,更不用说对人口的抽象治理。在马克思看来,人口首先应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这个基础上,人口的治理乃是阶级的统治,由此政治也就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但是,福柯剥离了人口的阶级性这一社会属性,将人口还原为一个生物学事实,然后在这个生物性层面上来讨论权力关系,由此,国家也便失去了它的阶级属性,而沦为权力技术的一个载体。显然,马克思对此是竭力反对的。因为如果只是抽象地从权力本身来谈论权力,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相反,必须将其置于各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中来考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各种权力究其本质乃是资本的特殊权力。

进而言之,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具有一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启发我们有可能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一种新的解读。这种新的解读正是生命政治学,但又决非福柯所做的那样。这一解读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弄清楚生物性是如何从经济领域中产生的。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来就存在一个生命政治的维度。

###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命政治意蕴

对于福柯来说,生命政治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而到了阿甘本那里,生命政治则被追溯为一个自古罗马法权以来就有的本体论范畴。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生命政治实则是一个经济范畴,根本而言,它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而一同出现的现象。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从简单商品经济那里发展过来的,其标志便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使得商品生产远远超出原有的规模,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起来。然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基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当然,资本家将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通过种种血腥的暴力手段完成的,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积累。我们认为,这一点恰恰构成了生命政治的起点。因为正是在这里,生命第一

次被一种暴力方式强制性与其形式相分离,从而使得生命被还原为一个赤裸生命或生物生命。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仅这一点是不够的,这个无产者还必须成为他的雇佣劳动者。从表面上看,这个了无牵挂的无产者似乎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受雇于这个或那个资本家。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包含着必然的不自由:这个无产者确实不属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但是,他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他绝不可能脱离这个剥削体系而单独存在。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从起源上就是建立在否定生命的基础之上,而且,为了维系这一经济系统的持续运转,它就必须不断地将这个赤裸的生命生产、制造出来,使之在这一经济空间内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以社会的形式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过程——便是要重新恢复生命的完整性,这是一次将赤裸的生命重新提升为人的生命的革命运动。

正是生命的这一分离导致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其实质是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最重要的生命机能,劳动力是一种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它包含着巨大的潜能,即能够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更大价值。这使得无产者原本有可能通过劳动重新获得自己的形式生命。然而,由于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异化劳动描述的正是这一分离造成的种种后果。首先,由于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因此,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感到自我生命的实现、满足和确证,而是感到生命的外化和丧失,“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是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sup>[9]52</sup>。其次,由于劳动不为自己所支配,工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分裂的,一种自我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占据他的内心。“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sup>[9]55-56</sup>最后,劳动不再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活动、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创造活动,相反,它沦为一种仅仅维持工人之动物性生命的活动。马克思对此深刻地指出,“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可能是工人”<sup>[9]53</sup>。至此,人的生命就被否定并走向了其对立面。

劳动力的内在矛盾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因为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就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式即可变资本,从而成为资本增殖的一种手段。于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再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合目的性的过程,而是生产资料利用劳动者在保存自身价值的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主客体的关系被颠倒了。作为“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sup>[10]</sup>,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本身是一种死的东西,但是,由于资本的赋形作用,它们就变为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反过来支配人的活劳动、控制人的生命。由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头足倒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被物化了,物却被人格化了。这种现象在换班制度中得到了最典型的反映。表面上,相比于一味延长工作日的粗暴方法,换班制度似乎是一种较为人道的措施。然而,这种制度的实质是为了避免因为机器等生产资料的闲置带来的损失。因为机器一旦闲置,就成为无用的预付资本,而等到下一个工作日重新启动时,又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因此,唯一的方法便是实行换班制度,日日夜夜不断地补给劳动力,从而使得机器一直运转下去。在这里,资本的逻辑明显战胜了人而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惜以生命的失序、萎缩为代价。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sup>[5]311</sup>

这一情况在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时代变得更

加恶劣。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作为生产力进步的标志,一方面虽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工人生命的畸形化。由于工厂内部分工逐渐细化,工人不再负责整件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而只负责这个产品的一个局部生产环节,他的工作从原来广泛的领域压缩为一个狭隘、简单和不断重复的劳动。这就导致工人从总体工人变为一个局部工人,其生命技艺成为多余,身体职能逐渐退化,从一个有机的完整的身体退化为一个单一器官,他被紧紧束缚在单一的操作环节上,一生与这个唯一的步骤打交道,一旦越出这一狭隘的职能,其生命就将面临死亡的风险。如果说多才多艺曾经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那么现在,专业化、局部化或狭隘化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美德。资本主义不仅造成生命技艺的贬值、缩减,而且还使得它进一步分化并畸形发展起来。“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sup>[5]404-405</sup>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工人就必须把自己变为一个零部件。在资本的眼里,多才多艺就是浪费。事实上,这一退化了的生命技艺在机器大生产时代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由于机器的应用,工人的技艺被机器所取代,一大批工人被从工厂中排挤出去,剩下的、寥寥可数的几个工人的工作进一步缩减为仅仅是“服侍机器”,即负责开动、护理和维修机器。于是,如今不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甚至在智力和人格方面,工人都被彻底无产阶级化了。“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sup>[5]487</sup>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命政治发展到了顶点。

####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福柯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研究有其深刻性所在。他将人的生命本质与

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逻辑密切关联,进而萃取出“生命政治”这个范畴,并从“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双重视角赋予其丰富的内涵。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突破了对人之生命本质的生物学界划,凸显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性及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关联性。福柯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的这种政治哲学诠释,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运思逻辑,然而二者又呈现出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实质上是两种“生命政治观”的对立。对于福柯来说,他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只是停留于政治哲学的思辨,而没有真正切中人的生命的社会本质,即没有能够揭示现实的人与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之间的本质联系。然而,福柯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思考及其思想并非没有价值,而是为我们基于生命政治维度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0.
- [2] 吉奥乔·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M]. 赵文,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 [3]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4] 莱姆克. 马克思与福柯[M]. 陈元,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6] 路易·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下)[M]. 陈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286.
- [7] 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陈晓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6-60.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
-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4.



引用格式:李佳怡.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评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3): 26-33.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3-0026-08

#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 A comment on Yugoslavia autonomous socialism theory

李佳怡

LI Jiayi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苏、南冲突就爆发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以冲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桎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已经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的权力日渐缩小,自治机构的权力日趋扩大;而斯大林主导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恰恰与之相反,大力强调国家机器和国家领导人等的的作用。基于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南斯拉夫决定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实现社会主义自治民主进而使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使人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而不再只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手段。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最终失败了,国家也解体了,其在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探索虽有很大局限性,但其在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依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资源,而且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十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南斯拉夫;  
自治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 2017-01-26

基金项目: 2017年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非基础研究项目(HDRC201725)

作者简介: 李佳怡(1990—),女,湖南省衡阳市人,黑龙江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

二战中,南斯拉夫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并独立之后,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考虑,仍然想继续控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就难免与南斯拉夫当时的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想要独立自主地发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念相冲突。南斯拉夫希望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实现社会主义自治民主使国家逐渐走向消亡,最终建立起马克思所设想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遗憾的是,由于内外诸多原因,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理论和实践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源起历史与理论特质进行梳理和研究,总结和反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非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其相背离。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缩小国家的权力,扩大自治机构的权力。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是反其道而为之。正如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兰茨基所指出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基本特点在其《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已有明显的表现,这就是大力强调国家、国家的领导、国家机器和传动装置、国家的主动性和干部,而实际上从来也不强调群众,不强调曾经被他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思想,实际上与斯大林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倡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过程的自主管理,

是人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sup>[1]</sup>如此看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私有制,但把社会主义同国家等同了起来,“在把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计划化与国家计划化等同起来的时候,它便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主义体制”<sup>[2]</sup>。

弗兰茨基认为,由于东欧地区的国家大多数为不发达国家或者相对不发达国家,其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然带有自身的特点。然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抹煞了这种特殊性,它主张使用暴力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和政权,然后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运用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和生产进行管理。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政党代替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以及高度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体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工人阶级本身而非其他任何人或组织代替工人阶级来掌握政权。然而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党和国家的垄断变成全面的垄断,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领域,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和科学领域”<sup>[3]68</sup>。所以弗兰茨基认为,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异化的现状,国家仍然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甚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状态。弗兰茨基认为,“国有化只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扩大再生产相分离。因而,尽管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却处于雇佣关系中,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被剥夺的

地位,也就是说,仍然有人以工人阶级名义实行管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整个社会”<sup>[3]63</sup>。也就是说,由此必然导致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弗兰尼茨基认为,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弗兰尼茨基指出,如果社会停滞在初期的国家社会主义阶段上,那么官僚—国家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甚至导致官僚—国家主义反革命,如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样,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会丧失,社会关系就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就会变成官僚—国家主义的,而且必然会起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sup>[3]77</sup>

虽然斯大林宣称在苏联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政党内产生的政治官僚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这个新的官僚阶级不但具有之前一切统治阶级的特性,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特质,并随着集权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变得越来越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曾经是生机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sup>[4]</sup>。显而易见,这种存在官僚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把这样的社会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而且会让别有用心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进行指责。“而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人道主义的理想,今天我们从许多历史进程中已得到证明,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而且正在实现中。”<sup>[3]84</sup>因此在弗兰尼茨基看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理想,我们必须对现存的、官僚的国家社会主义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

不过,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是当时经济相对不发达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否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我们如何选择和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弗兰尼茨基指出,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依据自治的原则超越国家社会主义,建立工人委员会,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民主改造,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二是强化现存的国家社会主义,强化党和国家的统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恰恰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它忽视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强制性地推动一党制,把苏联模式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给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惨痛的灾难。弗兰尼茨基认为,东欧现存的社会主义并没有逐步地推动民主改革,而是不断强化国家和政党的统治力量。虽然弗兰尼茨基也承认,根据现实状况我们无法超越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必定还需要国家的存在,但他强调并提醒人们:必须意识到国家消亡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行动不应该总是拖延到未来,而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斯大林都不应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理想化、绝对化,这必将阻碍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当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建设归结为国家社会主义机制的有机发展而非对它进行克服时,实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和优越性。

通过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给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解释。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而且是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将真正地成为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发展展示着可能性”<sup>[5]</sup>。要言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人的社会,作为一种有个性自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与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不相容的。

因此,革命绝非简单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被赋予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含义——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说,革命不再被简单地局限于武力夺取政权,而是要彻底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只有既包括社会存在方式的改变也包括人的存在方式的改变的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把变革社会结构和造就新人作为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真正成为现实。由是观之,社会主义并非单纯地超越资本关系、超越货币—商品经济、超越雇佣关系,而是同时要以社会结构的变革和人的自我改造为中介,消灭国家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 二、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认为,具体国情决定发展道路

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sup>[6]</sup>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南斯拉夫是从苏联的经验出发的。但是随着苏、南冲突的爆发,探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道路和方法就成为摆在南斯拉夫人面前的首要问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转变的道路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多种过程、形式和道路

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足够重视社会主义形式的多样性,并结合本国社会历史状况而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最高领导人铁托认为,要想保障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就要保障能够自由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的权力。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与各个国家的国情密切相关。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把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万能公式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必然会在实践上遭到失败。铁托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并不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并非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即将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必须采取的模式。事实上,就连列宁也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模式只有一种,恰恰相反,他一直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社会主义的发展才会有活力。即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之处,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特殊性决定了每个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应该是具有本民族印记的道路,而非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因此,铁托认为,社会主义模式并非铁板一块,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现阶段的实践,把它同我国特殊条件尽可能紧密地结合起来”<sup>[7]</sup>。因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虽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但其本质仍然是社会主义,是符合南斯拉夫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一思想引导



着南斯拉夫走向了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

### 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看来,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是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也是一条国家逐渐走向消亡的途径。铁托的亲密战友、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领导者之一的爱德华·卡德尔,通过系统研究和分析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即该时期的国家应具有的政治体。在这个时期,不是国家的权力日益加强,而是民主应该日益被扩大,因而发展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显得十分重要。

卡德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非一种具体的政治形式,而是一种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概念。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一种政体概念,即在社会主义自治范围内为民主化开辟道路的政体。为了眼前和长远利益,无产阶级在社会中必须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导权,这就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简而言之,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保持良性发展。而要保持社会主义的良性发展,只能在社会主义自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下进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卡德尔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国家社会主义的集权制,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自治民主形式直接参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管理。为此,卡德尔提出了“自治利益民主多元主义”。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政治体现,自治利益的民主多元主义乃是一种以自治利益为原则和基

础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当依照自治原则,使劳动者和公民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组织中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代表并维护多元利益。卡德尔由此认为,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实现过程就是国家逐渐走向消亡的过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任何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代表着一种权威,因此它们都是专政的一种形式。“在南斯拉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不是去建立一种由国家主办的民主,而是使国家的职能社会化,并促进自治和自治民主。这种努力同时也创造着国家消亡的条件,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是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包括目前的自治民主形式的国家。”<sup>[8]</sup>

南共的其他一些理论家也认为,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在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实践派哲学家斯托汤诺维奇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民主,认为其较传统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斯托汤诺维奇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可忽视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民主局限于政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形式民主。针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情况,斯托汤诺维奇首先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同。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一方面使民主普遍化,以民主引导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尽可能实现最直接民主。只有在可能达到的最直接的决策模型得以发展的时候,完全普遍化才是可能的,反之亦然”<sup>[9]98-99</sup>。显然,在这一点上,斯托汤诺维奇与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的观点相似,都认为社会主义民主较资本主义民主更加普遍和直接。其次,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这种民主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一关联中的依

赖关系并不只是单向的:只有我们所勾画的那种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存在,所有制才可能真正是社会的。我们完全可以公正地强调,正是南斯拉夫,以工人的自我管理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构成了这种民主的脊梁。毕竟,在本质上,民主无非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民主的程度直接随着公民事实上控制社会的程度而变化”<sup>[9]99</sup>。

同样,理论家弗兰尼茨基也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义就是推翻不合理的统治,摒弃苏联模式的官僚—国家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建立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此,弗兰尼茨基特别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政党的作用。同样,卡德尔也在其理论中肯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中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共产党的执政不是建立自己的永久统治,而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即一种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弗兰尼茨基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推进民主进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不断地推进民主进程,才会促使整个时代的民主超越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民主。

综上所述,这些理论家们认为,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最终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特征是私有制或国有制和间接民主,以及多党制或一党制,而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性的特征则是自治关系与直接民主的加强和政治领域、代议制与国家官僚的消亡。”<sup>[3]134</sup> 弗兰尼茨基对此作了深刻的概括:“自治的思想和实践的含义是: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他限制并废除所有那些历史地篡夺权力以使自己成为劳动者的监护人和牧师的领域,从而让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在历史上成为成年人。这种社会主义自治当然再也不能

建立在不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的、集团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所有的原则之上。”<sup>[3]134</sup>

#### 四、南斯拉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的国家领导人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明确提出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不得不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开始,但是又不得不通过改革来超越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因此弗兰尼茨基断言:社会主义一定是一个长期开放的历史过程;斯大林所谓的“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合理的术语,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个开放的过程才会具有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应该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最终它将扬弃一切异化,使人获得全面、自由和独立的发展。

这样一来,人及其发展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主题,人不再只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手段,而是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人最终成为历史和生活的主人。马尔科维奇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人道主义。因此,只有把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健康有序发展。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超越和克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自治,逐渐用自由人联合体来代替原有的国家和政治机构。而这种超越国家社会主义的联合体之本质,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一种历史的、新型的民主的发展和成熟,这里不仅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还包括迄今为止任何民主形式都不包含的经济领域。

这些南斯拉夫理论家们因此主张,须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各个领域。卡德尔指出,“当代的人道主义在道德上的含义,可以说早

在古埃及的墓碑上就刻成了文字。人类追求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人道主义的关系的主观愿望,千百年来都是相同的。但是,对当代来讲,重要的是在考虑到事物的相互依赖的同时,要认识如何能够切实改变事物的现状,如何能够前进一步,什么是这种变革事物的一定客观因素和体现。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是具体的,富有成效的”<sup>[10]</sup>。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它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贯彻到社会主义自治的各个领域,用以扬弃各种异化。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自治实践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其本质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实现人道主义的过程,就是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异化。因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出发点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他们的需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意味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们拥有幸福、快乐和自由,而非仅仅拥有面包和钢铁。

## 五、结语

首先,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的改革探索,其价值不容否认,但其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及其社会主义理论家都认为,只有真正地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才能破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未能全面考虑南斯拉夫的历史和其多民族的现实,以及自治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过早地提出国家

消亡理论,使权力更加分散,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和作用,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凝聚力逐渐丧失,这就为南斯拉夫日后的停滞埋下了隐患。

其次,南斯拉夫理论家虽然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也毫不留情地对它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南斯拉夫中央集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仍然与工业自治并存,这种状况必然会阻碍自治实践的发展。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中仍然保存着国家官僚主义体制,这就导致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二重性。因此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弗兰尼茨基断言,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治结构还是等级制。尽管政府大力宣传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但在现实社会中官僚集权制不断地被强化,这必然导致自治社会主义的发展停滞不前。

最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改革的探索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一些理论缺乏实践性,对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困难毫无用处。这就使他们的学说必然带有乌托邦色彩,一些理论方案必然缺少现实可操作性。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无论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理论家还是领导人,都没有对南斯拉夫历史进行阶段性考察和研究,导致脱离现实状况高喊“国家消亡”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口号,要求国家进行权力下放,由自治利益共同体管理社会事务,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政治的强有力领导和控制,使得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有机可乘。其症结在于对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目标操之过急,将共产主义的一些原则生搬硬套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南斯拉夫,没有看到南斯拉夫同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其二,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片面理解,没有处理好民

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将民主和国家割裂开来的倾向,即简单地把自治理解为人们自己管理自己,把国家和官僚阶级视为民主发展的障碍。这种将国家和官僚阶级混为一谈的做法有失偏颇,不仅看不到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人自治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而且完全否认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其三,没有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称的所有制经济体系。南斯拉夫在探索自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这在南斯拉夫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矛盾,导致产权不明。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最终失败了,国家也解体了,其在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探索虽有很大局限性,但其在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依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资源,而且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十分重要的启示。

#### 参考文献:

[1] 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M]. 胡文建,李嘉恩,杨达洲,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71.

- [2] 弗兰尼茨基. 社会主义和危机[C]//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北京:三联书店,1979:285.
- [3] 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 杨元恪,陈振华,译. 衣俊卿,校.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4] 密洛凡·德热拉斯. 新阶级[M]. 陈逸,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35.
- [5] 加·彼得洛维奇. 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C]//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北京:三联出版社,1979:315.
- [6] 列宁. 列宁全集:第2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4-65.
- [7] 铁托. 铁托全集:1926—195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91.
- [8] 爱德华·卡德尔. 民主与社会主义[M]. 魏永刚,张小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4.
- [9] SVETOZAR Stojanovic.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0] 爱德华·卡德尔. 卡德尔论文选[C]. 李嘉恩,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187-188.

引用格式:周阳敏,赵亚莉. 制度企业家特质与行为模式研究综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34-40.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34-07



# 制度企业家特质与行为模式研究综述

Research review of speciality and behavior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周阳敏, 赵亚莉

ZHOU Yangmin, ZHAO Yali

郑州大学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通过梳理学界对制度企业家内涵的界定,制度经济学派、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制度企业家特质的分析,以及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对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的阐释,可以看出,国外对制度企业家的研究日益成熟,而国内学者对制度企业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无论是制度经济学派还是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他们在对制度企业家特质的理解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都强调制度企业家是以利益为导向、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企业家。但是他们的着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强调制度企业家完成制度创新的能力,而后者主要强调制度企业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策略应用。制度企业家的行为模式是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来展现的。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可以使制度企业家发现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通过动用资源、改变制度环境等方式来创建新的制度;也可以使制度企业家发现潜藏在制度变革背后的潜在利润和商业机会,以此来获取利益相关方对其进行制度创新的支持。关于制度企业家的特质和行为模式,目前学界虽已经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获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关于制度企业家的行为对企业经营和绩效的影响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这一点应成为学界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制度企业家;  
制度企业家特质;  
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

收稿日期:2018-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Y049);河南省软科学重大课题(182400410003)

作者简介:周阳敏(1971—),男,重庆市人,郑州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理论等。

“制度企业家”是管理学、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企业家这一概念逐步完善,并且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2013年,在第七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指出,“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变革、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应当重视和培育制度企业家,鼓励制度企业家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鉴于此,本文拟将学界对制度企业家的内涵、特质和行为模式的研究进行梳理,以促进相关理论建设和制度企业家的成长。

## 一、制度企业家的内涵

### 1. 国外研究现状

“制度企业家”是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时经常使用的概念,涉及到管理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多个领域。制度企业家最初由 S. N. Eisenstadt<sup>[1]</sup> 在 1980 年提出,他认为制度企业家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并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承担领导角色的活动者。P. Dimaggio<sup>[2]</sup> 指出,制度企业家是用自身所拥有的充足资源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的一类企业家,他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出现。此后,“制度企业家”这一术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广大学者逐步接受和引用。S. Maguire 等<sup>[3]</sup> 从制度创业角度对制度企业家的含义进行了阐释,认为作为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制度创业代表了对特定体制安排感兴趣并利用资源创造新机构或改造现有机构的行动者的活动,这类行动者被称为制度企业家。R. Greenwood 等<sup>[4]</sup> 认为,制度企业家在创造或改变制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D. L. Levy 等<sup>[5]</sup> 则从战略层面对制度企业家进行了界定,认为制度企业家是那些能够意识到机构战略(包括

竞争战略、制度战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等)的多重性和相互依赖性,并对此采取综合措施,在复杂关系网络中获得一定优势的一类企业家。R. Quinn 等<sup>[6]</sup> 则认为,制度企业家是具有创造或改变机构的重要资源的组织。T. L. Waldron 等<sup>[7]</sup> 认为,制度企业家是以与现状不一致的方式创造新的或改造既定结构的行为主体,制度企业家在本质上就是追求改变以实现自己利益的企业家。

###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制度企业家”概念进行推广的最为著名的学者当属周其仁教授。周其仁<sup>[8]</sup> 认为,在商务经济活动中,企业和企业家所需的不仅仅是资源、技术、商业组织和产品,还需要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所遵循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包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念等,那些看不见的和对市场博弈结果有重大影响的制度是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并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周其仁通过对美国麦高文这一案例的研究,把像麦高文这样率先挑战旧有的规则,对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盈利机会敏感、带头提出创新游戏规则、为新制度的创建提供建设性贡献的企业家称为制度企业家<sup>[8]</sup>。D. K. Li 等<sup>[9]</sup> 根据新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案例,将制度企业家定义为:不仅发挥着熊彼特意义上的传统企业家的功能,而且在其事业发展中帮助建立起市场体制的那些人(单独的个人)。胡祖光等<sup>[10]</sup> 认为,制度企业家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嵌入场域之中的、在策略应用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变迁推动者;制度企业家可以是个人、组织和协会,也可以是网络和社会运动,应通过反思性特质、社会技能或者是所在的位置来识别制度企业家。朱海就等<sup>[11]</sup> 认为,企业家事实上都是制度企业家,企业家的制度想象是企业制度最重要的构成。对“制度企业家”概念进行推广的还有著名学者张维迎<sup>[12]</sup>,他把制度企业家分为

两类:一类是像苏格拉底、孔子这样的创造社会上大部分人需要但不太明白应该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的人;另一类是创造社会上已经表现出来的游戏规则但还没有生产出来游戏规则的人。周阳敏<sup>[13]</sup>则认为,制度企业家并不是像张维迎所说的那些圣人君子,而是一些利己的企业家,是通过制度经营这一独特的模式来形成制度资本的积累从而产生制度资本外溢,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企业家。

从国内外学者对制度企业家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制度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完成实际创新的能力很强;二是对现行制度和规则有创新或推动作用;三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和社会网络中。据此,本文对制度企业家作出如下界定:制度企业家就是在制度变迁和创新过程中,对盈利机会敏感并敢于打破旧有规则建立新规则的企业家。

## 二、制度企业家的特质

关于制度企业家的特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主要对制度经济学派和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制度企业家特质的观点作如下梳理。

### 1. 制度经济学派视角下的制度企业家特质

制度经济学派视角下企业家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具有对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性和特殊的判断力。制度不均衡在产生制度变迁的同时也会带来获利机会。对于制度企业家来说,应具有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的意识,对制度变迁潜在赢利机会具有高度敏感性,这是判断制度是否需要创新的基础。制度企业家麦高文正是意识到了建立电信网络能够为用户提供低成本的长途通信服务,从而产生改变管制规则的意愿,对原有规则进行了创新。制度企业家在面对盈利机会的时候,通常会通过创建

新的或者是改造现有的制度来加速制度变革<sup>[14]</sup>,进而抓住盈利机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改变现有制度,从而促进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

其二,具有冒险精神。制度企业家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家,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大众市场而不是小众市场。制度企业家是进行组织变革的这类群体<sup>[15]</sup>,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通过组织变革来满足大众市场的需要,如何使他们创新的行为规范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这就要求制度企业家要比传统企业家对人性有更深刻的了解,意识到进行变革所面临的风险。马晓静<sup>[16]</sup>指出,制度企业家创新的是一种作为“特殊产品”的制度,其创新成果与其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是一种乘数比例,虽然我们反对盲目的冒险,但是当判定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能够带来社会效益时,制度企业家敢于冒险去改变现有组织的规则。

其三,具备完成制度创新的能力。张维迎<sup>[17]</sup>认为,制度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制度企业家的创新不同于商业上的技术创新,其创新包括用新的价值观代替传统的价值观,用新的行为方式代替旧的行为方式,用新的是非观代替旧的是非观,从而改变我们的认知观。周一<sup>[18]</sup>认为,制度企业家对产品、技术和商业组织创新过程中的盈利机会的敏感,使得他们能够带头提出游戏规则的创新。周其仁<sup>[8]</sup>认为,制度企业家的首要特质是对改变游戏规则(制度变迁)所包含的潜在盈利机会的高度敏感,必要特质是完成实际制度的创新能力。U. Sharma等<sup>[19]</sup>认为,制度企业家就是制度的创新者,制度企业家依据现有的制度安排来创造性地引入新的体制,以实现其制度创新,虽然制度企业家的创新破坏了传统的做法,但也提供了新的替代方式来实现企业目标,因此制度企业家的角色定位是:在组织变革中展现其实现创新的能力。



## 2. 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视角下的制度企业家特质

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视角下的制度企业家特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利益导向型。P. Dimaggio<sup>[21]</sup>认为,制度企业家所追求的利益包括三个方面: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其他类型的被随机引入的利益。李稻葵认为,制度企业家公开倡导的变革应该至少对大多数公众有利,而不仅仅是对积极参与的个体企业家有利。R. A. Candela<sup>[20]</sup>强调了组织机构的集体利益与制度企业家自身利益之间的动态作用,认为制度企业家的特质体现在如何巧妙地找到有创造力的团队来实现增加自身收益、权力和声望的目的。刘去周<sup>[21]</sup>认为,制度企业家能够塑造制度化的集体行动,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推动组织成员形成行动,同时实现自己心中的想法,从而达到改善组织绩效、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

其二,制度创新型。M. Sotarauta 等<sup>[22]</sup>着重强调了制度企业家在企业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制度企业家在组织创新体系中如何将创新集中于制度化。制度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也是企业创新的执行者。R. Mandelkern<sup>[23]</sup>通过研究表明,制度企业家创新精神强的企业其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显著高于创新精神弱的企业。S. L. Sun 等<sup>[24]</sup>认为,当制度企业家(包括个人、团体和组织)启动和实施一套创新的商业规则和制度时,旧有的制度、标准和政策将会受到挑战。创新不仅仅是促进组织结构创新,同时也是促进制度企业家自身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组织机构的变革。

其三,主导型。F. Wahid 等<sup>[25]</sup>认为,制度企业家在制度创新、制度构建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通过自身来动员各种资源以推动企业制度化的进程。R. Greenwood 等<sup>[26]</sup>则指出,制度理论的核心挑战是嵌入机构中的制度企业家如何促进企业制度结构的转变,以及

为何对改变制度结构具有很强的积极性。T. L. Waldron 等<sup>[27]</sup>则探讨了在组织领域中,边缘化社会职位的制度企业家如何利用制度变迁来使自己成为对组织结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指出制度企业家在组织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组织的变革和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制度经济学派还是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他们在对制度企业家特质的理解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都强调制度企业家是以利益为导向、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企业家。但是他们的着重点不同,制度经济学派主要强调制度企业家完成制度创新的能力,而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主要强调制度企业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策略应用。

## 三、制度企业家的行为模式

制度企业家的行为区别于传统企业家的行为,前者主要体现在改变或者利用规则来提高企业绩效、推动社会进步,而后者主要体现在如何利用资源或者现有的规则和制度来提高企业的绩效。从这一层面来看,制度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力远远高于传统企业家的行为,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也远大于传统企业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制度企业家的行为主要是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体现出来的。

### 1. 制度变迁视角下制度企业家的行为模式

制度变迁是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表现的重要途径之一。N. F. Campos<sup>[28]</sup>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的理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企业家首先应发现制度存在的缺陷,随后构建新的制度逻辑,以弥补旧有制度所存在的缺陷。由于这种制度逻辑的构建以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社会福利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很容易获得政府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王东方<sup>[29]</sup>认为,制度逻辑构建好后,制度企业家的重要工作就是使该制度逻辑能够得到确立,成为正式

制度,即得到政府的认同或者是确立为新的制度。

V. Nee 等<sup>[30]</sup>认为,制度企业家发起、指导或制定制度变革,而这些行为是建立在内生因素之上的,如反思性、适应新观念、以新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制度企业家的这些行为促使制度企业家去发现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潜在的盈利机会,进而去构建新的制度,以实现自己建立新制度、提高企业绩效甚至影响整个行业制度的愿望。这也是制度企业家区别于传统企业家最显著的表现。

S. Sarma 等<sup>[31]</sup>认为,制度企业家在特定时间地点和结构中的行为对制度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被称为传播者和具有远见卓识者,能够积极主动地将组织标准、政策和制度上存在争议和破坏性的做法纳入现有的制度框架中以打破制度障碍,从而建立新的制度。因此制度企业家在发现制度的缺陷、动员资源和改变现有机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sup>[32]</sup>。

### 2. 制度创新视角下制度企业家的行为模式

制度创新是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表现的另一重要途径。J. Hagel 等<sup>[33]</sup>认为,传统企业家关注的重点是产品和服务,以保持企业利润的稳步上升,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机会——制度创新。制度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来重新定义组织机构的理念并在机构内部和跨机

构之间开发新的关系架构,以此来打破现有的绩效平衡,尽可能地扩大收益范围。因此,制度企业家被视为有意识地改变制度环境,从而支持制度创新,以此创造新的制度环境的行动者。

R. Raffaelli<sup>[34]</sup>认为,制度创新被定义为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组织领域的认知、规范等一系列新颖有用而又合法的变革。M. Sotarauta<sup>[35]</sup>认为,在组织创新背景下,制度企业家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作为积极调动资源以创造新的制度逻辑或转变现有逻辑和框架的行动者。X. Cao 等<sup>[36]</sup>提出,制度企业家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明确地改变创新机构,是制度企业家必须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G. D. Bruton 等<sup>[37]</sup>认为,制度企业家具有改变制度环境的特定兴趣,他通过动用资源、制定战略新框架、整合知识和资源来实现制度创新。P. A. Hall 等<sup>[38]</sup>则认为,制度企业家进行制度创新主要通过3种方式:改革(制度企业家明确指导的体制变革)、叛逃(制度企业家依据一些规则和做法而停止一些行为)、重新诠释(制度企业家学习新思维方式,自觉创造新的解释、规则和做法,而不废除制度本身)。综上所述,制度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可以图示如下(见图1)。

制度企业家的行为模式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来展现。制度企业家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可发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并针对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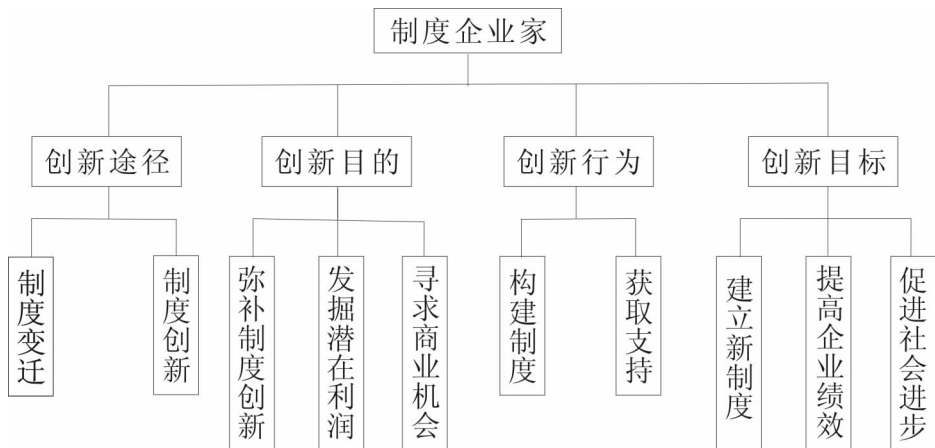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图

缺陷,通过动用资源、改变制度环境等方式来创建新的制度,进而建立新的制度体系。同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可以使制度企业家发现潜藏在制度变革背后的潜在利润和商业机会,以此来获取利益相关方支持其进行制度创新。制度企业家进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福利的提升,这也正是制度企业家的魅力所在。

#### 四、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学界对制度企业家内涵的界定,制度经济学派、组织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制度企业家特质的分析,以及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对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的阐释,可以看出,国外对制度企业家的研究日趋成熟,而国内学者对制度企业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本文既是要通过对制度企业家的相关理论进行归纳整理从而为后续对制度企业家理论进行深刻研究做准备,也是为了提高学者对制度企业家理论的重视度。关于制度企业家的特质和行为模式,目前学界虽已经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关于制度企业家行为对企业经营和绩效的影响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这一点应成为学界未来研究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1] EISENSTADT S N. Cultural orientation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4): 840.
- [2] DIMAGGIO P.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J].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1988: 3.
- [3] MAGUIRE S, HARDY C, LAWRENCE T B.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5): 657.
- [4] GREENWOOD R, SUDDABY 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1): 27.
- [5] LEVY D L, SCULLY M.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as modern prince: the strategic face of power in contested field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7(7): 971.
- [6] QUINN R, TOMPKINS-STANGE M, MEYERSON D. Beyond grantmaking: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s agents of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J]. *Nonprofit &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4(6): 950.
- [7] WALDRON T L, FISHER G, NAVIS C.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social mo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1): 131.
- [8] 周其仁. 制度企业家麦高文[J]. *IT 经理世界*, 2000(21): 89.
- [9] LI D K, FENG J, JIANG H.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2): 358.
- [10] 胡祖光, 张铭. 何谓“制度企业家”? 谁会成为“制度企业家”? ——来自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观点[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10): 72.
- [11] 朱海就, 刘业进. 制度企业家视角的市场与企业[C]. 科斯教授百岁华诞学术研讨会, 2010: 13.
- [12] 张维迎. 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16.
- [13] 周阳敏. 制度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1): 12.
- [14] VAN Eijk G A. Standardization used as a tactic b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The case of the hydrogen mobility industry in the Netherlands [D]. Utrecht: University of Utrecht, 2016.
- [15] BATTILANA J. Initiating divergent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enabling role of actors' social posi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 2007(1): 57.
- [16] 马晓静. 基于制度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

- 业家精神研究述评[J]. 商业时代,2013(27):104.
- [17] 张维迎. 什么是制度企业家[J]. 现代人才,2012(6):34.
- [18] 周一. 制度企业家[J]. 当代经理人,2002(1):26.
- [19] SHARMA U, LAWRENCE S, LOWE A. Accountants a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changing routines in a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counting & Management*,2014(3):190.
- [20] CANDELA R A.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Policy*,2015(1):136.
- [21] 刘云周. 制度企业家的作用研究[J]. 青年与社会(下),2015(3):245.
- [22] SOTARAUTA M, MUSTIKKAMAKI 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power, and knowledge in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Tampere, Finland[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2015(2):342.
- [23] MANDELKERN R. What made economists so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Governance-related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of Israel and beyond[J]. *New Political Economy*,2015(6):924.
- [24] SUN S L, ZHANG Y. Qihoo 360: building a free business model [J]. *The CASE Journal*,2015(2):163.
- [25] WAHID F, SEIN M K.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J].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People Process & Policy*,2013(1):127.
- [26] GREENWOOD R, SUDDABY 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1):27.
- [27] WALDORN T L, FISHER G, NAVIS C.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social mo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5(1):131.
- [28] CAMPOS N F. Context is everything: measur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9(20):1.
- [29] 王东方. 以小灵通案例研究中国制度企业家行为模式[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4.
- [30] NEE V, OPPER S.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M]. 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360.
- [31] SARMA S, SUN S L. The genesis of fabless business model: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in an adaptive ecosystem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6(3):1.
- [32]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J].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14(2):148.
- [33] HAGEL J, Brown J 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reating smarter organizations to scale learning [J].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2013(5):1.
- [34] RAFFAELLI 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novel, useful, and legitimate [J]. *Oxfor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2015(34):407.
- [35] SOTARAUTA M.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systems, and innovation policy [M]. New York: Springer New York, 2013: 1074-1081.
- [36] CAO X, LIU Y, CAO C.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on opportunity form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strategic new indus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2014(3):439.
- [37] BRUTON G D, AHLSTROM D, LI H L.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move in the fut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10(3):421.
- [38] HALL P A, THELEN K.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J]. *Socio-Economic Review*,2009(1):7.



引用格式:刘晋飞.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41-46.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41-06

# 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of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in China

刘晋飞<sup>1,2</sup>

LIU Jinfei

1. 东莞行政学院 文化与社会教研部, 广东 东莞 523083;
2.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跨文化管理是我国外资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议题。通过对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分析,发现我国外资企业存在员工之间的跨文化冲突、管理文化冲突和经营理念冲突等问题。解决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应积极实施人力资源本土化策略,减少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实施多元文化相容策略,促进不同国别文化互补融合,化解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开展跨文化培训,促进员工之间的文化认知与理解。

**关键词:**

外资企业;  
跨文化管理;  
多元文化

收稿日期:2018-04-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JL046)

作者简介:刘晋飞(1982—),男,山西省太原市人,东莞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外商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国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商务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1—12月,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18392亿美元,同比增长9.02%;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9776亿美元,同比增长6.63%。东方财富数据中心的统计显示,2018年1—2月,我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210.62亿美元,同比增长1.73%。面对我国外资结构不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态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巩固外贸稳中向好势头,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表明,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和有序引导外资企业健康发展,仍将是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关键因素。在吸引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跨国经营中,由于组织内部员工多元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成为跨国企业管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跨文化管理由此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持续探讨的热点议题。近几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如吉利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美的收购库卡等,都面临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管理难题。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外资企业“走进来”,企业跨文化管理成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对跨文化管理内涵做出阐释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决策参考。

## 一、跨文化管理概述

### 1. 跨文化管理的含义

从人类贸易史来看,跨文化管理起源于古

老的国际贸易往来,古埃及人、古希腊人等较早地开始海外贸易,逐渐产生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商业贸易的认知与实践,形成早期的跨文化管理活动。至近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兴起,跨文化管理逐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起来。有学者认为,跨文化管理可界定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效管理”,核心是对文化差异的有效管理,主体是企业,手段是文化,对象是“走出去”或“走进来”企业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和员工<sup>[1]</sup>。也有学者认为,跨文化管理是指与企业有关的不同文化群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文化矛盾和冲突时,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达到异质文化之间彼此的理解、沟通、协调和融合,从而高效地实现企业管理<sup>[2]</sup>。笔者认为,跨文化管理是指一个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克服和化解多元文化所引发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以达到文化融合并形成自身企业文化的有效管理过程。

### 2. 跨文化管理的特征

跨文化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涉及文化和管理两个领域,其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性、沟通交互性、价值同一性和管理多元性四个方面。

其一,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性跨文化管理的本质特征。W. Stephen<sup>[3]</sup>认为,跨国公司经营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忽视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跨文化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产生的文化交叉现象,所以跨文化又可称为交叉文化,而交叉文化恰恰是产生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的根源。跨文化研究奠基人H. Geert<sup>[4]</sup>研究表明,文化差异的来源主要包括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度—女性度和短期—长期取向五个维度,这为跨文化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后续诸多学者对文化差异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研究,其分类标准与研究结果虽各有不同,但普遍认同文化差异性跨文化管理的基本要素,它是跨文化管理区别于一般企业管理的最突出特征。

其二,沟通交互性。从企业组织内部的微观个体考察,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员工,由于文化认同、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冲突或矛盾现象。因此,跨文化管理本身就演变成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个体在同一企业文化环境下的自组织沟通和协调过程,这种沟通行为具有很强的交互性,主要体现为(直接或间接)冲突、妥协和融合三种形式。N. Adler<sup>[5]</sup>通过研究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冲突,认为组织内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沟通形式:第一种是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强势企业文化,它主导和驾驭其他形态的文化,弱势文化或小团体文化受压制,此种情况容易导致冲突发生;第二种是多种文化相互妥协退让,尽可能回避矛盾,形成最大程度的妥协,彼此相安无事;第三种是尊重各种文化差异,彼此包容、理解、融合,尽可能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显然,第三种方式利于企业将各种文化去粗取精,有助于内部管理和外部的稳健扩张。

其三,价值同一性。跨文化管理的目标是建立一套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价值系统,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最终达成价值统一,以此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本、激发员工的潜力和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实现价值同一是跨文化管理的价值目标。张素峰<sup>[6]</sup>认为,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主要包括母国文化主导型、当地文化主导型、文化嫁接型和企业文化主导型四种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跨文化管理的最终取向是实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方面的融合和同一。

其四,管理多元性。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必然要求企业管理方式的多元化。C. T. Kulik<sup>[7]</sup>认为,多元化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既包括组织如何实现管理多样化的价值观、信念和规范,也包含组织为满足多样化员工的需求而采取的一系列多元化管理政策与实践。通过多元化管理,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员工多样性优

势,消除差异性冲突,从而使得员工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贡献。可以说,采取多元化管理方式能够较好地消解企业内部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是实现跨文化管理的有效手段。

## 二、文献综述

1950年代欧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全球资本扩张,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越来越频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文化差异对企业海外经营的重要性,文化成为企业管理认知与发展的要素,跨文化管理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学界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企业跨国并购越来越多,学者们发表的关于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 1. 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偏重于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诸多学者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阐释跨文化管理的理论渊源,具有代表性的有价值双向理论、五因素文化阐释理论、七因素文化架构理论和国家集群理论等理论模型,其中最为典型的理论当属H. Geert提出的五因素文化阐释理论<sup>[4]</sup>。该理论与我国儒家思想相契合,因此对我国企业开展跨文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此为基础,后续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研究,B. L. Kirkman等<sup>[8]</sup>进一步研究证实了H. Geert五因素文化阐释理论框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A. S. Tsui等<sup>[9]</sup>指出,H. Geert五因素文化阐释理论的文化价值维度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sup>[9]</sup>。

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部分学者开始探索本土化的跨文化管理理论,尝试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以拓展我国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深度与

广度。杜荣等<sup>[10]</sup>以“承诺式信任”和“说服式信任”作为两个极端点,提出了“信任的连续统一体”模型,构建了跨文化信任框架,给出了关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促进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思考;周建波<sup>[11]</sup>对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伦理中的暧昧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暧昧文化与暧昧法则支配了非正式组织的利益取向和私下行为,对中国的组织管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探讨了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适用性,对我国管理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反思。

## 2. 跨文化管理的方法应用与实证分析

跨文化管理的方法应用与实证分析是当前学界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J. M. Brett等<sup>[12]</sup>运用发展文化松紧性理论,提出多层次研究方法,扩展了跨文化管理研究方法。A. Iribame<sup>[13]</sup>通过对荷兰、德国、法国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文化接触可以划分为直接接触(跨国公司不同文化的个体直接交流)和间接接触(跨国公司的理念被潜移默化地运用到不同文化形态中),两种接触都可能产生文化冲突,因此,他进一步提出有效沟通、深入理解文化差异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办法。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跨文化管理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李自杰等<sup>[14]</sup>通过对106家外资企业的调查,发现文化差异是影响合资企业绩效的重要原因;信任能够加强国家间文化差异对绩效的正向影响,沟通会减弱组织文化差异对绩效的负向影响。吴友富<sup>[1]</sup>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并购和海外经营,由于要面临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加强跨文化管理。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知,跨文化管理作为文化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从目前学界研究情况来看,国外研究成果较为系统、科学,国内对跨文化管理领域的研究以实证应用研究为主,本土化理论建构较少,这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如何构建具有中国语境的跨文化管理理论,将外资企业在华跨文化管理的经验总结提炼,还需诸多学者关注和探讨。

## 三、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外资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存在差异,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同地方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准则不同,跨文化冲突和管理已经成为影响外资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实践来看,目前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1. 员工之间的跨文化冲突

外资企业员工多元化特征非常明显,多数企业既有母公司派遣员工,也有中国员工。这两个群体之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思维方式、信仰、社会习惯、文化传统等),常常会出现文化冲突、沟通障碍,从而降低团体合作的契合度。此外,部分外资企业员工由于长期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习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往往会在言语和行为上跟他人产生冲动意向,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比如,中国人说话含蓄,在表明自身意图前往往会有一层铺垫,但是西方人说话直白,做事直接。由于语言沟通和行为表达方面的差异,在团队合作和项目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外方人员和中国员工执行不一致的现象,导致团队效率降低。外籍员工与中国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不仅会影响员工工作效率,甚至还会影响企业的长足发展。

### 2. 管理文化冲突

西方文化主张人权,提倡个人主义,注重个体意识与价值,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达成集体利益。在个体与集体之间,特别主张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体行为,通过严格的制度和体制进行管理,防止个人主义泛滥导致企业凝聚力不强,因此外籍员工更加注重制度、程序和效率。



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提倡集体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与利益要服从于集体价值和集体利益,认为个体只有参与并实现集体利益,才能实现个体利益。在个体与集体之间,中国员工往往更倾向于人治,认为西方程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过于死板,期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理团队。因此,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往往会带来管理文化的冲突,影响企业凝聚力和团队建设。

### 3. 经营理念冲突

由于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和员工通常会在经营目标、计划制定、价值观等方面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中国的企业管理层在投资方面较为保守,注重短期收益,不敢轻易冒险或做出改变,在企业收益较好的时候不是先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而是先考虑利润的分配问题。相比较而言,外籍管理者更加强调冒险和创新,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追求企业的持续性,更愿意花大量的资金投入新项目研究,开发新产品,勇于做出改变,把资金投入企业的长远发展上。这两种相差甚远的经营理念,会导致外方人员和中国员工在对企业经营理念的确立上出现矛盾现象,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冲突。

## 四、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对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髓,是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我国外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企业凝聚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实现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建立适宜的企业文化,以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 1. 积极实施人力资源本土化策略,减少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

本土化策略通俗地讲就是“入乡随俗”,主张外资企业应积极地融入本地文化环境。成功的本土化策略,应能够使企业文化迅速与当地文化融合,逐渐消除外来企业对东道主国家的

陌生感。在本土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人力资源本土化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可以迅速使外资企业和本地市场、消费者建立联系,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以国内的外资企业为例,外资企业要克服跨文化管理难题,应适当招募中国员工,注重听取中国员工建议,如此才能使企业决策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具体做法包括:选用在其他外资企业工作过的有经验的本土人才;选用在本地留学或者工作的外籍人员;选用在母公司所在国家留学或工作过的本地人才。

### 2. 实施多元文化相容策略,促进不同国别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化解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

文化相容策略是指在外资企业中不把母国文化作为企业主体文化,同时尊重和包容其他文化,从而实现文化并存和交融。成功的多元文化相容策略可以极大程度地发挥不同文化的优势,让多种文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而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以文化相容的不同程度为依据,多元文化相容策略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平行相容策略。外资企业把当地文化作为其主体文化,再融合母公司文化,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即便母公司文化与其子公司所在地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平行相容策略情况下,两者不仅不会发生冲突,还会实现互补。第二层次为和平相容策略。在认识和尊重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尽可能寻找多元文化的共通性,主动避开不同文化中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部分,模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实现多元文化和平相容。其核心在于尊重不同文化,求同存异、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对方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以形成一种全新的、稳定的、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企业文化。

### 3. 开展跨文化培训,促进员工之间的文化认知与理解

跨文化培训是企业解决跨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跨文化培训的目的在于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更加了解彼此文化差异,使跨文化

沟通变得更加容易,使大家对彼此的行为和语言达成理解。在具体操作上,跨文化培训应注重把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召集在一起,进行专项文化培训,加深大家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可采用研讨会、情景对话、交换角色等方式,打破跨文化沟通障碍。跨文化培训的效果考量包括三个方面:(1)员工对文化差异达到基本了解,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特征;(2)个人交际能力得到增强,员工心理更加健康;(3)外籍管理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能够采取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决策。

## 五、结语

跨文化管理是我国外资企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由于中外企业员工在文化价值、道德标准、经营理念等方面的差异,跨文化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外资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我国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分析,发现我国外资企业存在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管理文化冲突和经营理念冲突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积极实施人力资源本土化策略,化解员工间文化冲突;实施多元文化相容策略,促进不同国别文化互补融合;开展跨文化培训,促进员工间文化认知与理解。这些举措能够为我国外资企业应对和化解跨文化冲突与矛盾,增强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实效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吴友富. 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跨文化管理[J]. 跨文化管理, 2017(1): 1.
- [2] 李彦亮. 跨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管理[J]. 科学社会主义, 2006(2): 70.
- [3] STEPHEN W. Culture's role in conflic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some sugges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5(23): 739.
- [4] GEERT H. Culture's consequences[J].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0(4): 79.
- [5] ADLER 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 Boston, MA: PWS Kent, 1991: 120-125.
- [6] 张素峰. 国际化经营与跨文化管理[J]. 长江论坛, 2003(4): 33.
- [7] KULIK C T. Working below and above the line: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 in diversity management[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14(2): 129.
- [8] KIRKMAN B L, KIRMAN, LOWE K B, et al. A retrospective on culture's consequences: the 32-years journe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48): 12.
- [9] TSUI A S, NIFADKAR S S, OU A Y. Cross-national,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advances, gaps, and recommend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33): 426.
- [10] 杜荣, 艾时钟, BRUGHA C M. 基于思维法则学的跨文化信任框架——综合中国本土化思想与西方理论的尝试[J]. 管理学报, 2012(3): 338.
- [11] 周建波. 中国管理环境: 暧昧文化因子、管理真实形态与情境嵌入机理[J]. 管理学报, 2012(6): 785.
- [12] BRETT J M, GELFAND M J. 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of negotiation theory[J]. L Thompson Frontiers of Negotiation Research, 2006(4): 598.
- [13] LAURENT A.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western conceptions of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983(13): 98.
- [14] 李自杰, 张雪峰. 国家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09(10): 93.



引用格式:路华,王世成,曹志鹏.风险管理视角下中国鞋业竞争力提升的风险因素与对策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47-52.

中图分类号:F42;TS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47-06

# 风险管理视角下中国鞋业竞争力提升的风险因素与对策分析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 of Chinese footwear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路华<sup>1,2</sup>, 王世成<sup>1,3</sup>, 曹志鹏<sup>1</sup>

LU Hua, WANG Shicheng, CAO Zhipeng

1. 陕西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2. 中国皮革协会, 北京 100044;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北京 100833

**摘要:**我国鞋业当前发展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制造方面,一定程度上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产能布局明显地受综合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2)在国际贸易方面,进口国对出口国的关税水平、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剧烈影响;(3)在国内消费方面,受消费趋势变化等因素影响较大;(4)在国家政策方面,各类转型升级引导性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以及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将直接对鞋业发展带来积极或消极影响。规避我国鞋业发展风险,提升我国鞋业竞争力,应研判鞋业潜在增长率,合理设定目标,做好风险管理规划;同时还要从供给侧角度增强行业内生动力,提高鞋业风险应对能力与竞争力。

**关键词:**

中国鞋业;  
风险管理;  
核心竞争力;  
国际贸易;  
供给侧

收稿日期:2018-05-31

**作者简介:**路华(1984—),男,山东省昌乐县人,陕西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轻工技术经济与管理;王世成(1953—),男,吉林省吉林市人,陕西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轻工技术经济与管理。

中国是世界鞋业大国,其产量、出口量、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sup>[1]</sup>。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鞋业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增速从原来的两位数快速下滑到个位数,尤其是出口量在2015、2016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鞋业的发展历程中尚属首次,对行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鞋业竞争力的提升带来极大压力,行业发展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鞋业发展背后的风险进行分析,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

风险管理的思想自古就有,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始于20世纪上半叶,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分散研究向全面风险管理研究演进。目前,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与行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Williams等认为,风险管理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分析和控制,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使风险所致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科学管理<sup>[2-3]</sup>;周琳<sup>[4]</sup>指出,美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提供了风险管理的重要规范;严复海等<sup>[5-6]</sup>将风险管理分为传统风险管理、现代风险管理和全面风险管理等发展阶段;刘笑霞等<sup>[7]</sup>对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系统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张海兰<sup>[8]</sup>对张家口民营企业发展风险进行了研究;林谦<sup>[9]</sup>构建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的一般模型,并对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张瑶等<sup>[10]</sup>利用模糊分析法对国内部分制造业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在鞋业领域,有关风险管理的文献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在对我国鞋业发展的风险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鞋业发展的风险因素,提出规避我国鞋业发展风险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鞋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鞋业持续健康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参考。

## 一、中国鞋业发展的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环节,只有对各类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的识别,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鞋作为一种商品,其流程包括生产、贸易、消费等环节。相应地,我国鞋业发展的风险识别也表现在生产、进出口贸易以及满足本国市场的能力等方面<sup>[11]</sup>。

从生产制造角度看,鞋业虽然在技术、资本投入上不断快速提升,但一定程度上其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产能布局明显地受综合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如果生产成本过高,其产业竞争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全球鞋类贸易,进口国对出口国的关税水平、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剧烈的影响,甚至会直接将一国产品的进口完全阻断。

从国内消费角度看,鞋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品,其消费增速与宏观经济影响相辅相成,与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正相关,同时受消费趋势变化等因素影响较大。鞋业消费的变化必然会对相应的生产制造环节产生拉动或抑制的传导效应。

此外,从国家政策角度看,各类转型升级引导性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以及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将直接对鞋业发展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二、中国鞋业发展的风险因素分析

中国鞋业发展的风险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生产方面的风险

(1)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结构性用工荒带来的直接风险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年度增速

在两位数以上,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2009年,增速仍然为10%左右。以皮鞋生产为例,根据行业调研,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重约为20%,而这一比重在本世纪初仅为10%左右。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年轻一代就业观念的转变,东部沿海地区从2004年前后开始出现结构性用工荒,这种紧张趋势直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缓解。随着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长时间快速上涨,中国鞋业在全球市场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sup>[10]</sup>,其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挑战。

### (2) 创新驱动不足是行业发展的重大风险

我国制鞋业2016年的研发经费投入约为产值0.39%,远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94%的平均水平<sup>[12]</sup>。其中,仅有的研究和实验经费主要投向实验发展,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较少,包括对脚型数据、新材料、新设备等在内的一些基础研究的支撑力度远不能满足行业升级发展的需求;全行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机构很少;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相对不足。创新投入不足及创新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良等原因,加剧了鞋类产品同质化,导致鞋类产品频繁遭到来自国外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创新驱动不足已经对鞋业全行业的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行业发展的短板和面临的主要风险。

### (3)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偏低的制约风险

我国鞋业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设计研发数字化、生产制造自动化、仓储物流智能化、分销零售智慧化等工作,整体上还处在试点阶段,中小企业两化融合发展动力不足,通过两化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运营效率的空间很大。近年来,鞋业在生产环节自动化制造方面有了一定提升,但基本局限在单机应用阶段,各个设

备之间信息化串联尚没有实现,全流程信息化综合集成实现难度仍然较大。与信息化、自动化关系密切的先进生产装备自主研发的能力还较弱,仍然依赖从意大利等国家进口。这样一来,如果出现类似2018年发生的美国对中兴的制裁案,鞋业生产制造使用的高端装备来源也可能受限。

## 2. 国际贸易方面的风险

### (1)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导致外部拉动力不足

鞋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2016年全球鞋类产量230亿双,其中全球鞋类出口为138亿双,中国鞋类出口为93亿双<sup>[10]</sup>。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主要发达经济体冷热不均,新兴市场增长放缓,国际需求整体疲软,同时在这一周期中中国鞋类生产综合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中国鞋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和竞争力有所下降。

### (2) 各类贸易壁垒对鞋业出口带来了直接且剧烈的冲击

当前部分鞋业产能已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其原因除劳动力成本因素外,出口目的地对来自不同国家的鞋类产品收取不同水平的关税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例如,越南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大鞋类生产国,与欧盟已经签署自贸协定,鞋类产品出口到欧盟享受优惠关税,而中国鞋类出口到欧盟仍然需要缴纳正常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时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包括越南等众多东南亚国家在内,直接导致短时间内不少中国鞋业生产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

针对中国鞋业的各类贸易救济措施带来的风险更加直接。从1995年开始,欧盟对中国部分鞋类实施了长达10年的配额限制,2006年10月开始对中国产皮面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税,中间经过日落复审,反倾销措施一直持

续到2011年3月。根据商务部数据,2006—2008年,欧盟对华推行的皮鞋反倾销措施,共影响1000多家企业、3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造成10多万人失业。此外,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秘鲁、厄瓜多尔、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对中国鞋类发起反倾销调查等各类贸易救济措施,直接制约了中国鞋业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如欧盟关于鞋类的技术法规,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平台、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等对鞋类产品的通报召回等,都对我国的鞋类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中国鞋业发展带来不同程度且不可预见的风险。

(3) 国际竞争对手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鞋业带来的风险

越南、印尼是世界鞋类前五大生产国的两国,鞋类出口仅次于中国,分别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与中国鞋类出口竞争激烈。2008年前,中国鞋业出口年均增速高于越南和印尼,但金融危机后,年均增速低于越南和印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鞋类进口国,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美国进口来自中国的鞋类金额占比在2010年达到顶点,为76%,而后逐年下降,截至2017年,该数据降至58%。而与此同时,美国进口来自越南的鞋类金额占比从8%快速提升至19%。从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克拉克、布朗鞋业等国际品牌采购来源国和裕元等知名代工企业在大陆产能布局数据看,2010年前后,中国逐渐失去了这些国际品牌采购体系中最大采购来源国的位置。

### 3. 消费方面的风险

(1) 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对国内鞋类消费增长带来压力

中国当前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同时随着2020年小康社会

的全面建成,居民消费能力将不断提升,消费习惯和多元需求将发生变化,人均鞋类消费量有望不断增加。另外,由于国内人口总量不断增长,支撑鞋类消费的人口基数优势明显,作为人口基数与人均消费量乘积的鞋类消费总量,未来整体市场将保持一定增长。但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有一定的阵痛期,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出现回落:与2013年相比,2016年该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2017年回落0.8个百分点<sup>[13]</sup>,居民消费预期呈现某些转变,国内鞋类消费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的数据,2017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鞋类销售量同比下降1.5%。在这个过程中,众多鞋类企业库存大量增加,造成资金长时间占用,大幅打折清库存造成利润率低下,企业经营出现较大困难,并直接影响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健康发展,为行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传导性风险。

(2) 消费趋势变化后企业调整滞后带来较大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80后”“90后”消费者成为消费主力,鞋类消费趋势呈现极大变化,鞋类产品多样化、时尚化、个性化、绿色化、智能化成为主流,运动休闲类、非真皮类鞋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占领市场,进而带动供应链少量多样、快速响应,消费渠道线上线下不断融合。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与消费趋势快速变化在时间上形成叠加,在催生一批新企业的同时,使众多在原来市场和消费环境中经营相对稳定的企业由于需要一定时间进行适应性调整,经营难度陡然加大,销售收入增长乏力,甚至连续数年大幅下滑,终端店面数量、净利润等关键指标大幅下降,个别企业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破产。

消费趋势变化中的运动休闲风格的快速流行对鞋业整体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

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细分场景的鞋类需求不断增加,除商务、休闲、时尚、运动等不同生活场景对鞋类需求不同外,同一场景下需求也进一步细分,如不同运动项目的特定需求,这在鞋类消费中的直观表现就是人均消费量快速增长。但随着运动休闲品类鞋的流行,休闲鞋、时尚鞋与一般运动鞋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消费者对不同生活场景中不同风格的鞋类搭配的需求降低,在鞋类消费中的直接表现就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需要的鞋类数量相对减少,鞋类生产增长乏力。

(3)国内有效供给不足,无法满足消费升级新增量需求造成的风险

当前,鞋类境外消费、进口消费、高端消费不断升温。虽然近年来鞋类生产、消费和出口等方面增长压力极大,但由于国内制鞋企业整体以生产加工为主,商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渠道等环节竞争力还较弱,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中低端产品过剩。随着消费升级的不断推进,国内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提升速度滞后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导致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鞋的进口却依然保持10%~20%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国内传统供给无法满足消费升级新需求的矛盾不断凸显。如果这一趋势长期保持下去,势必对国内生产的鞋类形成巨大威胁,从而使我国鞋业发展竞争力遭到削弱。

#### 4. 政策法规方面的风险

各级政府不断推出的各类政策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包括鞋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发展。但个别措施出台后,短期内可能会对行业发展带来一定困扰,如金融危机期间不断严格规定的社保要求,在出台之初对鞋业生产成本增加带来了较大影响,一度成为企业向政府部门反映的热点诉求。

绿色制造是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制鞋行业环保基础较差,制鞋企业大气排放

标准与制鞋行业排污许可证管理规范等相关国家环保标准正在制定中。如果标准有关限值或内容与行业实际相差较大,将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根据中国皮革协会估算,仅新版排污许可证申领及其相应的环评手续补办,就可能直接将一批制鞋企业淘汰,虽然从中长期看,这些政策将推动鞋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但短期之内势必会对鞋业发展造成一定冲击。

### 三、规避中国鞋业发展风险、提升中国鞋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规避中国鞋业发展风险、提升中国鞋业竞争力的措施,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1. 研判鞋业潜在增长率,合理设定目标,做好风险管理规划

风险是实现目标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目标设定是风险管理的前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制定行业或企业发展规划、设定发展目标时,应充分调研、分析当前的要素水平可能支撑的潜在增长率。目标设定越客观合理,风险管理越容易实现。

此外,由于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而原有的风险管理方案是基于当时的发展环境而制定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不再有效。因此,风险管理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对风险管理的各个要素进行动态关注并及时调整发展目标,以确保风险管理的持续有效,从而将行业持续发展中的风险降到最低。

#### 2. 从供给侧角度增强行业发展内生动力,提高鞋业风险应对能力与竞争力

其一,从生产制造方面看,应从脚型大数据、鞋类舒适性评价等行业基础应用研究与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加大对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力度,提升产品流行趋势研究和各类技术中心、设计中心等产业创新公共平台和孵化器建设水平,逐渐实现创新从战

略跟随到战略引领的转变,切实提高鞋业自主创新供给能力;应加大先进适用自动化与智能设备研发和引进力度,深入开展“互联网+”活动,提升研发、制造、供应链全程数字化和两化深度融合水平,推进生产组织形式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建设满足少量多样、实时响应需要的柔性供应链管理系统,提高行业高效率弹性制造和优质制造的供给能力;应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梯度转移,以智能制造为重要突破口,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降低产业发展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提高鞋业区域协调发展的供给能力;应建立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推动绿色制造技术普及、应用与产业化,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制造供给能力。

其二,从国际贸易方面看,应加强对国际鞋类标准与技术法规的跟踪、研究与预判,优化鞋类出口目的地结构,分散国际贸易风险,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进行产能国际合作,提高我国鞋业化解国际贸易风险的能力。

其三,从国内消费方面看,应密切关注消费变化,充分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要,尤其是个性化、品质化、时尚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等鞋类产品需求,以新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同时逐步对部分进口鞋类产品进行有效替代,提高满足内销市场鞋类消费升级需求的有效供给能力。

其四,从政策方面看,应优化政策环境的供给能力。应加大对企业各类创新投入的财政扶持力度,对购买先进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企业给予合理税收优惠,打通国际贸易的双边、多边优惠关税通道,在引导和督促企业不断增强环保意识和绿色发展责任的基础上,适当设缓冲期,倒逼企业加大相关投入和整改力度。

## 参考文献:

- [1] APICCAPS. World footwear year book[M]. Portugal Porto: Diario do Porto, 2017.
- [2] 王稳,王东.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 审计研究, 2010(4):96.
- [3] 曹元坤,王光俊. 企业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趋势的新认识[J]. 当代财经, 2011(1):85.
- [4] 周琳. 风险管理视角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研究[J]. 财会通讯, 2011(23):153.
- [5] 严复海,张冉. 企业风险管理与业绩评价整合: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17.
- [6] 王农跃. 论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J]. 商场现代化, 2008(7):148.
- [7] 刘笑霞,李明辉. 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系统化过程[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76.
- [8] 张海兰. 我国西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风险管理现状与对策分析——以张家口为例[J]. 特区经济, 2009(5):144.
- [9] 林谦. 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J]. 金融论坛, 2009(7):59.
- [10] 张瑶,郭雪萌. 风险管理视角下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J]. 理论与改革, 2015(1):86.
- [11] 路华,王世成. 基于综合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中国鞋业竞争力分析[J]. 中国皮革, 2018(4):56.
- [12]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8-02-28)[2018-03-12].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 [13] 国家统计局. 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17-10-09)[2018-03-12].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0/t20171009\\_1540386.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0/t20171009_1540386.html).





引用格式:付翠莲.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优化策略[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53-60.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53-08

#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Some defect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subjects of major decision-making

付翠莲

FU Cuilian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基于传统维稳思维下决策科学性缺失与自由裁量权过大并存的现实,倒逼地方政府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一种评估。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稳评”主体的重要性凸显。在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建构上存在国家提供的政策不充分,原有的评估主体呈现出主体单一化、结构安排权责不明晰、评估主体失位或缺位等诸多问题,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在“稳评”过程中的象征性执行,社会风险防控效果递减。为提升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应构建如下以党政机关、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专业机构为主体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1)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评估主体的优势和功能,提升“稳评”的权威性;(2)鼓励私人机构、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实施评估,提高“稳评”的民主性与科学性;(3)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提高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稳评”的积极性。

**关键词:**

重大决策;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社会风险防控;  
多元主体评估模式

收稿日期:2018-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SH072)

作者简介:付翠莲(1973—),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温州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社会治理。

## 一、“稳评”机制的出台及其相关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体制变迁和政策转轨,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尚不充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大量因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社会风险不断累积,整个社会呈现出发展增速与风险共生的表征。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sup>[1]</sup>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以行政管制作调节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刚性维稳机制,必然会滋生出大量不稳定现象。在此背景下,作为重大决策出台之前的程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运而生。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是指出台重大决策前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社会问题作出的预评估,即对在重大政策制定、出台及其实施后可能发生的危害社会稳定的诸因素进行分析,评估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频率,对不同的风险进行管理,做好危机预防与计划准备工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降低、消除危害社会稳定的风险,超前做好教育引导和预防化解工作。<sup>[2]</sup>“稳评”机制是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超越,是对政府传统治理方式的扬弃,能够起到“重民意、保民利、消民怨”的作用,可有效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实现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在重大决策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妥善考虑社会各个层面的承受能力,能够周全照顾相

关群体的利益诉求,推进“关口前移、重心下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起到“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应评尽评、事后化解”的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稳事件的发生。

早在1970年代,部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就开始推出一系列预警系统以预测经济安全问题,通过选择一些敏感指标组成系统的、有机联系的指标体系,辨识和测评某些具有代表性或先兆性的变量,评估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如“美国商情指数”(“哈佛指数”)、法国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日本景气警告指数”等。<sup>[3-4]</sup>1990年代以来,在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的复杂环境下,群体性事件频发,影响了社会稳定。而地方政府的传统管控型维稳模式对此越来越无能为力,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描述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状态,即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sup>[5]</sup>,凸显出传统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治理困境,倒逼地方政府借鉴国外合作治理的模式,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上议事日程。自2005年四川省遂宁市探索制定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以来,各地不断效仿“遂宁模式”,到2012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已初步建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sup>[6]</sup>,且风险防治效果明显。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也连续发文要求各地全面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2010年11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指出:“要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做出决策。”<sup>[7]</sup>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十二五规划”把“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and 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写进规划纲要;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

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2号),提出了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规定了评估范围和评估内容,明确了评估主体和评估程序,重点对需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决策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进行了评估,并对评估结果的运用、决策实施跟踪、责任追究等做了详细说明。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多次强调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进一步明确了“稳评”机制的国家战略地位。至此,基于传统维稳思维下决策科学性缺失与自由裁量权过大并存的现实,由地方政府为缓解维稳压力、避免陷入治理困境而进行的“稳评”创新探索,遵从“社会问题—政策—法律”的逻辑演进路径,使得地方政府从源头上寻求治理社会不稳定的方法而出台的政策最终上升为法律和国家的顶层设计。

“稳评”机制自提出到目前全面铺开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然而,各地在评估主体、评估范围、评估内容、评估流程、评估指标体系、责任倒查机制等方面做法不一,该项制度仍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在众多问题中,稳评主体由于在整个评估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受到更多关注。在“稳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受评估主体的单一化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在“稳评”任务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采取象征性执行的应对策略,即执行过程中采取做表面文章、走过场、制作虚伪文本材料等仪式化的策略<sup>[8]</sup>,使“稳评”政策在执行和落地过程中的效果打折,甚至部分已在决策前通过“稳评”的项目,如江苏启东王子纸厂排水、四川什邡钨铜等项目,由于“稳评”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实施后仍然引发群众的集体抗议和抵制,致使“稳评”失灵。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视角<sup>[9]</sup>,通过对当前“稳评”主体的剖析,试分析如下问题:当前“稳评”的主体是否合理抑或是否存在缺陷?为什么政学两界都叫好的“稳评”机制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会演变为形式主义、仪式化的“象征性稳评”<sup>[8]</sup>?在目前委托评估的单位往往是直接利益主体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如何确保独立性?基于这些疑问,本文拟以评估主体作为切入点,剖析“稳评”中评估主体存在的若干问题,以期为“稳评”机制最终走向客观中立提出具体可行的优化策略。

## 二、“稳评”过程中评估主体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影响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观察,目前我国各地推进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基本延续了从地方试验到中央承认的政策推广模式,并按照以下逻辑方式演进:地方政府为解决治理困境与维稳压力而进行的“稳评”创新探索,在不同地方进行扩散、模仿和改造后层层上报,上层及时总结经验成果,得到中央的认可后转变为中央的决策,再通过类法律的形式向下逐层推行。在这个过程中,“稳评”主体居于“稳评”机制中的核心位置。而当前“稳评”主体范围单一狭窄、各评估主体间权责关系不明晰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使得“稳评”随意性较大,影响了“稳评”效果。

### 1. 评估主体以单一的党政机关为主影响了“稳评”的规范化

重大决策是指由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的,涉及面广且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决策事项。由于“重大决策”在法律上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概念,对于“重大”的定性及其范围界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缺乏明晰统一的衡量标准,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规范和严谨的程序,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和基层行政单

位在决策过程中不做扎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缺乏决策民主,往往由行政首长“三拍”决策,即拍着脑袋作决定,拍着胸脯表决心,拍着屁股推责任<sup>[10]</sup>,最后以“拍脑袋”评估了事,致使主观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时有发生。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以及最后的政策评估,大多以党政机关为主,再加上在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建构上国家提供的政策不充分,法制建构的针对性、全面性、系统性仍滞后于“稳评”实践与社会治理的要求,反过来也影响了“稳评”的规范化。这种单一化的评估主体在评估实践过程中有可能把重要决策和一般性决策都笼统归为“重大”而全部纳入“稳评”范畴,使“稳评”项目泛滥,导致行政成本增加、行政资源浪费;或者是把任何决策都列入“非重大”决策而不纳入评估范围,使“稳评”制度因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失控和滥用而名存实亡,难以对“稳评”实践起到应有的规范与制约作用。

## 2. 评估决策主体与评估实施主体的同一性导致“稳评”的形式化

重大决策事项风险评估专业性较强且涉及多重利益,除评估实施主体和评估决策主体外,应引入多元主体参与评估,方能确保“稳评”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但我国地方政府的风险评估规定中往往很少规定评估实施单位,因此实践中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单位性质各异,很多都是项目实施单位自行组织评估,也有借助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中介组织实行评估的。笔者在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考察中发现,该市评估主体是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评估”的原则来确定的,主要包括重大决策事项提出部门、政策起草部门、改革牵头部门、项目申报审批部门、工作实施部门等。涉及到多部门、职能交叉而难以界定评估直接责任部门的重大事项,由

定海区委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小组指定评估责任部门。<sup>[11]</sup>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定海区区委、区政府直接授意定海区委政法委牵头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定海区委政法委实际上在风险评估中担任主角。而政法委作为领导和管理地方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也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综合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参与主体,在“稳评”过程中维稳部门既是决策者又是评估的组织领导者显然违例、不妥。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承担了整个评估过程实施主体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对需要提交本级党委和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政策事项进行初审,评估决策主体牵头负责评估,最后再反馈给评估实施主体组织的纪检监察机关,由他们对评估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几乎主导了“稳评”程序中的所有工作。中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发生在一个党和国家相互“嵌入”的独特结构和政治生态中,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主导下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呈现出“高位推动”特点。<sup>[9]</sup>从上下隶属关系上讲,受同级党委领导的政法委,很难对同级党委、政府做出的决策实施实质性的监督。另外,涉及多部门、职能交叉而难以界定评估直接责任主体的重大事项,由党委、政府“指定”评估责任主体<sup>[3]</sup>,这样一来,“稳评”决策主体与评估实施主体实际上是重合的,这易使“稳评”沦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难以对党委、政府的不当决策加以否定,无法确保“稳评”机制贯彻落实到位。

## 3. 评估主体忽略评估程序导致“稳评”工具化

行政决策程序不规范也会影响到“稳评”的效果。据笔者调研,定海区实行的风险评估程序规定将“稳评”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风险评估阶段。由事项责任部门全面收集、掌握评估对象信息,准确预测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形成评估报告,呈报部门初审。二是审查决定阶段。

由政研、法制、维稳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党委、政府或有权作出决定的机构集体会审,作出实施、暂缓实施或暂不实施的决定,反馈会审意见,提出工作要求。三是决定实施阶段。存在矛盾问题、评估认定可实施的重大“维稳”事项,及时研究解决矛盾的具体措施;存在重大矛盾和稳定隐患、评估认定暂缓实施或不实施的“维稳”事项,研究对策、化解矛盾,待时机成熟后再实施;符合政策法规规定,亟需实施但易引发矛盾冲突的“维稳”事项,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针对性工作。上述“稳评”程序从文本上看规范、合理,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决定重大决策是否进行评估时往往采取“选择性政策执行”<sup>[12]</sup>的策略:一方面将能够给民众带来利益、可以“花钱买稳定”的项目纳入“稳评”;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在重大决策出台前象征性执行“稳评”程序,采取先决策、后走过场式评估,抑或先出台、后补程序的所谓“认认真真”地“走程序”的方式,即“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表面上是对“稳评”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是对上级“稳评”政策进行改造和利用,甚至搞“变通”执行,精心制作“稳评”文本材料,成功应付上级的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可能遇到抵触或难以通过评估的项目,进行隐瞒或采取直接上马而不进行“稳评”,使“稳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道证成决策合法性的必要程序而已”<sup>[8]</sup>,使“稳评”成为浪费巨大人力物力的面子工程。在对重大事项开展“稳评”实践中,部分“稳评”责任主体单位虽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规范评估程序,但不明确评估追责制度,对评估结果缺乏行政问责,只是在任务时限到期前随意安排综治维稳中心办公人员编写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里做文字游戏,设置诸多假设条件,评估过程变成做表面文章,评管脱节、评而不用或者用评估应付上级相关规定的形式主义问题泛滥,出现

稳评主体层级(省、市、县级)不确定、评估实施主体不愿评、评估责任主体不履行评估主体责任或者责任下推、评估监督主体监督乏力、问责追责不力<sup>[13]</sup>等诸多困境,使“稳评”仅仅体现在工具化意义上而最终走样。

#### 4. 评估主体独立性不够影响“稳评”结果的客观性

评估主体的独立性是保证评估质量的关键因素。作为评估机制的关键因素,“稳评”主体间权责的分配是关乎“稳评”主体获得权力、履行职责、承担责任的重要问题,极大地影响着重大项目评估过程中“稳评”主体的协调配合、绩效评价、责任追究等。<sup>[13]</sup>在“谁主管、谁负责”的评估原则指导下,目前实施评估的主体主要有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三类评估机构,但在实际评估过程中这三类评估主体均存在独立性不够的情况。一看项目实施单位。由于充分了解项目背景,项目实施单位能够协调信访、公安等公共维稳部门,方便组织专家论证会、听证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能够较全面地掌握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风险因素,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直接谈判以减少、减轻或消除风险因素。但项目实施单位作为项目启动的利益方,可能会为了项目的启动或得到审批和实施而在“稳评”中掺杂单位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因素,使评估结果难以保持客观中立。二看大型项目咨询评估公司。传统维稳思维催生了一个较为中立的行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业,以及一批专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司。在“稳评”过程中,项目咨询评估公司独立、客观的身份和立场,有利于分析判断重大政策出台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因素,以便提供给相关部门作决策参考。但由于咨询公司不能参与谈判,面对各类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咨询公司很难完全理解和掌握项目背景、项目实施过程的细节和难点,无法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掌握项目面临的全盘风险。三看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重大政策的出台、重大项目的上马往往存在巨大的法律、经济类风险,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可以充分利用其处理纠纷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自身在法律和审计方面的专长,敏锐地找出风险点,做出扎实的民意调查和民意沟通工作,以减少或消除相关风险因素;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性、理论性强,能够为政策出台、项目实施提供准确恰当的意见。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加之相关法律和制度保障缺乏,无法独立完成整个风险评估,一旦出现未能预测到的风险情况,第三方评估机构无法独立承担后续失察责任。此外,各评估主体权责关系不明晰也导致“稳评”中各部门之间权力和职责交叉,责任界定较难,责任倒查过程中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评估责任追究较难<sup>[14]</sup>,最终导致评估主体不愿评、不会评、不敢评、不能评等现象的出现<sup>[15]</sup>,致使“稳评”结果乏力、低效,且难以做到客观中立,最终偏离政策目标。

### 三、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制度体系和策略路径

目前我国党政领导下的“稳评”工作采取的是“谁主管,谁负责”的形式,以维稳部门为主导,此种做法容易导致决策层面失之于宽,制约力明显不够。以维稳部门和政府为主体的评估,容易为了落实上级领导的意图而在风险评估报告中回避相关矛盾点,陷入“自己评自己”的怪圈,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履职、错履职乃至乱履职现象,影响评估主体的中立性和评估报告的客观性。因此,各地方政府在风险评估规定中应当规范评估主体的构成,将党委部门列提案、政府部门做组织、专业第三方机构做主导、

人大部门做监督、利益相关者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加以分工细化,厘清“稳评”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间的关系,使“稳评”从完全的政府自我评估,逐渐过渡为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柔性化的多元评估,用第三方的智识来消解改革决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传统的被动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反应性维稳机制,向预见性、前瞻性、超越性的能动维稳机制转型。构建党政机关、立法机关、第三方专业机构、大众媒体、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估体系,可使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相互嵌入、相互合作并形成合力,以提升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 1.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评估主体的优势和功能,提升“稳评”的权威性

人大、政协对政府工作负有监督职能,可以通过履行权力监督、民主监督职能限制行政权力,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提供有效的保障,为基层社会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缓冲带。“地方代议机构的基本性质就是一种地方民意的表达机关和地方政治力量的竞争舞台”<sup>[16]</sup>,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他们通过专项调研、代表视察等形式深入地体察民情、民意,能够敏锐地探察社会稳定风险,在维护社会稳定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人大作为一个建立在最广泛民意基础上的民意机关,能够集中反映公民的意见和要求,能够最好地聚集民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阶层公民的利益和要求,更加关注民生、更能反映民意,方便按照法定职权通过专项监督、视察调研、询问质询等方式,协助督促决策机关依法行政。“稳评”机制需要人大以立法的方式将其上升为法律。在评估过程中,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协机构是“稳评”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功能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可以充分发挥人大、

政协的监督作用,将其监督与建言献策的职能延伸到重大行政决策领域,强化监督的针对性,进一步提高监督的实效。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运用“党委建议,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其从源头监督行政权力的职能和权力,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稳定风险。

## 2. 鼓励私人机构、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实施评估,提高“稳评”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充分发挥思想库作用,这对“稳评”中的政策制定和出台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政府部门对于某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决策也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士对所有技术性决策进行客观评估<sup>[17]</sup>,因此就需要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入区别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所谓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指除政府(政策制定方)与普通公众(政策承受方)外,与该政策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专家学者与第三方专业性评估机构。“稳评”属于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保证评估结论的科学性,必须按评估内容要求,以服务外包的形式组织相关第三方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委托第三方评估需要健全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支撑,以合同外包的形式规范“稳评”外包费用支付标准和规则,激励专业机构参与评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中介组织、民间非政府组织社会评价研究机构等各类智库,应在建构法治国家的框架下,成为第三方“稳评”的主导力量。培育第三方社会力量,将评估关口向决策前置,依靠第三方专业理论知识和研究经验,使其公正、客观、独立地行使第三方评估的权利,发挥评估的真正效能,充分发挥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并综合运用多种研判方式,相互印证,有利于有效实现评估结果的民主化和科学性,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民主化水平。

## 3. 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提高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稳评”的积极性

作为民意的发源地和风险的策源地,社会主体理应成为“稳评”主体,这是“稳评”机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政府继续垄断风险治理的职能,势必会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sup>[18]</sup>党政部门应摒弃自闭型束缚,重塑合作治理理念,扩大治理主体范围,开创新时代党政主导下的多元社会共治新格局。现代公共政策具有如下特性:“一是政策目标群体规模更大、构成更复杂,因而难以准确识别;二是公共政策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即一项政策的制定或执行有时会引发其他一些政策领域的风险从隐性逐渐演化为现实的冲突;三是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即时滞性)”<sup>[19]</sup>,决定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必不可少。而在我国,公众参与“稳评”的人数量少,即使参与也主要是包括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被动的线下“走形式”参与。因此,“稳评”应吸收尽可能多的社区、专家、公民,特别是受政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即“那些能够影响重大决策目标的实现或受重大决策目标影响的团体及其个人”<sup>[20]</sup>参与,以形成“以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次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补充的、动态的稳评活动单元”<sup>[20]</sup>。通过发动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和相关公众直接参与决策制定,充分保障这些社会主体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公众对决策的风险认知偏差,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理性风险认知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P·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刘为,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38.
- [2] 付翠莲.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治保

- 障研究[J]. 行政与法, 2013(3): 22.
- [3] 戴辉, 戴大新, 金海燕. 规避涉民利益冲突 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基于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J]. 学理论, 2010(36): 67.
- [4] 中共绍兴市委政法委员会课题组.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1(2): 37.
- [5]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吴英姿, 孙淑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91.
- [6] 张玉磊.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第三方参与: 意义、困境与对策[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4(1): 167.
- [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EB/OL]. (2010-11-08)[2017-05-30].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11/08/c\\_127511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11/08/c_12751134.htm).
- [8] 田先红, 罗兴佐. 官僚组织间关系与政策的象征性执行——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讨论中心[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5(5): 70.
- [9] 贺东航, 孔繁斌.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5): 61.
- [10] 梁仲明, 王建军. 论中国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J]. 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 90.
- [11] 付翠莲.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6-127.
- [12] 欧博文, 李连江. 中国乡村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EB/OL]. (2011-02-23)[2017-04-28].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fenzhishehuixue/nongcunshihuixue/2011-03-01/12259.html>.
- [13] 白鹭, 王楠. 浅谈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间权责问题[J]. 改革与开放, 2015(19): 54.
- [14] 蒋俊杰. 我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现状、难点与对策[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90.
- [15] 王阳.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效果分析——以“评估主体”的规定为重点[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3): 116.
- [16] 何俊志. 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J]. 政治学研究, 2016(5): 59.
- [17] 张诗晨, 廖秀健.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反思与完善——基于3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J]. 电子政务, 2017(4): 95.
- [18] 乌尔里希·贝克, 王武龙.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3): 26.
- [19] 黄杰. 需关注重大政策类稳评中的共识构建[N]. 学习时报, 2016-05-16(005).
- [20] 王锋, 胡象明.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J]. 新视野, 2012(4): 58.





引用格式:陈建平,刘成晨. 地方政府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出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破冰之旅及其当下启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61-71.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61-11

# 地方政府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破冰之旅及其当下启示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faced by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trial of official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The pioneering work in the Altay region of Xinjiang and its present enlightenment

陈建平<sup>1,2</sup>,刘成晨<sup>3</sup>

CHEN Jianping, LIU Chengchen

1.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 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2;
3. 桂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素有“阳光法案”之称的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监督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80年代,我国便开始进行与该制度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全国率先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因其在试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主客观方面的障碍,这一探索渐趋式微。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国家在探索以财产申报制度为代表的廉政制度建设方面,必须在权威性、长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自觉性等方面综合考量,寻求完善之路,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关键词:**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预防腐败;  
廉政;  
新疆阿勒泰

收稿日期:2018-01-12

基金项目:福建省行政管理学会科研与决策咨询项目2017年度重点项目(2017A01);201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重点项目(JAS150210)

作者简介:陈建平(1980—),男,福建省南平市人,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福建省纪委监委、福州市纪委监委监察局特约研究员,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基层治理、廉政建设与党政问责;刘成晨(1988—),男,湖北省荆门市人,桂林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网络政治学。

素有“阳光法案”之称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项防腐和防腐制度,它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80年代我国便开始进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1994年就曾将《财产申报法》提请列入立法规划,并于次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中央规定》)。11年后,在总结已有建制经验的基础上,作为重要党内法规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于2006年正式颁布实施,其中对有关事项的申报规定与一些做法,实质上就是借鉴了国外通行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相较此前的文本,这一规定在报告事项内容、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展。

伴随着中央相关规定的出台,我国一些地方也在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被视为我国地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破冰之旅,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时过境迁,当初备受关注的“第一个吃螃蟹”的行为如今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年创建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廉政网”内如今已找不到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更新资料。无独有偶,被称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最彻底的模式”的湖南“浏阳模式”,现如今也处于半停滞状态,其“只申报不公开”的做法早已偏离了原初的建制目标与运行轨道。鉴于此,本文拟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样本,关注财产申报制度的制度效力及其式微的内在机理,重点剖析我国实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其可能的超越路径,以更好推动该制度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一、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建制背景和发展历程

### 1. 建制背景

如前所述,我国对于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这一“阳光法案”的探索始于1980年代,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在立法层面一度受阻,试点探索也相对艰难。但是,鉴于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高效制度之一,人们还是对其推动和创新制度反腐寄予了厚望。在预防腐败、制度反腐日益成为当下社会共识并被纳入我国反腐格局的大背景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于新世纪再次呼之欲出。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此次破冰扬帆之地是地处我国西部边陲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而非人们想象中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仅这一点就打破了人们的常规认识。因为按照西方学者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赛特的观点,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发展呈正相关,“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sup>[1]</sup>。与之持相近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塞缪尔·P. 亨廷顿,他同样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主的实现,“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sup>[2]</sup>。在我国,破冰之地始于阿勒泰地区是否证伪了上述观点不得而知,也非本文重点,但它确实提醒我们思考阿勒泰地区作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之“试验田”的特殊意义。一是阿勒泰财力有限,“穷则思变”,“变”则需要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和服务水平,而加强廉政建设就是一个重要抓手。二是其地方财政整体收入不高,权钱交易的贪腐存量较少,反腐压力不是太大。三是其地区领导吴伟平有着纪检监察履职经历,具备廉政制度创新的敏锐感,也有着推动建制实施的领导力。于是,在内外部环境逐步改善、主客观条件不断优化的情况下,新疆阿

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实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在地方探索廉政治理与创新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 2. 发展历程

概而言之,新疆阿勒泰地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主要经历了动员建制—开通廉网—倒计时提示—首批公示—推行者离世—试点“折戟”—循序重启这几个阶段(如图1所示)。

考虑到干部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实际上在该试行制度出台前,新疆阿勒泰地区就通过相关渠道进行了广泛的政策法规、廉洁教育方面的宣传动员。阿勒泰预防腐败局为推动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出台提供了组织保障。2008年5月25日,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下文,正式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简称《地方规定》),被誉为“阳光法案”的阿勒泰版本正式“揭开面纱”。紧接着,9月16日,于地区政府网站之外首家独立的廉政专网——新疆阿勒泰地区廉政网正式开通,成为继《地方规定》出台之后又一项强力的廉政举措。该廉政网还有一个特色,即设置了与众不同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倒计时专栏。从2009年1月1日起,首批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财产予以公示。阿勒泰地区首次财产申报工作于2009年1月19日全部结束。随后,该地区于2009年2月17日又将1056名县处级干部的工资奖金全部上网公示,其力度之大,国内罕见<sup>[3]</sup>。阿勒泰地区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良好开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

不少地区前往学习取经,甚至一度引起中纪委关注。然而随着该制度推行者吴伟平的因病离世,阿勒泰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也陷入低谷,各项举措和相关信息停止推进或更新,“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试点“折戟”,留下了不少遗憾。

中共十八大以后,有关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出台乃至立法的呼声再次高涨,中共十八大报告就提出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及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时,也表示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些党政文件都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从长远来看,有关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正式出台值得期待,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首范效应及其制度“遗产”却是无法绕开的参照点。

## 二、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特色和意义

### 1. 制度特色与创新之处

回顾阿勒泰地区试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较之前颁布的《中央规定》和其他一些零星探索,该制度无论在申报主体、申报内容、申报管理还是申报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创新之处(见表1)。阿勒泰地区财产申报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收入而且包括更为广义的财产,实现了申报内容的本质飞跃。申报对象也实现了广覆盖,由领导干部个体扩展到其家庭成员;具有实权的科级干部也首次被纳入申报对象,格外引人注目。当时在全国层面,个人事项报告仅限于副处级以上干部,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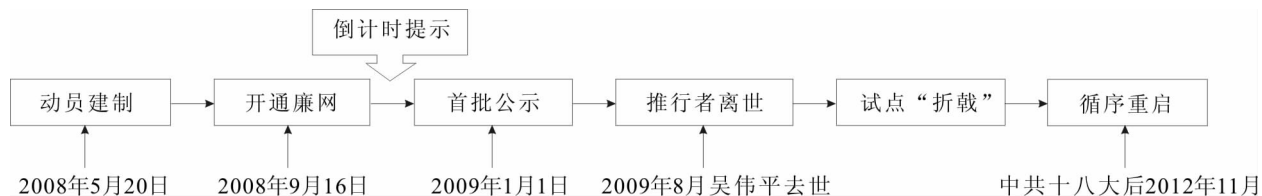


图1 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财产申报制度的发展历程

非拟提拔为副处的科级干部是否需要报告,中央并无明确要求。但是自2015年以来,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笼子”也越扎越紧,除本研究所涉及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全国至少有北京、安徽、贵州、海南、青海、江西、江苏、广西、甘肃、陕西等十余省区市的部分地区,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已下沉至科级。<sup>[4]</sup>由是观之,阿勒泰地区先前的做法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让人耳目一新的突破点还在于离任领导干部,其财产申报延续3年,更具“杀伤力”的是申报结果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核查。这些制度亮点和实质性推进被外界称为“了不起的制度创新”。

## 2. 制度试行的重要意义

阿勒泰地区在全国率先试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显示了其廉政建设的决心和态度,给当地政治生态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阿勒泰探试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从

启动申报到公示前夕,阿勒泰地区纪检委开设的廉政账户共收到申报对象主动上缴款物价值76万多元。阿勒泰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加快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化进程,进而加快其立法进程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它迈出了通过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来编织权力“笼子”的实质性步伐,对于预防腐败、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意义重大。特别是阿勒泰地区先试先行的探索经验及其所呈现的示范效应不可小觑。在阿勒泰地区制度反腐创新及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启示下,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安徽庐江、江西黎川和广东省等地随之也进行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实践探索。香港星岛日报网曾评价其可与“安徽凤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块试验田”的意义<sup>[7]</sup>相比肩,这一高度评价和赞誉表明这一探索作为制度反腐的有机构成,对于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净化社会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表1 阿勒泰地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创新做法一览表

比较事项	前溯规定与做法	阿勒泰地区的创新做法
申报主体	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地区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4套班子主要领导</li> <li>2. 涵盖地区法检两院、地直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县(处)级领导干部</li> <li>3. 具有实权的科级干部被包含在内</li> <li>4. 县(处)级领导干部由领导职务改为非领导职务,正式办理退休手续者,其中申报时间延续3年</li> </ol>
申报内容	收入申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li> <li>2. 不再只限定个人收入和劳务收入,还包括其他收入,如股票、证券、期货交易收入,由继承、赠与、偶然所得(如中彩)等方式获得的财产等</li> <li>3. 既包括本人的财产,也包括家庭成员的财产</li> <li>4. 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既包括债权也包括债务</li> <li>5. 官员家庭成员的大额交易也要申报</li> </ol>
申报管理	重申报,轻审查和问责;申报受理与审查机关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具备了申报、受理、监督、公开、处罚等建制的基本要素</li> <li>2. 建立独立且具有权威的管理机构:A. 申报受理机构:区纪检委党风廉政建设室;B. 申报审查机构:区纪检委所属阿勒泰地区预防腐败办公室</li> </ol>
申报结果	以内部监督为主,依照规定申报,无须公开,结果应用不充分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确立公开公示制度,通过当地媒体、网站等向社会公开,并接受各界举报</li> <li>2. 电视台、电台、平面媒体、互联网等新闻机构在申报对象受到严重党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后可申请查阅、使用相关申报材料</li> </ol>

注:本表内容主要根据廖晓明等<sup>[5]</sup>73-81和刘志勇<sup>[6]</sup>文献及部分网络资料加以整理修改而成

### 三、新疆阿勒泰地区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遇到的困境与障碍

在外界的高度关注下,阿勒泰地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破冰前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也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这让多年步履维艰、缓慢行进中的建制探索看到了希望。然而,随着主政者吴伟平因病遽然离世,刚起步半年多的阿勒泰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仅保有初期战果和原有申报制度的常规化运作,鲜有相应的执行政策或实施细则上的突破。政策的短期性使得改革的可持续性乏力,受制于宏观制度气候与外部舆论压力,作为试点的探索实践终究无法深入到制度改革的核心层,最终遗憾地走向了沉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在阿勒泰地区跌宕起伏的变迁命运,多少也折射出了该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破冰前行的艰辛。

而同样是制度探索,在韩国的反腐历程中其命运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尽管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是新疆阿勒泰地区作为地方政府层面的廉政探索,与韩国作为国家层面的廉政探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也能得到一些重要启示。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对《公职人员道德法》进行彻底修订,这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相容,客观条件也不具备,但是金泳三的政治勇气与领导垂范对于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在韩国的最终确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sup>[8]</sup>,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与条件之间就一定存在着严格的正相关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就时机来讲,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已是一种趋势,晚推出不如早推出,与其坐等时机,

不如创造时机,加快推进该制度的建立<sup>[9]</sup>。不过,从新疆阿勒泰地区试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整个历程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制度探索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 1. 领导干部认知水平的阻力

一项针对阿勒泰地区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区领导干部对财产申报制度态度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反对者占70%,无所谓者占20%,坚决支持者仅占10%<sup>[10]</sup>。显而易见,领导干部本身既是财产申报制度推行的主体,同时也是该制度的执行客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其由于自身认知水平的不足而异化为制度推行的阻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于慎谈身家的中国领导干部来说,公布自己的财产像“裸体一样尴尬”<sup>[11]</sup>。经济学告诉我们,“规则来源于自利”<sup>[12]</sup>,基于经济人理性的视角分析,财产申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并无利益和好处可言。一方面,这与我国财不外露的传统观念有关;另一方面,这与领导干部“觉得建立这个制度是对他们品格的不信任,是对党培养教育多年的事实进行怀疑甚至否定”<sup>[13]</sup>的看法有关。因而,在阿勒泰地区首次公开千余名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情况时,我们发现,虽然县(处)级干部的申报率高达98.97%,科级干部的申报率甚至达到100%,未发生无故拒不申报现象,但“礼金”栏呈现“零申报”,这也表明该制度从一开始便遭遇了公开配合与隐性抵触并存的悖反现象。

#### 2. 制度设计的不足

《法制日报》曾分析指出,目前我国腐败行为之所以层出不穷且金额屡创新高,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付之阙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雷厉风行的反腐行动中,已有百余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落马,这些落马者的财产均远远超出其正常的职务收入。而上级政府在案件侦破前,对其财产情况了解甚少,公众更无从得知,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

申报制度出现“失灵”,说明制度设计存在疏漏,加之执行中的障碍和偏差,进而导致制度本身形同虚设。“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sup>[14]</sup>如缺少良善而有效的制度建构与执行,有效规范领导干部的职业行为便无从谈起,更不能寄希望于其自觉而坦荡地开诚布公。

阿勒泰地区初期颁布的《地方规定》由该地区纪检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出台,从制度发布主体来看,该规定主要还是作为党政机关的内部规范而出台的。从金字塔式的法规位阶结构体系来看,由于不是正式立法,跟正式法规有位阶差异,该文件不可避免地会与现存的一些法规产生矛盾和冲突。例如,有鉴于领导干部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权衡难题,在国外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在我国的《公务员法》中未见规定,这样势必会遭遇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或者不同法规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

### 3. 不同标准导致执行偏差

诚如美国政策学者 G. 艾莉森所言,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 10%,而其余的 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sup>[15]</sup>。而制度的有效执行需要建基于相对统一的执行标准。阿勒泰地区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时,采取了秘密申报和公开申报相结合的方式,对财产申报内容只是实行“有限公开”,这使得该项制度丧失了“公开透明”的改革底色,以至偏离初始轨道。其中秘密申报的内容如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股票、证券、期货等交易收入及资金来源,干部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由继承、赠与、偶然所得等形式获得的财产,甚至利用婚丧收取下属的礼金和干部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大额交易等,只申报不公开,填写的《秘密申报表》也仅供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是预防腐败部门内部掌握

和使用<sup>[16]</sup>。既然有“公开”与“秘密”之分,自然就给该制度的执行留下了“灰色空间”。这有违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理念,严重制约了财产申报制度效力的充分释放,更无法将此项改革引向深入和彻底。除公开与否、公开范围的争议外,无统一的标准也是引人诟病的一个制度缺陷。

### 4. 改革者信念和决心不同导致制度的不确定性

随着阿勒泰地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开拓者的离世,原先如火如荼的财产申报制度陷入了停滞与沉寂。继任者认为,“有些条件还不匹配,法制环境也需改善”<sup>[17]</sup>,这一非常正式的官语背后折射出当下政治制度创新与改革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和不确定性——制度贯彻的连续性与主事者息息相关,制度能否执行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否能够延续。阿勒泰地区财产申报制度的命运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吴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附着了其个人意志与改革魄力,其教训是:尽管这一改革深得民心,也是趋势所向,但是在未得到制度化保障时,仅凭个人意志和热情行事,难免会人走政息。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任何一项科学制度的产生和见效,都存在一个“预设的可行性、推行的秩序性、监督的持久性”的过程<sup>[18]</sup>。这对于中国探索和实施以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为代表的廉政制度创新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

## 四、走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困境的路径思考

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申报和公开公职人员财产,对于打造阳光政府、防止贪腐行为、构建昌明的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都是一种有效的制度。2012年世界银行对全球 176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137 个国家已建立起公职人

员财产申报系统<sup>[19]</sup>。这一数据也显示了该制度的效用所在。随着公民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不断觉醒,国家反腐力度越来越大,对于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尽管也有多个地方进行了试点,有了增量改革的积累,但是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仍需要面对现实困难,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 1. 以上率下高层推动,强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权威性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自上而下的高层推动是财产申报制度成功实施的重要途径。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带头转作风,“以上率下,以正治政”,形成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整体联动,客观上收到了“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不仅提升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由此可见,要真正推进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有效实施,富有权威性的廉政领导力须臾不可或缺。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群众,都希望高层领导能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希望通过高层示范作用来推动整个财产申报制度良性快速发展。据此,有学者提出了自上而下,由高层领导带头,通过立法的方式由高层逐步向基层推进的路径设计<sup>[5]120</sup>。这些看法颇有见地,值得借鉴。在铁腕治腐的政治决心和政治气象中,在原有制度遗产的基础上,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将日益健全并走向法治化是可期的。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sup>[20]</sup>。正是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报告和公开有关

事项的探索与实践又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为打造中国特色领导干部报告和公示有关事项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 2. 科学规划制度顶层设计,强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长效性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抓手,在我国一直处于党纪政纪层面,对于当前我国严峻的腐败态势略显无力。阿勒泰地区颁布的《地方规定》在其实践过程中也暴露了效力不足的弱点。对此,有学者从腐败内控角度入手,认为要将公职人员道德规范制度化、法制化,将行政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制度、法律,进行道德立法,以有效地弥补道德自律的不足,从公职人员内在机制入手,推进行政伦理制度化<sup>[21]</sup>。而从技术操作层面来看,地区试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相关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甚至断裂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法规进行清理,将现行规范文件中与财产申报制度相关的不合理、不适应、不协调的规定进行彻底清理,提出废止或修缮意见,同时,确认并赋予财产申报制度一定的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宪法原则制定专门的财产申报制度,或者在公务员法或其他反腐败法律中将财产申报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将财产申报制度上升到法律的高位。就具体实施步骤而言,早在2013年就有学者提出,“在中国实行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可以分四步走:中共十八大之后,所有新提任乡科级干部必须申报和公示财产;2014年起,所有新提任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必须申报和公示财产;2016年起,所有新提任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必须申报和公示财产;2018年起,所有新提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申报和公示财产。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将大部分领导干部都纳入财产申报的范围,同时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和公示制度”<sup>[22]</sup>。对照现实的政治实践,这一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构的时间表和内容有些部分实现了,还有些部分尚未实现,仍待努力,同时制度实践也有待创新和强化之处。当下,制度治党日益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道,在越织越密的制度笼子中,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自然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 3. 完善配套措施,强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改革系统性

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吴玉良指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条件是欠缺的:一是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即使是好制度,实行起来也比较难<sup>[23]</sup>。上述观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中配套措施不足这一要害。一是在公示环节,如何让公职人员坦诚布公;二是罪与罚的测量,如何对瞒报、谎报、漏报等行为进行惩戒。可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应协调金融实名制、工资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等法律制度,为监控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真实性提供依据;其次,应建立公职人员行政伦理道德和诚信体系,将其是否如实登记财产报备纳入考核管理系统之中;再者,应与公务员法、刑法相协调,设置相应的罪名,对各层面严重违反该项制度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如有学者建议,“可先出台《〈公务员法〉修正案》,将财产申报制度列入《公务员法》,或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条例,最终上升为专门法,并与民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相协调,在刑法中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和‘财产申报不实罪’”<sup>[24]</sup>。

### 4. 抓关键少数且严实并举,强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

治国理政,关键在人;从严治党,首在治吏。

国家人社部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但有鉴于监督治理的成本和实施的可操作问题,无论是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旧版规定还是最新规定,包括阿勒泰地区的试点做法,都紧紧扭住了申报主体这一关键——“关键少数”。在我国政治体制结构中,县处级(含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及事业单位中相当职务管理人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数量上来看,该群体事关治国理政的队伍规模和稳定;从治理权能上来看,他们掌握着关键权力和资源;从质量上来看,他们直接关系到整个执政党肌体的健康、活力和生命,因此抓住县处级(含副职)以上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等于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除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外,还应采取一系列严实举措来维护该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实现从“有监督”到“严监督”的转变。从只报不核到既报告又核查,把申报制度这一利器作为从严管党的一项重要抓手,不断加大抽查力度,扩大抽查比例。“凡提必核”,将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后备干部人选和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都纳入重点核查范围。对不如实申报者加大惩处力度,进一步强化对结果的运用。据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因不如实报

告等问题被暂缓任用或取消提拔重用资格、后备干部人选资格的有1.1万人,受到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的有10.38万人,接受诫勉谈话的有1.98万人,受到组织处理的有651人,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的有609人<sup>[25]</sup>。这些数据显示了制度与实施策略的实效,对于一项监督制度而言,其只有具有可操作性,即可监督、可检查、可追究、可问责,才有生命力。

### 5. 积极培育认同意识,强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执行的自觉性

正如上文所说的,阿勒泰地区有近七成的



领导干部不支持财产申报制度,成了该制度实施的强大的隐性阻力。而制度得以落实的一个前提是制度主体对制度的认同。一般而言,制度认同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得到价值上的肯定;二是制度有转化为现实行为的趋势。<sup>[26]</sup>当前,在构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过程中,应协同重塑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价值观,加强廉政教育,采取相应的措施打消领导干部的顾虑,使其意识到将自己的财产状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最好保障,同时也是“清者自清”的坦诚和自我保护。让其认识到,个人事项报告不仅是一张纸面上的廉政“宣言”,同时它还是政治品德与政治作风的“晴雨表”,更是新时期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应让广大领导干部普遍认识到,是否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对党忠不忠诚、老不老实的具体体现<sup>[26]</sup>,也应让整个社会认识到,如实报告有关事项是对领导干部真管真严的有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促使干部形成接受监督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促进廉洁从政、廉洁齐家的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sup>[26]</sup>

## 六、余论:走向更加健全的中国 特色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回溯新疆阿勒泰地区“试水”财产申报制度的来龙去脉,不单单是为了感慨一项治理制度命运的跌宕起伏,“解剖麻雀”是为了更好地观测地方廉政制度创新的主要机理和作用,探究一项廉政制度成熟发展的演变规律,特别是将其放置于更广的政治生态中考察它的特殊意义。正因为如此,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试点探索虽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其破冰之举可圈可点,意义非凡。在各地试点探索似乎趋于沉寂时,有关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的话题其实一直都在延续(如表2所示)。2016年9月18日,

新疆阿勒泰市委原书记王仕斌被双开,使得阿勒泰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作为当年“阿勒泰经验”的主要见证者之一,王仕斌被媒体称为“首个财产被全国人民知道的领导干部”,此番被关注却是因为其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少数比较罕见的“六大纪律”全部违反的“全科”违纪者。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阿勒泰经验”,更不能因此对这项制度失去信心。这一事件本身或许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本身是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它也只承载了廉政制度的某些重要使命,如果没有配套的核实、倒查和追责机制,它很可能会沦为某些领导干部清廉表演的道具。

经过20多年的酝酿和试点,在社会广泛关注且逐步取得共识、相关配套措施逐步完善的情况下,被誉为“阳光法案”和“反腐利器”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也迎来了“又日新”的转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之际,建立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不断由试点逐步走向制度化并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如表2所示)。如前所述,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中组部、中办、国办等党政机构出台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形成了“一个规定、三个办法”的报告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规定和执行具有中国特色:相较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在申报主体和内容规定方面形成了广全兼备的特点,申报对象涉及面广,应报尽报的对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在执行方面形成了严实并举的特点。总之,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将一步步地走向深化,并被不断地优化。

表2 中共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创新发展

时间节点	涉及报告事项的条款或主要内容	制度属性或其他
2013年11月12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推行新提拔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作为“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2013年12月	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	主要依据2010年5月26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规定》
2014年1月	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	
2014年12月至2015年	2014年12月,中组部发出通知,对做好2015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作出安排。亮点:2015年1月起,扩大随机抽查比例,由3%~5%提高到10%;突出抓好重点抽查,“凡提必查”;进一步强化抽查核实结果的运用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2016年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加了关于“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不报告、不如实报告”的规制,并将其归入了违反组织纪律一章中: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新修订
2016年10月27日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章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第十四条)、第三章党委(党组)的监督(第十七条、特别是第二十四条)	新修订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必须强化组织观念,工作中重大问题和个人有关事项必须按规定程序向组织请示报告,离开岗位或工作所在地要事先向组织请示报告。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要严肃处理	新修订
2017年2月8日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报告事项14项(8项家事和6项家产)	新修订,同时旧规定废止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	新制定

注:该表内容主要根据上述所列制度文本及新闻媒体报道加以整理而成

## 参考文献:

- [1] 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
- [2] 塞缪尔·P. 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8.
- [3] 刘薇. 官员财产申报:阿勒泰试验斯人已逝[N]. 南方周末,2013-01-03(B19).
- [4] 金可镭. 十余省份试水科级干部“报家底”[N]. 南方都市报,2015-05-19(AA18).
- [5] 廖晓明,邱安民.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探索[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6] 刘志勇.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1-108.
- [7] 张军. 我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完善:以新疆阿勒泰为例[J]. 福州党校学报,2009(2):25.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98.
- [9] 刘伟. 财产申报制度:阿勒泰成中国范本[J]. 法治与社会,2009(3):13.
- [10] 李朝智. 强化干部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心理认同[J]. 领导科学,2010(25):8.
- [11] 吴杰,言科,郑春平. 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背景详解[J]. 政府法制,2009(8):10.
- [12] 道格拉斯·C.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68.

- [13] 刘志勇.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36.
- [14] 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M]. 盛葵阳,崔妙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33.
- [15] 陈振明. 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
- [16] 张军.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再上路——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网上公开官员财产为例[J]. 攀登, 2009(2):89.
- [17] 赵婷. 阿勒泰原纪委书记之死:一位挑战[EB/OL]. (2010-07-22)[2014-08-25]. <http://news.sohu.com/20100722/n273676326.shtml>.
- [18] 沈栖. 阿勒泰官员财产公开何以短命[N]. 上海法治报,2013-01-23(A07).
- [19] 张慧. 全球近半国家公布官员财产——官员财产公开,2013年从被动到主动?[N]. 青年参考,2013-05-29(07).
- [2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01).
- [21] 王柏杨.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伦理思考:兼评新疆阿勒泰实践[J]. 经济研究导刊,2011(4):148.
- [22] 徐吉成. 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可分四步走[N]. 学习时报,2013-01-21(04).
- [23] 邓永胜. 中纪委通报中共反腐进展 源头着手提高制度执行力[EB/OL]. (2011-06-22)[2014-08-25].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6-22/3129575.shtml>.
- [24] 刘晓晓. 推进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2):61.
- [25] 韩向辉. 如实亮家底 甘做“透明人”——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综述[N].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7-08-11(01).
- [26] 秦国民. 政治稳定视野下制度认同的构建[J]. 河南社会科学,2010(1):112.



引用格式: 邸晓星. 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发展历程与路径特点[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3): 72-77.

中图分类号: D60; G5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3-0072-06

# 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发展历程与路径特点

## The progress and path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talent exchanging and sharing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n the context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邸晓星

Di Xiaoxing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部, 天津 300191

**摘要:**在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京津冀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获得较快发展。通过十几年的发展,依托京津冀教育协同、人才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探索出了以高层次人才合作为重点对象、以教育联盟为重点方式的方法与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京津冀教育人才的交流共享在目标任务、具体策略、方式途径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区域、其他行业的自身特点:其一,以疏解教育领域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区域教育水平为主要目标;其二,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探索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创新方法;其三,以协同创新机制为助力,推动教育人才交流共享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这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其他领域人才资源共享,以及其他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

**关键词:**  
京津冀;  
教育人才;  
交流共享;  
协同发展

收稿日期: 2018-0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CDJ013); 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CEYP5069)

作者简介: 邸晓星(1984—),女,河北省深泽县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党建理论。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作为推动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人才在推动改革创新、引领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在教育领域,通过京津冀党委与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教育人才机构间的合作交流、政企校间的合作互动等,推动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进程,充分释放教育人才在提升区域教育品质、带动经济发展的活力,不仅对于提升京津冀教育行业师资队伍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促进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具有很大推动作用。本文拟在对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其路径特点,以期为该地区其他领域人才资源共享,以及其他地区的协同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 一、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发展历程

教育人才的合作交流是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之下,伴随着人才之间、京津冀教育单位之间的合作交流而开展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三地教育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人才合作交流,包括互派优秀教育人才挂职锻炼、举办教育合作论坛、召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建立高校联盟等,为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提供了多元途径,促进了人才协同发展。

早在2009年,在北京与河北、天津与河北之间就分别开展了高校优秀中青年干部挂职锻炼工作。在5年的时间里,京津冀分批分次选派优秀中青年干部互相挂职锻炼。其中,河北省共向北京、天津两市的市属重点高校选派了4批次、共计27名优秀中青年处级干部挂职校长助理,北京市也派出了13名优秀中青年处级干部到河北省属骨干大学挂职校长助理<sup>[1]</sup>。除此之外,为推动教育协同发展,促进人才之间的

交流,京津冀多次召开联合会议,由三省市政府人员、教育行业领导、教育专家共同参加研讨。比如,2014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教育智库论坛”在天津召开,来自三地的教育专家就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进行沟通交流。2015年,《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协作机制框架协议》和教育合作框架协议发布,提出北京和河北两地建立高等学校联盟,在包括干部教师培训挂职、人才培养与需求对接在内的诸多领域进行务实合作。2016年1月28日,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廊坊市三区市成立教育联盟,签订相关合作协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三区市教育联盟将合作培养百名教育领军人才,包括100名左右的骨干校长和100位左右的名师。2016年6月,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院成立,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协同—联动—共享”主题召开了专题论坛<sup>[2]</sup>。2017年2月17日,《“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计划》发布,确定了京津冀三地十大合作项目,京津冀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是其中之一。2017年10月9日,“2017京津冀校长交流会议”在京举办,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学院、天津市教育学会、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教育家成长研究会的领导,以及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部分中小学校长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京津冀的教育工作者围绕办学治学的思想思路和实践创新成果、深化综合改革背景下学校内涵发展的行动策略、京津冀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新路径,以及创新京津冀中小学校长协同发展机制等议题展开了探讨。2017年4月20日,京津冀三地共同举办了“2017年京津冀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计划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高层次人才需求岗位3020个,计8000人,覆盖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30个行业领域,涉及重点用人单位750多家<sup>[3]</sup>。

总体而言,近几年京津冀三地教育人才交流共享在形式上呈现多样化发展,人员范围覆盖了政府教育工作者、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科研机构教育人才等多方人才,既有政府主导推动下的高层次专家、优秀教育人才的挂职锻炼,也有以学校之间开展的联盟、创新中心、教育协同工作会议等为载体的交流合作,还有来自民间的自组织的某一领域、专业系统内的高端会议等,大大促进了京津冀之间在教育和专业建设方面的交流,为推动教育领域一体化深入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 二、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主要路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伴随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人才一体化发展进程,京津冀在教育人才交流共享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的路径。

### 1. 依托京津冀教育协同、人才协同发展,探索出推动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协调路径

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一直是依托京津冀教育协同、人才协同发展而开展的。例如,通过《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协作机制框架协议》,提出北京与河北两地的教育部门建立协同发展联系会议制度,进行定期协商,并组织开展干部教师培训挂职、学科专业建设、资源共建共享、人才培养和需求对接等方面的活动,推动两地教育领域深化交流合作。2016年京津冀三地人才合作沟通协调实现了常态化。2016年2月18日,三地党委组织部召开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工作机制》《京津冀高级专家数据库管理办法》等文件,标志着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官方协调机制正式建立,也表明党和政府对于以人才资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肯定与重

视,尤其是对于高层次人才合作的重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协调方式是2017年开始实施、定期召开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会。由此可见,京津冀教育人才合作交流的协调路径主要是依托京津冀教育协同协调机制和京津冀人才合作协调机制,从建立的时间来看,其目前还刚处于起步阶段。

### 2. 以高层次(教育)人才为重点对象,探索京津冀人才共引和共育共享路径

高层次人才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在高层次人才合作中,京津冀三地加强合力引才力度和柔性共享机制建设,共同打造高端人才集聚区,提高高层次人才的贡献率。教育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同样如此。具体做法为:一是对高层次人才初步实现资质互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继续教育证书互认,以及外国人工作证互认,对高端外国人才(A类)实行工作手续互认,对京津冀三地任一外国专家管理部门已审查过的材料不再进行核验,视同本地外籍人才转聘。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共引活动,通过搭建平台共聚人才,开展津洽会、京津冀博士后人才与项目引荐会等活动,共同招才引智。三是形成常态化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2015—2017年,京津冀三地的党委组织部门每年都举办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至今已举办3期,每期都有来自三地各领域的几十名优秀专家代表、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专家学者参加,通过专题讲座、政策解读、参观交流、现场教学、分组讨论、典型发言等形式,让高层次人才深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加强了高层次人才之间的交流和探讨。四是建立高级专家数据库,将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或入选省部级以上人才工程、计划、项目的专家,获得正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等纳入数据库,作为三地高层次人才资源的交流共享基础资源。

### 3. 以教育联盟为重点方式,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全方位开展人才交流共享活动

除打造高级专家数据库、开展人才引荐会等外,京津冀三地还联合成立了京津冀人才协会联盟,通过组织开展各类学术、科研、技术等交流项目,加强教育人才之间的交流互动。一是京津冀高校建立了协同创新机制,来自三地的多所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以及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等,以学科专业为板块组建协同创新中心,不但推动了科技创新,同时也加深了高校间同领域高层次人才之间在技术、学术、科研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有效释放了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同时,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京津冀高校干部、教师、学者之间的交流培养也日渐频繁,如开展京津冀高校校长、管理干部、教师异地挂职锻炼计划等。河北省与北京市互派 8 名教师到对方高校挂职,河北省派出 12 名优秀中层干部到天津市属高校挂职。天津外国语大学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校建立了定期访学和学术交流机制。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先后派遣 100 余名教师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进行访学<sup>[4]</sup>。二是在职业教育领域初步建立了京津冀产教对接“合作对话”“协同创新”“区域共研”和“区域联动”四大机制。通过开展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工作推进会、产教对接会等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加强职业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同时,京津冀职业教育还开展了联合师资培养工作,以该领域的高级管理人才、教育骨干为培养重点,如 2015 年 22 名邯郸市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在北京市相关职业院校担任“影子校长”;2015 年以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张家口、邯郸等地组织职业院校干部教师赴天津市学习培训,仅唐山市就有 160 多人接受了培训<sup>[5]</sup>。

## 三、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特点与成效

通过以上对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路径的梳理,可以发现,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在目标任务、具体策略、方式途径等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

### 1. 以疏解教育领域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区域教育水平为主要目标

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区域竞争力,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教育协同发展、人才协同发展同样要以此为目标。从目前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活动来看,北京正在做的就是适度控制教育规模,利用自身在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方面的优势,通过在天津、河北建立分校,转移部分教育功能,发挥首都人才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教育水平。天津、河北主要是加快人才引进载体建设,提升工业园区、楼宇经济、创业创意社区的软硬件环境,提升对重大项目和高层次人才的承载能力,通过高校搬迁、建立分校、合作办学、教育联盟等方式,充分利用北京的优势资源,提升人才资源发展水平。比如,天津市出台的《关于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加快集聚高层次人才的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对北京高层次人才的柔性引进;河北省出台的《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0年)》,也是聚焦于对京津人才的引进。

### 2. 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探索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的创新方法

在城市群中,区域性的重点城市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连接京津冀城市群的黄金三角地带,北京的通州、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廊坊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被

称为“通武廊金三角”。在近几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通武廊一马当先,从生态、交通、产业、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一体化发展探索,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点发展区域。2017年2月17日通过的《“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计划》提出,重点推进通武廊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实际上,通武廊人才合作早在2015年就已开始,当时通武廊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就提出,对取得通武廊三地人力社保部门认定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在三地可以“一证通行”。2016年10月,《通武廊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宣言》《通武廊区域人才互认标准》等文件发布,三地在人才引进互融互通、人才培养共育共培、人才评价互认互准、创新平台共建共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探索。在教育领域,2017年初,通武廊签署了《关于开展教育协同发展的合作协议》,提出了包括资源共享、师生交流在内的诸多方面的合作举措,探索跨行政区划的教育协同发展有效模式和路径,并在包括联合培养校长教师、共享网络教育资源等在内的6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为带动教育领域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与共享提供了重要活动载体和平台。2017年6月,通武廊三地派出18名干部(每地派出6名干部)到包括教育单位在内的核心业务部门重要岗位挂职锻炼,为期1年,半年轮换一次,为京津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积累了经验。

### 3. 以协同创新机制为助力,推动教育人才交流共享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过程呈现出以创新机制为重点,并逐步形成多元化交流方式、不断扩大交流范围、提升交流效果的趋势。一是突出协同创新机制建设,促进教育人才交流。2015年6月14日,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联合成立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高端智库和研究机构,围绕京津冀交通、环

境等共建若干创新中心,由3所院校的教师联合开展重大项目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为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服务。除此之外,京津冀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还以创新发展为目标,以行业、专业领域为体系,通过项目合作、技术研发等途径,进行高层次教育人才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例如,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以及京津冀大型中药制药企业成立了中药共建共享药材基地、中药注射剂产业合作组织、现代中药产业研究院;天津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等联合组建了天津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由天津理工大学牵头,联合中科院、中兴通讯、北京邮电大学,共同申报“400GB/s相干光发射与接收模块”研发项目,等等<sup>[5]</sup>。二是人才培养交流共享的方式多样化。交流的形式包括政府互派、学术交流、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参观学习等。一方面,高校的干部、骨干交流常态化开展,并从中产生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如2017年2月由挂职河北大学副校长的北京大学教授牵头,京津冀10多名挂职干部为课题组成员,共同开展了课题研究,并形成理论成果《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策略研究》。另一方面,京津冀教育人才联合培养交流共享常态化。《“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计划》提出,“京津冀联合建设教育人才队伍,将推动三地师范类院校在河北省联合建立教师培养培训重点基地;联合在河北省开展‘教师校长百千万工程’;三省市互派校长、教师、管理干部等挂职交流;完善三省市高校间教师访学交流机制”。河北省自“河北省千名中小学骨干校长教师赴京挂职学习”项目实施以来,每年选派200人到北京市中小学校跟岗学习培训,已连续开展5年<sup>[6]</sup>。除此之外,京津冀教育人才培养与交流的领域还呈现出更加广泛的发展趋



势,范围上涵盖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包括科技、文化等专业,人员上既有高层次教育管理人员、科研技术骨干,也有优秀教师、专家学者等。

#### 四、结语

总之,以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契机,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提升京津冀教育水平为目标,京津冀加强了教育人才之间的交流共享,形成了具有京津冀区域特色和教育人才特点的教育人才共享路径,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其他领域人才资源共享,以及其他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尽管如此,目前,由于京津冀教育人才交流共享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因而京津冀教育人才的交流共享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尚需要借助京津冀教育协同、人才一体化发展而推进,这既需要党委和政府的进一步支持,也需要民间积极参与,激发社会活力,释放人才效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 参考文献:

[1] 周洪松,禹跃昆,王友文. 河北教育发展突破

“冀”绊——探寻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河北实践[N]. 中国教育报,2015-11-12(0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划司.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在河北省举行[EB/OL]. (2017-02-21)[2018-04-07]. [http://www.moe.edu.cn/s78/A03/moe\\_639/201702/t20170220\\_296774.html](http://www.moe.edu.cn/s78/A03/moe_639/201702/t20170220_296774.html).

[3] 京津冀首次共同发布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EB/OL]. (2017-04-20)[2018-04-07]. <http://tj.people.com.cn/n2/2017/0420/c375366-30063824.html>.

[4] 京津冀教育一体化有哪些新动向?看看今天的推进会怎么说[EB/OL]. (2017-02-17)[2018-04-07]. [http://www.sohu.com/a/126542476\\_372476](http://www.sohu.com/a/126542476_372476).

[5] 京津冀三地召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EB/OL]. (2017-02-01)[2018-04-09]. <http://zhengwu.beijing.gov.cn/zwzt/jjyjt/zxxx/t1469042.htm>.

[6] “京牌名校”河北办分校 教育协同 红利不止京校入冀[EB/OL]. (2017-03-22)[2018-04-09]. [http://hebei.ifeng.com/a/20170322/5485970\\_0.shtml](http://hebei.ifeng.com/a/20170322/5485970_0.shtml).



引用格式:吕宾,俞睿. 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对策[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78-83.

中图分类号:D669.68;C91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78-06

# 城镇化进程中 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ft-behi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吕宾, 俞睿

LV Bin, YU Rui

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农民流动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常态,离土离乡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特征,留守群体已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大量男性农民的流出使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留守妇女文化水平总体偏低,缺乏参与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意识,而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又相对落后,农村文化日益衰落,这使得留守妇女难以融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之中,难以承担起农村文化建设的重任。因此,要建设农村文化,就要提高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从增强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收入、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维护农村留守妇女文化权益的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拓宽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渠道,为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条件。

**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文化;  
留守妇女;  
保障机制

收稿日期:2017-11-30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5YJC850008);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项目(MYB2017003)

作者简介:吕宾(1977—),男,吉林省四平市人,盐城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文化建设;俞睿(1968—),女,江苏省盐城市人,盐城工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中华大地丰富、多彩、厚重的农村文化。所谓农村文化,即农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包含农民所共同认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伦理道德、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等。农村文化传承的是农民所共同遵从的质朴、天然、善良和敦厚的人文精神,表达的是农民对农耕文明的理解与认知、对土地的敬畏和依恋。这种认可、传承和遵从体现了农村文化的历史脉络、文化符号、文化传统、文化构成和文化特质。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以其特有的农村文化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滋养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传承历经岁月积淀的优秀农村文化,并以文化创造者的身份推动农村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无论何时,农民都是农村文化形成、发展的推动者和农村文化建设、传播、传承的主体。

然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农民流动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常态,离土离乡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特征,留守群体已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随着大量城市文化进入农村,农村文化的内生秩序遭到了破坏,农村文化面临着生存和发展危机。在留守妇女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的大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好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增进其对农村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凝聚其智慧与力量,对于克服目前农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在对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提高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积极性的对策,以求教于学界。

## 一、留守妇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sup>[1]</sup>这意

味着农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出的农村文化,又会指导、影响农民的实践活动,满足其精神需求。因此,充分发展和利用农村文化,使其在农民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常常把“送文化”和“种文化”作为发展农村文化的两种方法。“送文化”作为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方法,强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以行政渠道将国家的文化意识传递给农民,弱化了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农民失去文化建设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选择权,失去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村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特质和生命力。“种文化”的文化建设方式则把农民视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发展与繁荣农村文化的内源性动力。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出根植于乡土、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农村文化,也能为农村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所以,从发展与繁荣农村文化的方式来看,农民必须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当前,在我国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快速流动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大特征。截至2016年,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已达到28171万人,其中男性占比达68.3%。<sup>[2]</sup>依然生活在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留守群体。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使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特殊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使留守妇女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担负着主客体的双重角色。农村文化建设的重任也自然落在她们肩上。如何发挥留守妇女的主观能动性,保障留守妇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帮助留守妇女树立起科学的文化意识,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些都是农村文化建设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 二、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

### 1. 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主体意识不强

文化主体意识是激发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然而,受传统观念和认识能力的制约,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不强。受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农村广大女性常把自己视为男性的附属者,在农村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由于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留守妇女在参与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常处于消极和被动的状态,即使丈夫在家庭中处于缺席的状态,留守妇女也多把自己视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局外人、旁观者,无意主动承担起农村文化建设的责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文化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选择,受传统观念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广大农村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18~64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其中农村女性为7.1年,农村女性中有2.1%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11.6%的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sup>[3]</sup>农村女性文化水平总体偏低,留守妇女难以准确地理解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措施,难以完全理解文化的存在价值与传承意义,主观上没有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内心缺乏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2. 留守妇女的经济压力较大

农村男性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男耕女织转变为男工女耕,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女性化特征。家庭成员结构的改变,使得原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管理转变为主要由留守妇女来承担。受知识水平低、缺乏生产技能、掌握就业信息和生产信息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留守妇女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较低、途径有限。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生

产力水平低、科技不发达、生产工具落后,广大留守妇女在从事农业生产时,主要依靠体力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进行,收入水平较低,留守妇女承受着来自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经济收入状况直接影响到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的态度和程度,艰难的生存状况,使留守妇女更加重视物质生活,而忽视文化生活,把文化生活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主动参与农村文化生活的意愿不强。较低的经济收入也使得留守妇女所向往的文化消费缺乏经济支撑,所向往的文化生活难以实现。

### 3. 留守妇女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弱化

男性农民的流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留守妇女的文化追求。男性流动农民在返乡或回流时,会将其在城市务工期间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带回家乡,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影响、改变留守妻子的文化认知。因此,部分留守妇女的消费观、婚姻观、道德观和家庭观等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手机已成为留守妇女的日常消费品。手机与网络不仅是留守妇女与丈夫保持联系、进行情感沟通的工具,也是留守妇女了解城市与城市文化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会通过现代媒体接触、体会城市文化,在城市文化的不断影响和渗透下,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等逐渐地城市化,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和迫切,城市文化成为其追逐的文化样态。在农民流动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常态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礼俗秩序的改变,异质文化的冲击和现代性因素的渗透,使传统农村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在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下,由于缺少先进文化的引领,留守妇女无法在不同文化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难以准确地理解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造成了留守妇女文化思想的混乱,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下降。

#### 4.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落后

农民的文化参与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善和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硬件设施,如建立农家书屋、文化站、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室等。国家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所做的努力和实践,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和农村文明建设、丰富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参差不齐,缺少必要公共文化设施,留守妇女在农闲时只能以打牌、打麻将、串门聊天和看电视等方式打发时间,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一些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文化基础设施更是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有些地区,虽然建立了图书馆、文化站、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但利用率不高,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农村图书馆书籍种类单一、陈旧,缺乏实用性,留守妇女所关心的农业生产技术、身心健康、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书籍十分缺乏。<sup>[4]</sup>在组织与开展农村文化活动过程中,基层政府无法有效地将留守妇女组织起来,根据其内心需要和接受能力开展文化活动,难以提供贴近农村生活和农村实际的文化产品。公共文化生活的匮乏、文化产品的不足,降低了留守妇女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 5. 留守妇女文化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

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基层政府对留守妇女的文化需求认识不足,维护和实现其文化权益的意识淡薄,保护其文化权益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缺乏。受传统的性别不平等,以及社会分工模式思想的影响,基层干部常常视留守妇女为被动的参与者,将其排除在文化建设的主体之外,致使留守妇女缺乏参与文化建设的机会和话语权,作为农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地位与文化权益被忽视、被弱化。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村文化建设中,留守妇女缺少行

之有效的文化诉求表达渠道,政府无法及时地了解到其内心的想法,从而导致文化产品供给和文化需求失衡。另外,保护留守妇女文化权益的法律法规也极为缺乏,留守妇女合法的文化权益无法从法律层面得以保障。

### 三、提高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积极性的对策

根据农村文化和农村妇女的现状,提高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1. 增强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

加强对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主体意识的培养,有助于留守妇女对自己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能力、作用和价值形成正确认识,并推动其把这些自我认识转化成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行动。教育是提高主体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应针对留守妇女文化水平偏低的现状,结合留守妇女心理、情感等特点,制定符合其愿望和要求的教育规划,利用农闲时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积极向上的文化教育活动,提高留守妇女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培养留守妇女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是其主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sup>[5]</sup>。对于留守妇女而言,就是要让其知晓农村文化产生的历史过程,明确农村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认清农村文化的文化品质和文化特质,认可优秀的农村文化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对自然、质朴、简单的农村文化树立信心,坚定农村文化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可以彰显其独特魅力的信念;就是要让其以坚守的姿态迎接异质文化的冲击,以开放包容的思想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点,以自信的力量推动农村文化的兴盛。在形成正确文化认知的基础上,留守妇女

应将农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情结,“趋福避祸”的民间信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交往原则,“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道德观,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等优秀的农村文化,自觉地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sup>[6]</sup>,将自己对文化的认知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并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孩子、父母、邻里,以形成良好的家风、村风、民风,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传播、传承和践行先进文化的作用。

## 2. 提高留守妇女的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低是影响留守妇女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现实因素。因此,要想提高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应注重提高其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消除其因经济压力而产生的抵触心理和情绪。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对留守妇女进行生产技能培训,聘请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为留守妇女授课,帮助解决留守妇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借助网络平台,对留守妇女所关心的生产问题进行咨询、解答与指导,构建起对留守妇女进行生产技能培训的长效机制。同时,应拓宽留守妇女自主创业、就业渠道。为此,可设立留守妇女自主创业基金,加大对留守妇女小额贷款力度,降低资金偿还利息,有针对性地对贫困地区的留守妇女进行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建立帮扶互助组织,引导留守妇女根据自身情况和当地实际,开展力所能及的项目。农村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应帮助留守妇女充分挖掘本地区的文化资源,学会将身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将民间的文化资源与农村旅游结合起来,以农村旅游带动农村工艺品的发展,以工艺品展现农村文化的魅力。利用女性所具有的细心、耐心、情感细腻的特点,发挥女性的优势和潜力,大力发展适合女性的文化产业,将民间的手工艺品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促进留守妇女就业,提高其经济收入。例如,河南省社旗县大冯营镇周庄村,就依托女子工坊对全村喜爱女红的村民进行培训,加工制作虎

头鞋、虎头靴、婴儿棉衣、团扇等富有民俗文化色彩的传统工艺产品十多种,带动该村及周边村落百余名留守妇女实现在家门口就业。<sup>[7]</sup>这种以文化为载体、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女性为主要从业者的生产经营模式,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留守妇女的经济收入,丰富其精神生活,增强其乡土意识和文化认同,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农村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 3.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保障。针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相对落后的现状,政府应加强以文化站、图书室、活动室为主要阵地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其利用率,发挥其在农村文化活动中的作用,使其成为广大留守妇女汲取文化知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为此,可以通过财政投入、企业捐助、社会筹集资金等方式,将社会资金引入农村,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在使用财政资金时,可划定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确保资金真正用于购买留守妇女喜欢的书籍、影视作品、文化用具和运动器材等,为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创造条件。

在电脑、手机、网络日益成为留守妇女获取信息和知识、了解社会文化、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平台这一背景下,应大力提高农村的信息化水平,通过推进网络光纤改造、扩大农村网络覆盖面、提高农村网络速度、降低网络资费等信息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为留守妇女使用网络创造条件。应建立农村文化网站,将与农村文化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影像资料、文化政策、文化活动等上传网络,使农村文化与现代的传播手段相结合,赋予农村文化以更多的现代气息和新的生命力。同时,应大力发展农村虚拟网络文化空间,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等,为留守妇女进行文化交流、探讨和互动提供便利条件。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应发挥自身了解女性的优势,组织留守妇女成立文化组织,整合留守妇女身边优秀的文化资源,组织与开展锣鼓、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广场舞等娱乐活动,开展读书、读报、歌咏、知识竞赛、摄影作品征集等文化交流活动,满足留守妇女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让留守妇女在学习中感受文化,在生活中体验文化。

基层政府在组织与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时,应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中,以贴近农村实际、贴近留守妇女生活、符合留守妇女思维的文化形式,以留守妇女能够接受、愿意接受的宣传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表达和阐述,使广大留守妇女在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中,提高其对先进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 4. 构建留守妇女文化权益保障机制

文化权益是留守妇女本身享有的基本权益,文化权益的实现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其中基层政府是留守妇女文化权益保障的责任主体。<sup>[8]</sup>基层政府在构建留守妇女文化权益保障机制时,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基层政府应树立起维护留守妇女文化权益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将文化权益的落实与实现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自身在推动留守妇女文化权益实现中的作用,充分认识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识到留守妇女文化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基层政府应发挥好责任主体的主导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文化权益机制的构建,保障留守妇女能够参与农村文化活动,公平地选择和享受到农村文化成果。<sup>[9]</sup>基层政府应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和手段,使广大留守妇女意识到文化权益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基层政府还应从制度上为留守妇女的文化权益保驾护航,建立起一套以留守妇女为主导的对公共文化产

品的需求表达和鉴别机制,畅通留守妇女表达意见的渠道,使留守妇女的文化诉求得到反映和认同。<sup>[10]</sup>通过构建法律援助机制,定期举办与留守妇女文化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讲座,向广大留守妇女普及法律知识,帮助留守妇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高其维权意识和能力。总之,通过文化权益保障机制的构建,使广大留守妇女有自己喜欢的文化形式,乐于参与文化生活,在文化享受上各得其利,在文化参与上各抒己见,在文化创造上各尽所能,在文化选择上各取所需,在文化保护上各尽其力。<sup>[9]</sup>

#### 参考文献:

- [1] 傅铿. 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
- [2] 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7-04-28)[2017-10-2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 [3]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 妇女研究论丛,2011(6):5.
- [4] 赵语慧.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困境与出路[J]. 中州学刊,2015(9):83.
- [5]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
- [6] 赵霞. 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 中国农村观察,2011(3):80.
- [7] 南阳新闻网. 社旗县周庄村:“文化+产业”妇女显身手[EB/OL]. (2017-03-15)[2017-11-5]. [http://news.01ny.cn/2017/sheqi\\_0315/723820.html](http://news.01ny.cn/2017/sheqi_0315/723820.html).
- [8] 高丽原. 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的政府责任[J]. 理论探讨,2016(5):160.
- [9] 何先光,陈正良.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公民文化权益保障与实现[J]. 广西社会科学,2009(10):9.
- [10] 闻媛. 论我国城乡文化权利公平[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56.



引用格式:李频,李瑞. 社科学术创新与社科学术期刊分布之关系考察[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84-96.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84-13

# 社科学术创新与社科学术期刊分布之关系考察

##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journals

李频<sup>1</sup>, 李瑞<sup>2</sup>

LI Pin, LI Rui

1. 中国传媒大学 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4;
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自2000年起,教育部先后在全国66所高校设立151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21世纪中国社科学术转型的一个显著性标志。把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与教育部创新基地建设作为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两个维度,参照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创新基地认定2770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2005年数据)所做的学科分类,经统计考察发现:(1)无论是在学科门类的排序层面还是在一级学科的结构配置层面,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国家社科基金流向的学科分布,都不具有显著的匹配性;(2)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占比较大,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占比却较小,结构冗余与缺失并存;(3)绝大多数创新基地由于没有自己主办的正式期刊,只能以学术集刊等形式辗转发布学术成果,引导学术发展,这不仅不利于创新基地的发展,也造成了相当的资源沉积与浪费。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基地;  
学科结构;  
国家社科基金;  
社科学术期刊;  
学术集刊

收稿日期:2018-04-01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重点课题

作者简介:李频(1962—),男,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人物传记写作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应对中国加入 WTO 后更为深刻、更为快速的社会转型,学术转型更加走向自觉。21 世纪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教育部自 2000 年起,先后批准在全国 66 所高校设立 151 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下简称“创新基地”)。创新基地以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为目标,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综合创新平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和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全面提高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能力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一大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对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转型发挥了一定的示范、激励作用,应该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创新基地的建设,促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从注重基础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学科交叉融合、为决策服务的方向转型,其研究理念与导向、体制与方法、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 151 个创新基地作为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的学术组织,是新世纪中国社科学术转型的显著性标志,它们既承担着艰巨、繁重的任务,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社科学术创新引领社科学术期刊创新,社科学术期刊创新是社科学术创新的反映。鉴于此,本文拟以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创新基地为例,通过分析其学科分布情况,研究其与社科基金流向、学科发展水平的匹配情况,考察其主办的正式期刊、学术集刊的情况,发现其在学科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 一、创新基地学科分布状况

### 1. 创新基地所属学科门类分布情况

我们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的学科分类标准,对全国 151 个创新基地的学科定位进行汇总统计,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的七大学科门类,对创新基地所属学科门类进行归类(见表 1)。

表 1 创新基地所属学科门类统计表

学科门类	创新基地数	所占比例/%
法学	29	19.2
经济学	27	17.9
文学	20	13.2
哲学	18	12.0
历史学	14	9.3
教育学	13	8.6
管理学	8	5.3
多学科综合	22	14.6
合计	151	100.0

由表 1 可知,法学门类下设立的创新基地数量最多,达到 29 个,占比 19.2%。其次分别是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的学科分类标准,不同学科门类下设置的一、二级学科的数量有很大不同,其中法学门类下设置 5 个一级学科、31 个二级学科,经济学门类下设置 2 个一级学科、16 个二级学科,文学门类下设置 4 个一级学科、29 个二级学科,哲学门类下设置 1 个一级学科、8 个二级学科,历史学门类下设置 1 个一级学科、8 个二级学科,教育学门类下设置 3 个一级学科、17 个二级学科,管理学门类下设置 5 个一级学科、14 个二级学科。由此可见,具有最多学科层级的法学拥有最多的创新基地,具有最为扁平化层级分类的管理学拥有最少的创新基地。

### 2. 创新基地的学科研究类型

从学科类型看,创新基地有单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两类。在 151 个创新基地中,

有129个单学科创新基地,占基地总数的85.4%;有22个多学科综合性创新基地,占基地总数的14.6%。

### (1) 单学科创新基地

创新基地布点一般采取唯一性原则,即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基地,目标是这一基地能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心,使其在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居于领先地位。基于此理念而建设的单学科创新基地,其学科定位比较明确。

从创新基地的名称和研究方向来看,有些基地可以被纳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范畴,有些甚至可细化到更为具体的三级学科。譬如,历史学的创新基地已大致具体到了三级学科的研究方向,如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宋史研究中心、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等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体系。同一学科门类的创新基地往往冲破学科级别的藩篱,自觉追求自身特色,如山东大学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易学本身应当属于三级学科中先秦哲学的一个研究范畴,并没有被单列,而中国古代哲学则是相较于先秦哲学更为宽泛的一个领域。将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并列,一是体现了该基地研究领域的特色性,二是间接反映了该基地的理论依托,即从哲学的角度解读易学,是对视阈的界定。

从创新基地的地缘性分布来看,有些则更多地倚重于其所在地的特色化要素,如中山大学的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的东北亚研究中心等。从这些基地的名称就可以判断出,

它们更多依托的是其所在地区的地理、文化、社会要素,鲜明地反映了基地科研活动中“人无我有”的独特性。

就单学科创新基地情况来看,一方面,创新基地将原本个体的、分散的科研力量集合为团队、集体的合力,推动了高校科研组织形式由分散走向整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固定走向流动;另一方面,创新基地的建设模式不仅对地方和高校科研平台建设发挥了引领作用,而且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再到高校的金字塔型平台体系,改变了高校长期以来以院一系一教研室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极大地释放了科研生产力。

### (2) 多学科综合性创新基地

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是当今世界学科发展同时异向展开的两大趋势。根据创新基地首席专家(负责人)的招生学科和科研方向可以认定该创新基地的核心学科。这批综合性创新基地所依托的高校情况与核心学科的具体情况见表2。

从设置理念上讲,综合性创新基地依托所在高校多个学科的科研力量;从可操作性层面上讲,即便是“综合”,往往也是有所倚重的综合,多以主打学科或优势学科为核心,否则难以形成其研究取向和特色。我们的分析思路是:将基地首席专家(负责人)的招生学科、研究方向认定为该创新基地的主导、核心学科,如果基地负责人的科研方向较为具体而单一,本文就照此单列;如果基地负责人的科研方向多元而宽泛,我们就将学科门类的描述方式加以概括(这种情况更为多见)。

在22个综合性创新基地中,有些地域色彩鲜明,如徽学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中心、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等。这类创新基地,更多地依赖所在地的历史

地理优势,其研究取向也主要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从学科既综合又分化的世界潮流来看,学科间的逐渐渗透形成了一批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而这些新兴学科的激荡与交融既是社会进步的投影仪又是助推器。从这个意义上讲,综合性创新基地的设置迎合了这一潮流。近年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重大社会性问题的解决,常常有赖于不同学科的合力。要求解当前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综合多学科的实力来进行攻关。由表2可知,22个综合性创新基地中有7个所依托的高校并非国家重点扶持的“211”“985”高校,可见,所依托高校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创新基地也选取了综合性的创新路径。

从学科孵化和知识创新的角度上讲,学科综合不仅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而且是一种极富

生命力和前瞻性的选择。综合性创新基地对在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所在高校的学科界限和院系壁垒,借助学科队伍人才融合、学科理论方法融合与重点学科建设等,有可能催生培育出一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

## 二、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关联分析

### 1. 经费流向、创新基地建设与发展水平的多维度分析

科研经费流向、学科门类分布、学术成果质量与数量,这三个指标能够大体描述某一学科门类及下属的一级学科的基本发展水平。创新基地作为优中选优的学科组织,以此为参照进行分析,能够体察当前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一流学科的学术资源配备情况。

表2 综合性创新基地相关情况

序号	基地名称	所在高校	高校属性	基地首席专家招生的学科(门类)
1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	985、211	历史学
2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985、211	文学
3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	985、211	历史学
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	985、211	文学
5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	985、211	哲学
6	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	985、211	经济学、理学
7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学	985、211	文学
8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211	社会学
9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大学	省部共建	地理学
10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		文学
11	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	211	哲学
12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
13	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	211	教育学
14	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	211	历史学
15	海洋发展研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	985、211	
16	音乐学研究所	中央音乐学院	211	音乐学
17	闽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
18	西夏学研究中心	宁夏大学	211	民族学
19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
20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		经济学、政治学
21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学
22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延边大学	211	文学

之所以做这样多维度的匹配分析,一是因为国家社科基金基本上流向了高等学校(高等学校获批立项的比率在过去10年的均值达到了80%以上),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则是依托于高等学校的学术组织,即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者共同指向的主体是以高校为单位进行学术活动的科研人员。二是因为项目基金流向与创新基地建设能够展示当前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科水平。

在前期调研阶段,我们曾对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进行过分学科、分级别的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之数据挖掘》\*的研究报告。由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分类标准依据的是一级学科名目,而创新基地的学科分类同时涉及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且151个创新基地的学科分布又较为分散,所以本文拟采用学科门类的统一标准,将基金经费流向与创新基地建设情况做一个相关性分析。考察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流向,将一级学科的学科立项率加总(此处的立项率指某学科门类的立项项目数量占当年全部学科门类获批项目总数的比率),可得出表3。

由表1可知,不同学科门类的创新基地数量以法学、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的顺序递减。由表3可知,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门类立项率的排序在2010—2012年中没有发生改变,从高到低依次是法学、文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通过对

比还发现,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创新基地在以学科门类为单位的资源配置上存在差异。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代表的是一定时期内不同学科在解决社会性课题时被寄予的期望值,基金立项审批每年进行一次,以此为依据的学科门类排名,可能在某个年份会有所浮动、调整,未必具有推广性。教育部人文社科创新基地则是本着一流性和唯一性这两个原则遴选、建设的,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组织机构,反映了目前我国一流学科的学术平台的分布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社科创新基地建设作为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两个维度,虽然二者在资源配置时针对某些具体学科的优先性排序有所不同,但这种序列上的不完全吻合同时有可能在客观上避免由于学术资源过度集中而造成的“马太效应”。鉴于此,我们认为,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与教育部创新基地建设,二者分别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学术资源的分配,在反映学科发展水平上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二者在学科建设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协作性。

## 2. 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

叶继元曾对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创新基地认定的2770\*\*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2005年数据)做过学科统计,具体见表4。

除去社科综合性期刊(含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将表4中各一级学科进行学科门类汇总后发现,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为:法学(含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471种、经济学(含统计学)

\* 该报告在对近三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后,分别从总量、比例与结构等宏观层面和项目主持人、立项单位的匹配关联等中观层面,以及立项课题所内涵的关键词、热点问题、所属学科等微观层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从数据挖掘的角度解读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近三年的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

\*\* 这2770种期刊中包括文理跨学科但以文科为主的期刊,但不包括外文及少数民族语言期刊、学术性的二、三次期刊,如文摘、索引、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叶继元将这2770种期刊按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主要根据《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20个一级学科,同时参照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学科设置,增设了心理学、人文经济地理和环境科学,并将社科综合性期刊分为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和社会综合性社科期刊两类。

表3 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率统计 %

学科门类	2010年 立项率	2011年 立项率	2012年 立项率	3年立项 率平均数
法学	25.92	26.39	26.49	26.27
文学	20.88	20.76	20.33	20.70
经济学	15.41	15.92	15.5	15.61
哲学	15.14	14.39	14.53	14.69
管理学	12.5	11.65	11.88	12.01
历史学	6.91	7.87	8.35	7.71
教育学	3.24	3.02	2.92	3.06

表4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学科门类统计<sup>[2]</sup>

学科门类	期刊种数	所占比例/%
经济学	446	16.10
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	434	15.67
教育学	340	12.27
政治学	324	11.7
管理学	204	7.36
艺术学	113	4.08
综合性社科	102	3.68
军事学	85	3.07
语言学	77	2.78
新闻与传播学	73	2.64
历史学	71	2.56
法学	66	2.38
环境科学	61	2.2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60	2.17
体育学	50	1.80
民族学	42	1.52
社会学	39	1.41
人文地理、经济地理	37	1.34
中国文学	32	1.16
考古学	27	0.97
哲学	18	0.65
马克思主义	17	0.61
心理学	16	0.58
统计学	13	0.47
宗教学	12	0.43
外国文学	11	0.40
文化学	0	0.00
总计	2770	100.00

459种、教育学(含心理学、体育学)406种、管理学(含图书情报学与文献学)264种、文学(含语言学、新闻与传播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193种、历史学(含考古学)98种、哲学(含马克

思主义、宗教学)47种——人文经济地理、环境科学、军事学、艺术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下面将根据学科门类对社科学术期刊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描述。

由表4可知,法学类学术期刊数量在所有学科门类中居于首位。但考察学科门类下的具体学科分布情况发现,471种期刊中政治学类的学术期刊多达324种,占比68.8%。相比之下,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仅有66种学术期刊,同为一级学科的社会学只有39种期刊。由表1和表3可知,法学学科门类不仅拥有最多的创新基地数,而且连续3年(2010—2012年)的社科基金立项率也位居榜首。从总量上来看,法学学科门类拥有数量最多的学术期刊,这与其创新基地数、基金立项数是吻合的。但从结构上看,政治学类学术期刊在法学学科门类学术期刊中占据了半数以上比例,而其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的平均立项率仅保持在3.94%(根据2010—2012年政治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率平均数而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其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平均立项率保持在8.54%。法学在社科基金立项率方面远高于政治学,但在学术期刊数量方面远远低于政治学。也就是说,社科基金立项率与学术期刊数量在学科门类层面上是匹配的,但在一级学科层面上并不匹配,即构成了课题总量上的匹配与相应期刊结构上的不匹配。在对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进行细致考察后发现,其学科分布与国家社科基金的分布是极不匹配的。更具体地说,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社科基金流向、教育部创新基地的学科布局对法学都有所倾斜和侧重,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隶属的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并未与之同步。

由表4可知,经济学类期刊数量仅居法学学科门类学术期刊之后,在一级学科归类上并

没有按照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类别进行细分。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无论是在创新基地建设还是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都备受重视,其在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达到15.61%,仅次于法学和文学。由表4可知,统计学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仅有13种,在整个一级学科群中属于数量较少的学科。而统计学学科2010—2012年的平均立项率约为1.19%,在国家社科基金23个一级学科中的排名同样是倒数的。

由表4可知,在教育学类的406种期刊中,作为一级学科的教育学学术期刊数量高达340种,是该门类期刊的主要组成部分。由表3可知,教育学学科门类在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仅为3.06%,排在七大学科门类的最后一位。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最少的教育学学科门类,却拥有数量仅次于法学、经济学的学术期刊,这一不匹配现象的成因有待进一步考量。

由表1可知,管理学学科门类只拥有8个创新基地,这在所有学科门类所拥有的创新基地中排名最后。由表3可知,管理学类学科门类在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维持在12.01%,仅高于历史学与教育学。而作为一级学科的管理学,其立项率是非常高的,2010—2012年均8%以上,在23个一级学科的立项率中仅略低于应用经济学和法学。也就是说,作为一级学科的管理学受到较高重视,但作为学科门类的管理学,则未受到特别重视。管理学所拥有的学术期刊数量与排名前三的法学、经济学、教育学有着明显差距。

由表4可知,文学学科门类的学术期刊有193种,其中包括语言学类的77种,新闻与传

播学类的73种、中国文学类的32种、外国文学类的11种。与这一学科结构形成参照的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分布。2010—2012年,文学学科门类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维持在20.7%,总体排名仅次于法学。文学学科门类中的语言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6.7%左右,新闻与传播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3.14%,中国文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8.1%,外国文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2.72%。也就是说,在文学学科门类中,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布与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综观表1、表3和表4,无论是创新基地建设、国家社科基金还是学术期刊的分布,历史学都处在诸多学科之后,这与该学科目前的社会需求度不高有关。

由表4可知,哲学学科门类的学术期刊有47种,其中包括3个一级学科类期刊:哲学类的18种,马克思主义类的17种,宗教学类的12种。由表1、表3可知,哲学学科门类的创新基地有18个,在所有学科门类中排名第四,而哲学学科门类2010—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率达到14.69%,仅次于法学、文学、经济学类的基金项目立项率。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分学科立项统计中发现,哲学门类细分为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宗教学4个小类,而综观2010—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率,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是该学科门类中立项率最高的(6%以上),而宗教学的社科基金立项率仅维持在2%左右\*。而哲学学科门类的学术期刊分布并没有如国家社科基金的分布一样有着学科内部的层级差别,而是较为平均化。

\* 根据2010—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学科立项数据汇总得出。

以上只是对各学科门类与个别具有代表性的一级学科做了描述性分析和匹配性考察,由于并没有考虑表4中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情况,所以只是针对单学科性学术期刊的情况做了粗略分析。分析发现,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布,二者无论是在学科门类的排序方面,还是在一级学科的结构性配置方面,都不具有显著的匹配性。特别是,作为学科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教育学门类从总量上拥有较多的学术期刊,呈现出期刊学科结构的冗余性;而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社会学类学术期刊,虽然其总体数量尚属可观,但若从重大社会性议题应当倍受关注的层面来讲,其数量显见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失衡。造成学术期刊这种学科结构性失衡的成因,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值得重视。

### 三、创新基地主办的正式期刊情况

151个创新基地共拥有大约255种出版物。其中,正式期刊44种,占16.9%;学术集刊124种,占48.9%;非正式期刊87种,占34.2%(鉴于非正式期刊中有些为连续出版物,有些则为不定期出版物,此部分的数据可能有所遗漏)。

创新基地作为我国最具知识生产潜力的学术组织,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创新基地主办的专业期刊是其学术传播的主要渠道。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和刊龄是考量其学术传播力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下文拟对创新基地主办的正式期刊情况做一个描述性的梳理,并考察正式期刊与创新基地的配套、协调程度。

#### 1. 学科结构分析

如前所述,在151个创新基地所主办的出

出版物中,有44种正式期刊(其中有3个基地拥有2种正式期刊),具体情况见表5。

由表5可知,在151个创新基地中,其中有41个基地拥有正式期刊,占26.4%;有111个基地没有正式期刊,占73.6%。从比例上来看,只有1/4左右的创新基地拥有正式期刊。

以学科门类为视角分析这批创新基地所办期刊发现,创新基地学科分布与正式期刊数量的匹配情况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除历史学、综合类的正式期刊数量较少外,其余学科门类的正式期刊数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正式期刊与所隶属的创新基地在数量的分布上是不匹配的。拥有最多创新基地数量的学科门类,并没拥有相应多的正式期刊;拥有正式期刊数量最少的学科门类,也并不是拥有最少创新基地数量的学科门类。而除去最高和最低数量的极端值,综观正式期刊在其他学科门类的分布,几乎是持平,并无明显的差异。

如果说正式期刊与所隶属的创新基地在数量的分布上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考察正式期刊与相应学科的立项情况就构成了另外一个可供借鉴的维度。例如,人口学作为近几年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眷顾最少的一级学科(立项率均值在1.4%左右\*),以此定位的创新基地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主办的刊物是创刊于1977年的《人口研究》;而拥有14个创新基地的历史学学科门类,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率年均虽达到7.11%,却仅拥有《清史研究》一种正式期刊。正式期刊在学科层面的分布上也存在着结构性冗余与缺失并存的问题。作为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而续存的期刊结构,与目前的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需要是不相称的,正式期刊的分布并没

\* 根据2010—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学科立项数据汇总得出。

表5 创新基地主办的正式期刊情况

序号	基地名称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	期刊名称	创刊年份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哲学/哲学	《现代哲学》	1985
2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哲学/哲学	《逻辑学研究》	2008
3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哲学/哲学	《周易研究》	1988
4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哲学/哲学	《伦理学研究》	2002
5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哲学/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1984
6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哲学/宗教学	《宗教学研究》	1982
7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哲学/马克思主义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984
8	外国哲学研究所	哲学/外国哲学	《外国哲学》	1987
9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01
10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经济学	《世界经济文汇》	1957
11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经济学	《中国经济问题》	1959
12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学/经济学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7
13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经济学/经济学	《商业经济与管理》	1982
14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经济学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1989
15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法学/社会学	《人口研究》	1977
16	俄罗斯研究中心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俄罗斯研究》	2007
17	东南亚研究中心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南洋问题研究》 《南洋资料译丛》	1974 1957
18	东北亚研究中心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东北亚论坛》	1992
19	南亚研究所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南亚研究季刊》	1985
20	华侨华人研究所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86
21	中东研究院	法学/国际问题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1982
22	清史研究所	历史学/历史学	《清史研究》	1991
23	敦煌学研究所	文学/中国文学	《敦煌学辑刊》	1983
24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文学/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57
25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文学/语言学	《世界汉语教学》	1987
26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文学/语言学	《现代外语》	1978
27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国际新闻界》	1961
28	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	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大学》	1981
29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学/教育学	《比较教育研究》	1961
30	发展心理研究所	教育学/心理学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85
31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学/教育学	《教师教育研究》	1989
32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教育学/教育学	《全球教育展望》	1972
33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教育学/教育学	《基础教育》	1978
34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教育学/心理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3
35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管理学/管理学	《社会保障研究》	2008
36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管理学/管理学	《南开管理评论》	1998
37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管理学/管理学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报》(英文版)	1992
38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管理学/管理学 管理学/管理学	《科研管理》 《技术经济》	1980 1982
39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管理学/图书情报文献学 管理学/图书情报文献学	《图书情报知识》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1984 2011
4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综合	《文化遗产》	2007
41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综合	《东疆学刊》	1984



表6 创新基地主办的正式期刊学科门类  
分布情况

学科门类	创新基地数量	正式期刊数量
法学	29	8
经济学	27	6
文学	20	6
哲学	18	8
历史学	14	1
教育学	13	6
管理学	8	7
综合	22	2
合计	151	44

有如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与创新基地分布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学科门类上的差异化布局。如果说国家社科基金与社科创新基地在学科结构的分布上有一定的协同性,那么正式期刊的分布格局与上述二者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从国家社科基金流向、正式期刊审批、创新基地建设三者的行政管理主体来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社科基金的流向应当说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央对于发展我国社科学术理论研究的导向;创新基地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学术组织机构,以建设一流学科科研平台为目的;社科期刊的刊号分配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宏观调节,实行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原则。以学科发展水平为中心,将国家社科基金的流向与创新基地及其所主办刊物的情况做一个横向的匹配,一是为了增加视点的多维性,二是为了考察以上三部门或机构在学科建设层面的协作程度。国家社科基金在分学科立项方面,能够基本保持某具体学科立项比例的年度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或许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宏观比例的调控;创新基地作为一个长期而持久的学科建设、学术交流平台,在筹建中兼顾了学科布局和地域布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稳定性;社科期刊的分布与上述二者

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并没有学科门类间的结构性统筹、安排,而这种宏观布局上的平均性必然导致期刊在学科分布上的不平衡。

## 2. 刊龄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据此时段,结合期刊的创刊时间,对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期刊进行刊龄结构分析发现:在44种正式期刊中创刊于1978年以前的有9种,创刊于2000年以后的有8种,其余27种期刊的创刊时间在1978—2000年。以1978年为分水岭考察这批期刊当前的出版运营情况,并与创刊于2000年之后的期刊做比较,可以管窥诞生于高校土壤中的这批期刊的传播生命力。

创新基地创办于1978年之前的正式期刊迄今已有50多年的刊龄。尽管1978年之后我国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创刊于1978年之前的老期刊来看,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发生品牌老化、生命力衰退等现象。相反,以《世界经济文汇》《全球教育展望》为代表的期刊,经过主动改版后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正不断创新以适应新世纪学术创新的节奏。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从理论上讲,新世纪之后创办的期刊,在办刊理念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具有更强的服务于学术的办刊意识,同时也具备了更大的成长空间,这批期刊尽管创办时间明显滞后于创新基地的设立时间,但也拥有了自主的成果发布平台,只是基地审批和期刊审批分属于不同部委的现实造成了这一时间差。这种学术创新和相关基础设施不配套的情况源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严重条块分割。这不仅影响了基地与学界的顺畅交流,阻碍了基地的学术创新,而且增加了学术创新成果向学界发布的交易成本,最终压抑、消解了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与学术期刊创新理应互动互补:学术期刊创新为学术创新提供了传播渠道,学术创新是学术期刊创新的源泉。学术期刊作为服务于学术创新的配套资源,其在审批管理等环节的高门槛和长周期,对于学术创新和知识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学术期刊创新不仅关乎创新基地学术成果的传播,也事关期刊强国的建设。

#### 四、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情况

我们将创新基地主办的非正式期刊界定为正式期刊以外的其他出版物。创新基地主办的非正式期刊包括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学术通讯、电子刊物等出版物。学术集刊是中国内地编辑和出版、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的学术出版物<sup>[3]</sup>。

##### 1. 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学术集刊异军突起,成为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出版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汇总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出版情况发现,分布于90个创新基地的124种学术集刊中有38种曾在创新基地所在的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部分学术集刊的出版并未连续保持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38种学术集刊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政府管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意象》《英达-蒙代尔讲座》《人大法律评论》《新闻学论集》《历史地理研究》《文艺学新周刊》《文学理论学刊》《价值与文化》《武大国际法评论》《人文论丛》《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当代港澳研究》《公共行政评论》《思想与文化》《中国现代文学论丛》《民国研究》《文艺美学研究》《犹太研究》《藏学学刊》《清华大学学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专刊)》《创新与创业管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近代史学刊》《华中语学论库》《产业组织评论》《外

语学刊》《道德教育论丛》《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区域海洋经济地理理论与实践》《宋史研究论丛》《中国传播论坛》《知识产权年刊》《毛泽东研究》和《文学前沿》。

在21世纪我国出版各类学术集刊中,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区别于非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的媒介特征是:创新基地是政府批准且隆重推出的学术机构,不仅拥有合法性而且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而创新基地结合其学术研究而集结出版其研究成果,与其他单位主办的学术集刊相比更具备组织合法性,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刊不仅从专业分工的角度各自术业专攻,而且可借出版社使其“半自主性”的学术集刊成为合法出版物。因此,学术集刊尽管因为缺乏审批程序和CN刊号而未能成为中国大陆境内的正式期刊,但其不属于非法出版物,其具备国际通行的连续出版物的一般特征,在实行出版登记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其一般会被认可为期刊或连续出版物。这些在中国大陆境内欠规范的出版物有其正当、旺盛的学科需求,正视这批学术集刊中学科发展需求与期刊审批之间的矛盾,使学术创新与学术期刊创新相匹配,进而维护、培育这批权威性学术机构的社科学术创新能力,应该成为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协商、解决的问题。当然,出版社如何配合创新基地的学术创新,创新基地如何坚持连续出版以形成学术品牌,也是编辑出版活动应当关注的问题。

##### 2. CSCI 认定的学术集刊情况及其启示

学术集刊作为图书与期刊两种媒介杂交的产物,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部分规避了期刊审批的障碍。但对于没有正式期刊的创新基地来说,要耗费更多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学术集刊的编辑单位与出版单位的分离,为出版学术集刊而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都要比出版正式期刊高出许多。从社科创新基地现有学术

集刊的出版周期来看,多为季刊、半年刊或年刊,较低的出版频率,虽契合了知识生产的周期,但也反映了媒介服务缺位所导致的成果发布滞后问题。

大多数创新基地有着极强的办刊积极性,同时也拥有相应的学科、人力、品牌等办刊资源,但刊号仍旧是高悬在学术集刊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由于缺少正式身份,往往使其学术成果的传播力与认可度大打折扣。创办学术集刊是在现有学术创新和学术期刊创新不匹配、不对接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的补救措施、一种无奈之举。因而,学术集刊的编辑出版作为创新基地学术研究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有了某种象征意义的突围性质。

近年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就将学术集刊纳入到其评价体系。通过整理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发现有3种集刊已获得CSSCI的认定。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行政法论丛》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学专业集刊,定期汇集国内行政法研究的前沿成果,每年出版1—2卷,迄今为止已出版15卷。其中,1—10卷由该中心名誉主任罗豪才教授担任主编,自11卷始,由该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担任主编。该刊现已成为CSSCI来源集刊(2012—2013),并且入选中国期刊网。该刊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软法”,即那些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性规范。其办刊宗旨在于回应正在崛起的公共治理对软硬并重的混合法模式的迫切需要,倡导在行政法学领域开展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以提升中国行政法学学术品位,促进中国行政法学历足发展。行政法学作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在宪政实践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纵观法学诸分支的正式期刊分布,关于行政法学的专题期刊目前只有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行政法学研

究》一种。在当前法学学科不断细分且相应学术期刊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创办的《行政法论丛》,应当说是一种自觉的创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民国研究》,现为CSSCI来源集刊。该刊创刊于1994年11月,自第4辑开始改为16开本,并以南京大学学报特辑的形式定期出版。2008年8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步达成了合作出版《民国研究》的框架协议,计划每年出版2期。该刊主要刊载有关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史实与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凭借南京大学的特殊历史地位,其对民国史学方面的研究积淀较深,《民国研究》就是在这一有着强烈国内外需求的背景下创办的。该刊本着“以史为鉴”的办刊初衷,为认知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平台。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遗产》,其前身为《民俗学刊》,由原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办,2001—2005年,共出版了8辑,在学界备受青睐,继而成为CSSCI来源集刊。2004年,《民俗学刊》更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200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了第9—11辑(延续《民俗学刊》的辑数)。2007年,在继承和总结以往办刊经验的基础上,再次更名为《文化遗产》,并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刊号而成为正式期刊。这种认可是对学术集刊主办单位连续性学术创造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样一个举动等于在现有期刊出版管理体制下开了一条可供外围优质期刊资源流入体制内的“口子”,在学界自办刊物领域内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对所在创新基地协同生产学术成果的一种激励。在上述案例中,学术评价突破了期刊管理体制的障碍,对于没有CN号的集刊,也沿用、借用国际惯例予

以承认,从客观上形成了倒逼新闻出版部门的机制。以上3种学术集刊在学术评价创新和期刊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为将来从创新基地自办集刊中遴选CN期刊提供了榜样和参照。

## 五、结语与讨论

教育部151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中国高校系统极具权威性、发展潜力且符合学科发展需要和趋势的新型学术组织,从学术机构设置创新的角度象征和标志着21世纪我国社科学术的转型,以此为例研究社科学术期刊与创新基地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发现。

其一,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国家社科基金流向的学科分布,二者无论是在学科门类的排序层面还是在一级学科的结构配置层面,都不具有显著的匹配性;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占比较大,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占比较小,存在学科结构不均衡的问题。

其二,在哲学社会科学优势资源向创新基地聚集,以及创新基地的优质资源和优秀的社科学术成果并没有批量地、制度化地转化为社科学术期刊资源的情况下,如能有效利用创新基地的成果和资源,对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转型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其三,创新基地既拥有国家社科基金等优势资源的大力支持,又连续产生社科学术的前沿成果,其不仅是社科学术期刊的优质稿源渠道,而且也是推动社科学术期刊结构转型和办刊体制转型的重要力量,国家有关部委与相关单位应积极主动,加强沟通合作,盘活这批优质资源,以推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更快更好地发展。

其四,受目前期刊出版体制制约,绝大多数

创新基地没有主办的期刊,只能以学术集刊等形式辗转发布学术成果,引导学术发展,这不仅对创新基地的发展不利,也造成了相当的资源沉积和一定意义上的资源浪费。因此,在目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重视并认可学术集刊是目前体制下正式期刊的有效补充;同时对于出版质量高、享有良好学术声誉的学术集刊应及时批转为正式期刊。

其五,受新兴的学术评价体制制约,大部分创新基地学术集刊所发布的大量学术成果,既未被纳入学术信息检索系统,也未能进入学术职称评审、学术奖励、学术考核等学术评价体系。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共同关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部分学术集刊发表的学术论文采取了变通性的做法,将之与有关核心期刊同等对待。<sup>[3]</sup>在现行期刊审批趋严趋紧且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如何呵护学术集刊健康成长,摆脱学术集刊及其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尴尬处境,探索、建立有效的学术集刊的评价体系,对创新基地的学术集刊及其学术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这既是关乎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问题,也是学术管理部门和学术评价系统应当协力解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叶继元.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2] 叶继元.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学科结构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2008(4):126.
- [3] 杨玉圣. 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J]. 云梦学刊,2004(4):29.



引用格式:谢柯. 语言服务视角下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3): 97 - 103.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1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3-0097-07

# 语言服务视角下 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Study on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ervice

谢柯

XIE Ke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 重庆 永川 402160

**摘要:**语言服务业在中国的确立和高速发展,使得翻译的生产方式、对象、标准与职业特征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翻译企业逐渐向翻译服务企业或语言服务企业转型,对翻译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与语言服务业脱节、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设置不能反映语言服务业的核心业务、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陈旧单一等问题,难以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合格翻译专业人才。构建紧密联系语言服务业和翻译市场的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应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充分实现职业化,如此才能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合格翻译职业化人才。

**关键词:**

语言服务;  
翻译服务;  
职业化人才培养

收稿日期: 2018-01-11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2016-GX-140);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培育项目(2017PY26);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7SKG175);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4SKM12);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项目(Jy2014-007)

作者简介: 谢柯(1980—), 男, 四川省成都市人, 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语言服务业作为一类新兴行业,在我国逐步确立,且发展迅猛。语言服务背景下的翻译活动与传统的翻译活动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传统的翻译活动多是个人行为,而语言服务背景下的翻译活动常常以集体协作的方式进行<sup>[1-2]</sup>;语言服务背景下的翻译生产方式、翻译对象、翻译标准、翻译职业特征等都发生了某些变化,翻译活动呈现出与传统翻译活动的显著不同。虽然目前我国已有约120万的专职翻译人员、约330万的兼职翻译人员,但真正符合语言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层次、职业化、应用型翻译人才数量还很少<sup>[3]</sup>。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我国需要大量的职业化应用翻译人才<sup>[4]</sup>。但我国目前的本科翻译人才的专业教育与语言服务行业脱节的现象比较明显,培养的许多毕业生翻译实践能力较差,对翻译项目管理不了解,协作能力不强,职业意识与规范淡薄,表现出了较低的职业化水平<sup>[5]</sup>,不符合语言服务行业对翻译人才的要求。高质量的语言服务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重要保障,而高质量的语言服务亟需高水平的职业化翻译人才。因此,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需要在语言服务框架下对其培养模式进行研究和改革。

目前,学术界有关翻译教学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有一些文章探讨了翻译的职业化与职业翻译教育问题,且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了语言服务业对翻译人才的要求、语言服务背景下译文的译后编辑等问题,但基于语言服务的翻译教学研究成果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服务的视角,对本科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展开研究,指出当前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我国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研究

和改革提供参考。

## 一、语言服务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翻译嬗变

语言服务业在中国的确立和快速发展使得翻译生产方式、翻译对象、翻译标准和翻译职业特征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翻译行业逐渐向翻译服务企业或语言服务企业转型,对翻译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 1. 翻译生产方式的变化

传统的翻译活动往往由个体译者来进行,除偶尔请教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外,一般情况下翻译任务是由译者一个人来完成的,翻译企业也往往是将翻译任务下发给特定的个体译者,并要求译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译文。这是前信息时代一种主要的翻译生产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交换量的指数级增长,翻译企业对翻译技术的依赖越发显著,翻译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开始朝着能显著提升翻译效率和管理绩效的翻译服务企业或语言服务企业发展。在此背景下,翻译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翻译量巨大,翻译服务企业往往将翻译任务分配给多个译者,这些译者在翻译管理平台上从事翻译工作,译者间互相配合和沟通,翻译项目经理也常常通过翻译管理平台与译者进行沟通或发布相关消息。翻译任务完成后,译者通过翻译管理平台提交任务,翻译项目经理通过平台接收任务并对译文作出后续处理,如提交给译审进行审校和提交给客户等。翻译管理平台是内容丰富、便于沟通的具有强大功能的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内往往嵌入有翻译记忆库、双语术语库、双语平行语料库等资源,译者在翻译时可调出相关工具辅助翻译以提升翻译的准确性和效率。一些翻译服务企业针对特定的翻译任务还要求译者使用 Trados 等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有些翻译服务企业还

建议甚至要求译者采用“机器翻译初翻+译后编辑”的模式来进行翻译工作,尤其是还会遇到翻译的材料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其中包含大量模式化表达,且翻译量较大而客户又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译文的情况。近年来,新兴的众包翻译模式就是在语言服务背景下产生的特色翻译生产方式。要将 Facebook 软件英文用户界面在短时间内翻译成 30 多个语种,靠传统的翻译生产方式是难以胜任的。Facebook 有超过 40 万翻译志愿者,每周参与相关内容的翻译人数超过 10 万,众包翻译模式是其重要的翻译模式<sup>[6]</sup>。此模式充分调动了翻译人力资源,对翻译效率的提升具有极为显著的作用<sup>[7]</sup>。简言之,语言服务背景下翻译生产方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任务由个体译者完成向由译者群组集体协作完成转型,二是翻译技术的运用比重显著提高。

## 2. 翻译对象与标准的变化

传统的翻译对象主要是文学作品,且主要是纸媒作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翻译的比重大幅上升,翻译市场上对科技翻译的需求已大大超过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占比在翻译市场上已低于 5%<sup>[8]</sup>;而且对电子媒介材料如网站、软件、游戏、手机应用等的翻译需求显著上升<sup>[9]</sup>,网页和多媒体翻译服务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翻译面向<sup>[10]</sup>。翻译的标准主要是“信、达、雅”,也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他的翻译标准,如“忠实、通顺”、“忠、顺、美”、“信顺统一”等。很多翻译标准对“信”特别强调,“信”似乎成了翻译的第一标准,不可逾越。但是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特征的语言服务时代,“信”的标准正在受到挑战,对“信”的绝对遵循正在动摇。“信”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应有不同的内涵。从传播学视角看,如果原封不动地将原文翻译成目的语,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既如此,为什么还要僵化地绝对遵循

“信”的标准呢?外宣翻译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多中文外宣材料是以内宣思维写成的,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如果直接将中文外宣材料翻译成目的语,内外不分,译文的读者认同度就会偏低。如果中文原文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习惯,就要采用编译、摘译等方式来变通翻译策略,甚至重写中文原文后再译出,以提升译文的传播效果。此外,有时,翻译服务购买方为了提升效率和抢占市场可能并不要求译文很完美,只要以最快的时间交付客户认可的质量等级的译文即可。因此,国际有关权威组织和机构对翻译质量的标准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改进,如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TAUS)的动态翻译质量框架(DQF)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机器翻译不同类型译后编辑质量标准中,“信”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除此之外,还涉及翻译材料的效用、时间、感知、专业性等其他维度。

## 3. 翻译职业特征的变化

语言服务背景下传统翻译企业纷纷向翻译服务企业转型,与其他第三产业一样,翻译服务企业须体现出服务业的共同特征,突出“服务”。翻译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遵循职业规范,为客户提供满意的翻译服务。语言服务背景下的翻译职业化特征日益显著,已逐渐成为翻译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具体来说,新时代翻译职业性特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译者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职业价值观等方面。在语言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译者的知识水平有了较显著的提升,除掌握与翻译相关的知识外,译者还需要掌握与所从事工作相关的非学科知识和基本规则。新时代对译者的技能结构也有了新的要求,除具备翻译专业技能外,还要求译者具备较强的信息素养和某些软技能,如翻译管理系统操作能力、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运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压力管理能力、社交能力等。语言服务特别是具有较高复杂度的翻译工作一般是项目式

的,常常需要以团队的方式开展,团队成员对所从事工作的态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他们一般认为自己是顺利开展翻译项目的其中一环而不是关键甚至唯一的力量,须遵守基本的工作规范和流程,具备强烈的责任感,与他人充分沟通和合作。以往的译者往往是出于自身的爱好而从事翻译工作,即使与出版社有长期的合作,译者受到出版社等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也有限,其翻译行为相对比较松散。但是语言服务背景下的翻译服务提供者往往需要将所从事的工作视作职业甚至事业,深刻理解并认同其意义和价值,自觉遵守行业规范,重视职业道德和规范,增强服务意识。翻译职业特征的这些变化需要翻译研究者和一线翻译教师重视审视译者及其行为,并将对这些变化的思考和研究体现在教学改革之中。

## 二、当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开展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只有短短11年,办学历史短,目前还处在摸索期,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设置不科学、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单一等。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具有较强翻译实践能力,特别是在某些领域具有较突出翻译能力、了解语言服务业的专业译者。这一目标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但人才培养的诸多环节与市场需求脱节,致使当前的模式难以培养出符合企业和市场需求的专业翻译人才。

其一,师资力量薄弱。无论是本科翻译专业教育还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日益显著的师资问题已成为制约翻译专业教育发展的瓶颈。既具备很强翻译实践能力又对语言服务业有一定了解的双师型本科翻译专业教师在任何一所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培养单位都是缺乏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更是极为缺乏这样的师资。有些一线教师甚至从未翻译出版过译著或从事

过翻译研究工作,这样的师资水平势必会降低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二,课程设置不科学。当前大多数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的课程设置不科学,与市场严重脱节,不能及时反映语言服务业的新变化和新要求,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开设本地化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翻译项目管理、语言服务业职业规范与道德等课程。此外,文学翻译实践还在不少高校中占据主导,语言服务市场中翻译业务量最多的化工、建筑、机械、法律、医学等领域的翻译实践课程在不少高校不是空白就是占比很小。

其三,教学方式单一。不少高校的翻译教学方式仍以讲授为主,不少教师依旧采取“讲解翻译方法和技巧—举例分析—学生练习—学生练习讲评”的模式进行翻译实践课的教学,教学方式单一。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利于翻译实践能力的提升。

其四,评价方式千篇一律。目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的评价方式多是闭卷进行英译汉和汉译英考试,试卷评阅人也主要是任课教师。语言服务业的翻译任务一般是项目式的,传统的闭卷题目不能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也难以从中获知学生的思维过程,对于语言服务业需要译者具备的合作能力等也不能有效地予以提升。试卷评阅人有可能是对语言服务业知之甚少或是翻译实践经验不充分的教师,其对学生翻译实践能力的评价有可能失准。

总之,当前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将难以培养出国家和企业所需要的合格翻译专业人才。构建紧密联系语言服务业和充分联动翻译市场的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 三、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语言服务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翻译的上述变



化是本科翻译专业培养单位和翻译教师需要深刻了解的内容,这些变化必然会化为翻译服务企业对于翻译人才的新要求。语言服务企业对于特定专业领域翻译实践能力强、协作能力强、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强、熟悉语言服务行业、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的职业化翻译人才特别青睐,这是高校翻译人才未来培养的方向。从上文论述可知,目前我国不少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仍采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充分体现语言服务业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人才的新要求。本科翻译专业培养单位应紧密联系语言服务市场,与其形成双向互动,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这既能促进学生的就业,推动其职业发展,又能提升语言服务的质量,促进其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服务,还能促进语言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供求双赢。要实现此目标,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须构建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职业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等方面突出职业化特色。

### 1. 制定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目前,一些高校已进行了本科翻译教学改革,但其中不少的培养单位只是开设了几门翻译技术类课程或用几门翻译技术类课程替换传统课程,改革呈碎片化,缺乏系统性,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应全面贯彻翻译职业化人才培养思想,并据此制定本科翻译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由于大多数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的一线翻译教师对语言服务业不甚了解,对其新的发展与要求更是知之甚少,如果完全由教育单位的翻译教师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使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其他教学环节。本科翻译专业教育人才的培养方案应由优质语言服务企业的资深人士与翻译教师共

同研究和论证,如此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又符合语言服务业特点和要求的、特色鲜明的职业化人才培养方案。

### 2. 强化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缺乏优质的师资力量是当前本科翻译专业发展的瓶颈。不少翻译教师对语言服务业缺乏了解,缺乏实战经验,教学模式陈旧,难以培养出国家和企业需要的职业翻译人才。<sup>[1]</sup>本科翻译专业教师须在一定程度上职业化,须具备在语言服务企业的实战经验,对语言服务业有较深入的了解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师资职业化可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教育单位与有影响力的语言服务企业建立深度的校企合作关系,分期分批地对翻译教师进行语言服务类的相关培训;二是聘请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为兼职教师,使其参与本科翻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 3. 完善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实现翻译专业职业化的重要方面,教学内容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应在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与翻译教师共同研讨的基础上确定。课程设置应充分反映语言服务业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但也不能千篇一律,须根据教育单位的专业特长和翻译教学与研究实力来确定,体现出一定的特色。翻译技术的运用是语言服务业的主要特色之一,教育单位须开设一定数量的翻译技术类课程,如常见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运用、本地化翻译、翻译项目管理等。职业化的翻译人员除了能较熟练地掌握相关翻译技术外,还需要对语言服务业的特点和运作、职业道德与规范等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教育单位有必要开设相关课程。当前语言服务业要求译者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在一两个特定专业领域具有很强翻译实践能力的译者特别受到语言服务企业的青睐,因此课程设置须突出专业性。专业性翻译课程须依据本科翻译专

业教育单位的专业特色和一线翻译教师的特长来确定,如政法类高校应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翻译实践能力;如特定教育单位中多数一线翻译教师擅长经贸类翻译的话,应重点培养学生的经贸翻译能力,更多开设经贸类翻译课程。也就是说,专业性课程的设置不能千篇一律、一味求全,须依据教育单位自身特色和实力来设置。由于语言服务背景下翻译对象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应减少文学翻译相关课程,显著增加科技翻译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有必要更新学生对翻译忠实标准的认识,使学生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与语言服务实际接轨。简言之,本科翻译专业教育课程设置除能促进学生学习翻译实践能力的必修课外,还须体现出职业化特点,开设一定数量的翻译技术类、职业规范与道德类、专业性翻译类等课程。须特别强调的是: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不能盲目跟风,一线翻译教师不具备这些职业化课程特别是翻译技术类课程的驾驭能力时,不应为了追赶潮流或为了改革而勉强开设这类课程。

#### 4. 构建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教学方式

当前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多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即教师对应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进行讲解、举例分析、布置课堂翻译练习、对学生的译文进行分析、布置课后翻译练习<sup>[12]</sup>。当前不少的本科翻译专业毕业生就业出现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翻译实践能力较差,而这样陈旧的教学方式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语言服务业翻译任务的主流运作方式是项目式,译者需与其他译者进行合作,与翻译项目管理经理进行沟通。建构式、项目式、学徒式等教学方式能有效增强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建构式翻译教学法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能充分体验翻译过程,在翻译实

践中促进学生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提升翻译实践能力。项目式教学法能够很好地与语言服务业的主流模式相对接,使学生对翻译项目的运作产生直接的认识,既能有效拓展学生进行翻译实际操作的空间,又能促进学生对翻译项目的运作产生深刻认识。学徒式教学法是指一定数量的学生接受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的指导,在其指导下接受真实的翻译任务。有条件的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可以让学生到合作的语言服务企业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实习,使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成为学生的师父,学生跟随师父在语言服务企业深度体验翻译服务的相关事项,在此过程中可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同时加深对语言服务的认识。此外,近年流行的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国内译作“慕课”)和SP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国内译作“私播课”)等新兴教学模式也可以引入本科翻译专业教学中。有时为了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往往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并体现出针对性,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 5. 优化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往往容易被忽略,基于语言服务的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也应在评价方式方面体现出职业化。其一,评价的内容应体现出语言服务业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凸显非文学材料的翻译。其二,考核方式可以增加除集中闭卷考试外的其他形式,如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开展一个翻译项目。项目式考核方式可以参照以下流程进行:给小组分配翻译项目(翻译项目最好是语言服务企业的真实项目)→要求学生在组长的组织下借助翻译项目管理平台并运用相关翻译技术实施项目→小组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一份小组所有成员都认同的最佳译文和一份翻译项目报告(包括对此项目的概述、翻译方法与技巧的采用、翻译的难点及其处理、合作的效率和反思等)→参加答辩。评价

主体应包括学生、翻译教师和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不少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的评价主体只有翻译教师,这是不科学的,难以对学生产生很好的职业化导向作用。评价主体中很有必要引入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因为他们的评价更能反映语言服务行业对翻译人才的要求,能让学生更清晰而深刻地了解到自身的不足,能起到更佳的职业化导向作用。学生的自评也是不容忽略的,自评是学生加强自我认识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状况的重要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后续的教与学。当然,学生期末考核成绩的评定应以翻译教师和语言服务业资深人士的评价为主,建议各占50%;或此两评价主体各占40%,学生自评占20%。将学生自评引入期末考核综合评定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其学习反思的深度。总之,评价方式的各个方面都应体现出翻译的职业化导向,让学生认识到自己与语言服务业对从业者要求的真实差距,以促进其后续的学习。

#### 四、结语

我国高校本科翻译专业自2006年设置以来,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已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教育单位数量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都比前几年有较明显的提高。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些本科翻译专业教育单位进行了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数教育单位尚未进行有效的改革,或改革方向出现了偏差。为了提高本科翻译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和就业率,应将职业化确立为本科翻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攻方向,紧密联系语言服务业构建本科翻译专业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资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充分体现职业化,以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

的、完全职业化的合格翻译人才。

#### 参考文献:

- [1] 谢柯,赵妍.信息时代的翻译嬗变及其对翻译专业教育的启示[J].重庆高教研究,2016(5):103.
- [2] 田艳.现代信息技术与翻译教师信息技术素养[J].中国翻译,2012(3):69.
- [3] 郭晓勇.2012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
- [4] 谢柯,吴旭.丹麦奥尔堡大学PBL教学模式及其对我国MTI教育的启示[J].当代外语研究,2015(2):50.
- [5] 谢柯,刘安洪.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设置初探[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5(5):69.
- [6] MEER J. Where Are Facebook, Google, IBM and Microsoft Taking Us? [EB/OL]. (2010-05-25)[2017-07-03]. <http://www.translationautomation.com/perspectives/where-are-facebook-google-ibm-and-microsoft-taking-us.html>.
- [7] GARCIA I. Beyond translation memory: computers and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J].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2009(12):199.
- [8] 张政,张少哲.真项目 真实践 真环境 真体验——基于北京师范大学MTI CAT案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翻译,2012(2):43.
- [9] 王华伟,王华树.翻译项目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3:1.
- [10] 韦忠和.2012年及未来几年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J].中国翻译,2012(3):71.
- [11] 仲伟合.我国翻译专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翻译,2014(4):40.
- [12] 谢柯,刘安洪.笔译教学中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及其效果[J].重庆高教研究,2013(3):86.



引用格式:张平丽. 多模态语块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104-108.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104-05

# 多模态语块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

##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functions of multimodal lexical chunk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张平丽

ZHANG Pingli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外语系, 河南 巩义 451200

**摘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控制组和实验组分别采用传统的词汇教学模式与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结果表明:多模态语块教学不仅能够促进英语学习者英语综合水平的提高,也可以极大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同时还可以增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更好地发挥多模态语块教学的正面作用,应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增强教师的多模态语块教学能力;打破常规英语词汇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主体;加强学习者的语块识别能力,增强其语块应用能力。

**关键词:**

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  
词汇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教学

收稿日期:2018-02-01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SK1-2017-149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YY017)

作者简介:张平丽(1983—),女,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sup>[1]</sup>。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多模态教学因能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外语教学的一大趋势,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例如,王惠萍<sup>[2]</sup>提出了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多模态识读能力的必要性;胡永近等<sup>[3]</sup>调查了多媒体环境下听力教学中不同模态及其组合方式对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理解的影响;彭卓<sup>[4]</sup>进行了多模态视野下英语写作的效能研究。由此可见,多模态教学在阅读、写作、听力等英语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语块是指存在于语法与词汇之间、兼有语法和词汇双重特征的固定或半固定的表达形式<sup>[5]</sup>。语块在学习者大脑中存储的不仅是意义和拼写,还附有形象的图片、声音、视频与语境等,其重要特征就是整体记忆,整体存储,无需语法分析。多模态语块教学是指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形式,实现兼有语法和词汇双重特征的固定或半固定表达形式的意义构建与获取。在多模态语块教学中,从课堂到课下,语块是在多模态的状态下呈现与学习的。

与多模态语块教学相比,传统的词汇教学为单模态词汇教学,即词汇意义的构建与获取都非常单一,往往只有文字或声音一种模式,同时缺乏语境。单模态词汇教学使得学生对词汇的认知能力与运用能力都比较低,对词汇既无深刻记忆,也很难形成长期记忆。多模态语块教学既兼顾了词汇使用的语境,同时又实现了意义的多模态构建、获取与存取,正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学界对多模态语块教学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例如,王娟<sup>[6]</sup>通过对多模态语块进行研究,发现多模态语块教学不仅能显著促进学习者的课堂理解能力,还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学习中词汇这一壁垒问题,引导大学生有效地学习词汇,并最终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创造性使用;张维等<sup>[7]</sup>探究了多模态

隐喻教学模式对大学生词汇学习效率的影响;张平丽<sup>[8]</sup>探讨了多模态理论在茶艺专业学生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本文拟基于目前多模态语块教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对控制组和实验组分别采用传统的词汇教学模式和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进行大学英语教学,以论证不同的词汇教学模式对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形成的影响,以期为当前的教育教学提供参考。

## 一、研究设计

首先根据研究的目的、内容、预期结果与影响等,对研究进行设计,具体包括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骤与研究过程几个方面。

###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在实验组使用多模态语块教学来提高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和英语综合能力,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多模态语块教学是否受学习者欢迎?二是多模态语块教学是否能够更好地提高学习者的英语综合水平?三是多模态语块教学是否能够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产生影响?

###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会计系2016级会计学本科的两个平行班的学生。每个班抽取30名学生,组成两组:一组为控制组,采用传统的词汇教学模式;一组为实验组,采用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实验前,研究者先对被试者大一下学期的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确定两组被试者在实验前英语总体水平基本持平,无显著性差异。实验时间为4个月(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初)。两组学生由同一老师讲授,使用《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以降低老师个体差异和教材差异对被试者学习所造成的影响。在实验之前,我们根据M. Lewis<sup>[9]</sup>对语块的分类(即聚合词、搭配词、惯用话语、句子框架和引语),对实验组学生进行语块识别训练,以培养其语块意识与语块识

别能力。

### 3. 研究工具

我们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之一是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实验前的“关于词汇教学的调查问卷”和实验后的“关于多模态语块教学调查问卷”,前者是为了了解学生对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的兴趣与期待程度,后者是为了验证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研究工具之二是大学英语期末考试试卷。在实验前和实验后,我们分别采用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和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的期末试卷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前测和后测。期末试卷包括听力、阅读、翻译与写作4个部分,分别考查学生听、读、写、译方面的能力。这几个方面可以较全面地展示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研究工具之三是 SPSS 19.0 软件,利用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4. 研究过程

在英语教学中,通常认为,英语学习只有同时重视课前、课中与课后三个环节,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因此,本研究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

(1) 课前。在控制组,要求学生课前对课文进行预习,把重难点词汇划出来;在实验组,要求学生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让学生对课文进行预习,要求学生按照语块分类,对文中出现的语块进行识别与归纳;然后将学生分组,5人一组,每组挑选一个语块,其内容或以微课的形式录制成视频,或做一个含有图片的PPT,或以对话、小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微课和PPT中要求含有基本的语块释义,配以语块使用的场景;对话和小品,要求创设一定的语境,以使语块的使用语境完全呈现出来。

(2) 课中。在对控制组授课环节,要求教师或以板书或用PPT对词汇进行讲解,以单词为单位,或围绕部分单词讲解固定搭配,强调借助词根、词缀等语法知识来扩大词汇量。在对

实验组授课环节,要求学生自己讲解微课视频、PPT,或演示对话、小品,在图片、视频、声音、文字等多种模式下形成对该语块的理解与识记;学生讲完之后,由老师对多模态语块作进一步的补充与讲解。在整个过程中,实验组学习者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学习者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多个感官都参与到了语块意义的认识与记忆中来。

(3) 课后。在控制组,要求被试者在课后对所学单词进行词义与拼写的记忆——这种记忆通常是只能依靠文字信息,也就是说意义与单词的识记是在单一模态的强化下进行的。在实验组,要求被试者除通过结合上下文语境对文中出现的语块进行单模态识记之外,还要通过丰富的视频、音频、PPT图片等资源,对课堂上未展示的视频或者PPT,自行观看、理解、识记,同时,要求被试者在课下对所有的多模态材料进行反复观看,直至真正地理解与识记。

在多模态语块教学中,因为受上课时间与学生水平的限制,对课文中所出现的语块并不能全部以多模态的形式出现,传统的词汇教学模式并没有彻底被抛弃,上课的过程中,教师还会将一些语块结合文中出现的上下文语境或者自创小语境对学生进行讲解。在多模态语块教学中,传统的词汇教学模式变成了辅助性的教学方式,不再是单模态的语块教学模式,而占主流、起主导作用的是多模态的语块教学模式。

## 二、研究分析与发现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对控制组和实验组学生的英语水平分别进行了前测和后测,以发现多模态语块教学对学生的综合水平及其以后的学习所造成的影响与作用。

### 1. 研究结果

按照教学计划,在多模态语块教学实验实施之前,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被试者的英语综合水平进行了测试。前测的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的综合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在该教

学实验实施的过程中,访谈贯穿于实验的始终,通过对学生进行访谈,可以随时了解实践教学进行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以便在教学中及时作出调整。最后再分别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后测,通过成绩的对比分析来说明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的成效,以及后期教学应注意的事项。

(1)前测。在多模态语块教学实验进行之前,课题组先对60名被试者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其大学一年级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 $p = 0.801 > 0.05$ 。由此可见,两组被试者的英语水平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

(2)后测。为期4个多月的实验结束后,即连续实施了上文提到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不同模式的实验教学后,课题组又对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实验组的学习者进行了访谈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多模态语块教学环境下,喜欢含有视频、图片、声音等资料的词汇教学模式的人数占93%;认为学习英语主动性增加,能够做到课前准备充分,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的人数占88%;认为多模态语块教学对英语学习有一定指导意义、能更加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与信息技术带来的丰富资源的人数占88%;认为在以后英语自学过程中会使用多模态语块记忆的人数占70%;认为多模态语块教学能够大大提高英语综合能力的人数占80%。可见,实验组学习者对多模态语块教学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除访谈与调查外,研究者对被试者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也进行了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如表1所示。

表1 两组被试者两个学期期末平均成绩

组别	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	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
控制组	75.3	76.9
实验组	74.9	81.8

由表1可知,实验组的被试者的平均成绩在实验后明显高于控制组。对控制组和实验组在实验后的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同样证明了上述结论。

## 2. 研究发现

通过对多模态语块教学与传统词汇教学两种模式教学效果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较传统的词汇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英语综合水平,而且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与自主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多模态语块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表明:实验组的被试者在为期4个月的实验结束后,英语综合水平明显高于实验前与他们水平基本一致的控制组被试者。因为,多模态的信息输入,可以调动被试者的视、听、触等多感官交互作用,被试者可以在更符合人类认知模态的环境下习得语块,扩充语言储备。

(2)多模态语块教学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通过调查问卷与跟踪访谈,我们发现:大多数被试者对多模态语块教学持积极的态度,在英语课上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学习态度,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得以加强;同时充分调动了学生主动参与课前准备与课后复习的积极性。

(3)多模态语块教学可以增强被试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多模态语块教学,对语块的识别能力大大提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学习的主动性。在观看英语新闻视频或者英语原声电影的时候,可以灵活运用多模态语块来加强词汇学习,更好地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必定会造成一种良性的学习循环。学习者在词汇水平提高的同时,知识面也得以扩大,英语综合能力也随之提高,进而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也得以提高。因此,多模态语块教学对英语学习者学习习惯的养成与英语综合能力的影 响是深远的、全面的。

## 三、结论

本研究初步展示了英语词汇教学改革的成果,反映了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英语综合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三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了

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对多模态语块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教师的多模态语块教学能力。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多模态语块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教师应发挥对课堂教学的整体把握与指导作用,应掌握各种模态之间的协同、强化、互补关系,以提高教学质量。如果不同模态之间产生相互矛盾、互不衔接等现象,可能会降低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对学生的课前准备应做实时指导,以免学生选材太难或太易。同时应对学生的发音做出实时指导,以避免较差的语音输入造成学生课堂上的听力障碍。在课堂播放视频或演示作品的时候,教师应对展示的材料给予适当的讲解与指导,以降低学生听课的难度。因此,在整个教学环节中,教师虽然应放手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实践中,但教师的主导作用需得到加强,对每个环节都要做出提前预测,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多模态语块教学的优势。

二要打破常规英语词汇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主体。在多模态语块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学习者可分组自行查找语块,并对语块配以多模态的语境信息,以增加使用目的语的机会,促进学习者之间的意义协商和情感交流。另外,可以让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兴趣与参与度,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因此,英语课堂教学应力图在每个教学环节乃至整个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主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学习者的潜力,真正实现教学良性互动的最大化。

三要加强对学习者的语块识别能力,增强语块应用能力。多模态语块教学的核心是语块教学,学习者应改变传统的单词记忆模式,逐渐培养起语块意识,增强语块识别能力,加强多模态语块的积累,以不断提高语块输出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多模态语块教学不仅能够促进学习者的英语综合水平,也可以极大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同时还可以增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对教师来说,多模态语块教学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该研究充分肯定了多模态语块教学的效果,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也对英语课堂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该研究对其他教师进行多模态语块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模态语块构建如果能形成微课语料库,就可以供更多的学习者使用。所以,多模态语块教学的深化与推广还需要依靠众多教师与英语学习者的共同努力,以促进多模态语块教学真正的实施与推广。

#### 参考文献:

- [1]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理论与媒体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 外语教学, 2009(4): 15.
- [2] 王惠萍. 英语阅读教学中多模态识读能力的培养[J]. 外语界, 2010(5): 20.
- [3] 胡永近, 张德禄. 英语专业听力教学中多模态功能的实验研究[J]. 外语界, 2013(5): 20.
- [4] 彭卓. 多模态视野下英语写作的效能研究[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2): 51.
- [5]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s a basis for language instruction [C]//ROBINSON P, ELLIS N.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08: 66-88.
- [6] 王娟, 杨跃. 多模态教学干预语块学习与听力理解能力的提高[J]. 中国外语, 2014(6): 43.
- [7] 张维, 刘晓斌, 周榕, 等. 多模态隐喻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实证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14(7): 63.
- [8] 张平丽. 多模态理论在茶艺专业学生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J]. 福建茶叶, 2017(2): 219.
- [9] LEWIS M.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lexical approach: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55.